



李来柱，祖籍莘县莘亭镇曹屯村，1932年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1994年晋升上将军衔。

鑒古知今
振興莘縣

李来柱 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



李来柱上将为本书题词

Aut/1563/12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与莘县三级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会面。左起：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刘少奇、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莘县县委第一书记张龙。



2000年12月26日，山东省副省长陈延明(左一)、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斌(左二)、河南省副省长王明义(左三)同时启动按钮，纵贯莘县全境的彭楼引黄入鲁工程正式开闸通水。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第一次赴藏工作归来后，于1981至1985年任革县县委副书记，1988年第二次进藏工作。



被誉为“当代保尔”的张海迪，1970至1983年一直生活、工作在革县，她将革县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997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欢聚一堂》节目组在革县王铺乡十姓庄实地拍摄庆祝“十五大”召开的专题农村文艺节目《欢聚在田野》，时任革县副县长的王冲与著名歌星于文华搭档演唱《纤夫的爱》。



位于莘县大王寨乡丈八村的“鲁西北烈士陵园”占地百余亩，建于1945年，至今保存完好。

位于莘县城内的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2003年经过大规模维修后，重现出昔日风采。



保存于莘县古城镇的金代铁钟重达4吨，已有800年历史。2002年古城镇建亭重悬古钟，使其成为范县旧治(古城)的一个新亮点。

《莘县历史大事录》编委会

主 任:张晓民

副主任:马敬波 韩志平

委 员:杨新民 郭永贵 李建平 张洪霞

王志国 杜言青

撰 稿:杨巨源

第九届莘县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

顾 问:杨巨源

主 任:韩志平

副主任:杜言青

委 员:郭永贵 陈庆立 孔祥彬 赵海鹏

康学森 张凤芝 王文生 王洪林

序

赵庆忠

要把握莘县的今天，开创莘县的明天，就必须了解莘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以昨天为基础的。今天的历史曾经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又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成为现实的镜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把过去当成过时。

县政协编辑的《莘县历史大事录》较为详实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发生在莘县的重大事件，书末又附录了建国后 50 多年中的大事摘要，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通览此书，可对莘县的发展历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并能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首先，它可以丰富我们有关莘县的历史知识，做到明察古今。作为一个莘县人，包括在莘县工作的外地人和在外地工作的莘县人，都有了解莘县历史的必要。莘县的历史是悠久漫长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发生在莘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的能长人识见，有的能发人深思，有的能催人奋进。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其传承性，历史永远是我们开创未来的新起点。

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洞察过去，展望未来，从中获得启迪。莘县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兴起和发展的缩影。莘县地处中原，

是在中华文明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发生在莘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每一个事件中，都蕴涵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耐人寻味的深刻教训，向我们揭示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史；要实现振兴莘县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明察莘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莘县的历史已经积累了数千年，今后还要不停地延续下去。每一个莘县人，包括在莘县工作的外地人和在外地工作的莘县人都是莘县历史的书写者。历史上形成的宝贵传统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教训有待我们去总结记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时代莘县人。

第三，它可以帮助我们知古鉴今，从历史人物身上找到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倡导的新道德、新风尚，在许多历史人物身上早已时隐时现地存在着，有的还表现得比较突出；今天我们反对的陈旧风俗和腐败现象，在历史的长卷中也从来没有绝迹过，有时还泛滥得十分严重。一切思想、道德和作风，都有其传承已久的历史渊源。许多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和优良作风，至今仍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一心为国为民的伊尹，舍身救护他人的急、寿，精通用兵之道的孙臆，一生清正为官的王旦，时刻恤民疾苦的郑板桥，视党组织如生命的赵健民，临危不惧的吕世隆，舍家纾难的张炳元，身先士卒的史钦琛，誓死抗战的马本斋以及一心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曾广福，等等。这些平凡而又优秀的人物身上，无不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即使从古代人物伊尹、王旦、郑板桥身上，也可以找到可供今人学习的宝贵品质；从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某些道德和作风，甚至使当今之世的许多人自叹弗如。到底应该提

倡什么,反对什么,从古人身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我们愿将此书推荐给全县各级干部和县内外所有关心莘县发展的有识之士阅读。希望大家不要将历史事件仅仅当作故事看,要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尽可能多的从中悟出些道理,用以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和工作。唯其如此,莘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迈得更大更快。

(作者系中共莘县县委书记、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目 录

序.....	赵庆忠
伊尹躬耕古莘地	1
二子殒命莘之野	8
孙臆列阵马陵道.....	14
萧翼计赚兰亭序.....	20
三槐王发祥莘县地.....	27
王旦清正为官.....	34
明初东昌大移民.....	44
榆林军反明抗清.....	53
郑板桥出任范县令.....	57
丘莘教举旗反清.....	65
黄沙会赶走“鲁西王”	71
赵健民古云找党.....	77
观城惨案 刻骨铭心	83
莘县事变 世隆遇难	88
张炳元血洒鲁西北.....	96
战耿楼史钦琛殉国	103
“南支”强攻古云集	108
苏村一战震敌胆	114

马本斋转战鲁西北	121
两把菜刀夺炮楼	129
朝南痛击文大可	135
曾广福创办互助组	140
里应外合克莘城	148
吕堤事件警后人	157
建国后莘县大事备忘录	166
莘县朝城观城建置沿革一览表	188
建国后莘县人口耕地一览表	190
莘县概况	193
通讯联络	197
补白	
张鲁清真寺女寺碑文	7
野猪林遗址碑文	52
苏村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	56
太子墓纪铭	70
中国的别称	76
中国国都的称谓	82
重建张鲁清真寺碑文	102
曾广福墓志	107
重悬古钟碑记	128
重修莘县文庙纪铭	134
齐魏马陵战址碑文	139
重立王旦墓碑碑文	147
山坡羊	156
孔姓行辈	187
“为人民服务”的由来	196

伊尹躬耕古莘地



位于莘亭镇的伊尹耕莘碑亭

此事发生在夏商之交，距今约三千五百年。有莘国民伊尹向往尧舜之道，胸怀造福天下的大志，隐居于有莘之野（今莘县城北），以农耕为业。后被成汤委以重任，终于助汤灭夏。成汤死后又辅佐三位继世帝王外丙、仲壬、太甲，可称是商代的四朝元老，也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

风云变幻 夏衰商兴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自启开国，历经十六世传位至桀，凡四百七十一年，其统治力量已成强弩之末，衰微之势日显，灭亡已成定局。当时危及夏政权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夏桀荒淫无道，臣民离心离德。夏桀名履癸，在史书中以淫乱著称。《史记·殷本纪》说他“为虐政淫荒”；《吕氏春秋》说他“暴戾贪顽”；刘向《列女传》说他“昏乱失道，骄奢自恣”；《帝王世纪》说他造酒池肉林，为博宠姬妹喜一笑，不惜使人竟日撕绸缎为乐；《管

子·轻重甲篇》说他有女乐三万人，终日沉溺于妇女钟鼓之乐，丝毫不以天下为忧；《竹书纪年》说他“作倾宫、瑶台，殫百姓之财”；《孔子家语》则说他“斩刈黎民如草木焉，天下讨之如正夫”。二是夏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日趋腐败。《淮南子·览冥训》对此作了言简意赅的描述：“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危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作者对夏桀统治的最后结论是：“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可见夏王朝内部已经腐烂，形势确是岌岌可危了。三是外部矛盾加剧，反对之声鹊起。夏桀为了掠夺财富、奴隶和美女，频频对周围部落和方国用兵，征有施氏夺妹喜，征岷山氏得琬、琰，有仍之会逼有缙等无休无止的征伐，既耗费了国力，又激起了众怒，以至形成了“桀为暴虐，诸侯内侵”（《后汉书·东夷传》）、“诸侯多叛夏”（《史记·夏本纪》）的局面。当时的夏王朝已是内忧外患交加，距灭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就在这时，处于夏王朝东部的商族已悄悄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其心腹之患。商的始祖名契，生活于原始社会末期，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赐姓子氏。商族聚居地在漳水流域，大体在今之冀南豫北一带。自契至成汤，商族活动中心历经八迁，最后定居于亳（今濮阳一带）。亳与夏都所在的伊洛地区无高山之隔，可见成汤最终迁居于亳，是在为灭夏创造有利条件。

成汤迁亳后，一方面“以宽治民”（《国语·鲁语上》），“用非己之民”（《吕氏春秋·离俗览》），“轻赋薄敛……布备施惠”，使“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淮南子·修务训》）；一方面努力扩大影响，争取各方国和部落的支持，使“诸侯与之，贤士归之”（《墨子·非命篇》），从而造成了灭夏的大气候。在此基础上，成汤又会盟诸侯，

表示自己是受天命要取夏而代之。此后不久，便拉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

躬耕莘野 心系天下

夏末，中原一带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小国，有莘国即是其一。有莘国的统治中心在今之开封至曹县一带，今之莘县亦在其辖域之内。因莘地距有莘国的统治中心较远，史称“有莘之野”，相当于现在的远郊区。

伊尹，姓伊名摯，传说是黄帝时代大将力牧的后裔，因其母居于伊水之畔，遂以伊为姓氏。《吕氏春秋》说：有莘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今河南开封陈留），此儿即伊尹。伊尹虽是个弃儿，却自幼聪慧过人，成年后博学多才且胸怀大志。他审时度势，认为夏王朝日趋腐败，危局难支，政权易手已是大势所趋。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好呢？伊尹最钟情的是尧舜之道，最向往的也是尧舜时期的那种社会模式。为了深入研究尧舜之道的精髓，他毅然离开有莘国的统治中心，来到地广人稀的“有莘之野”（今莘县城北莘亭镇一带）筑室而居，白天开荒种地，夜晚思谋天下大事，这就是《孟子·万章上》所说的“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他的指导思想是：“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我自己躬耕于有莘之野，一个人欣赏尧舜之道，不如把现在的君主变成尧舜那样的仁君，不如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现在的人民都能像尧舜时期的人民那样幸福安乐地生活。伊尹向往尧舜之治，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便是实践尧舜之道的合适人选，他要辅佐一位堪为人君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人便是成汤。商族虽仅

以七十里之地起家,但发展势头颇健。成汤更是对外广结邻族,对内深得民心。伊尹由此认为,天下之大,灭夏必商。从此,他便以助汤灭夏为己任,故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后世所建伊尹庙称“任圣祠”,盖本于此。

《孟子·万章上》关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的记载留下了伊尹耕莘的千古佳话。周时,莘县城北曾有莘亭,汉代又建伊尹庙一座,以为纪念。后亭与庙皆废,又在县城内建任圣祠,塑伊尹像,后亦圯毁。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东昌知府程光珠访求遗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六字,并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时任莘县知县的刘萧立碑以刻程书。此碑至今尚存,唯字迹已严重剥蚀。1995年11月,莘县人民政府和单庙乡人民政府斥资建亭,移碑亭中,以利保护。自此,莘亭伊尹耕处遂成莘县一景,单庙乡也因此改名“莘亭镇”。

成汤灭夏 伊尹建功

躬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不但深谙尧舜之道,而且逢人便宣传尧舜之道。时间一久,伊尹隐居有莘之野的消息便传到了求贤若渴的成汤那里。成汤志在灭夏,亟需明人辅佐,便派人赴莘野恭请伊尹。伊尹为了试探成汤求贤的决心,拒不应聘。伊尹拒之愈坚,成汤求之愈急。直至第五次聘迎,伊尹才离莘赴商(《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成汤向伊尹请教救民于水火的方略,伊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亲自下厨为成汤做了一桌美味佳肴。伊尹素以善烹调闻名,经过他的加工,鱼不腥,羊不膻,野味不臊,皆鲜美可口。成汤问故,伊尹说:“三群之虫,谓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也。而所以去其腥臊与膻之

气，而味归于美，则在割烹耳。”（《妙香室丛话》卷七）。伊尹表面上说烹饪，实际上暗涵着治理天下的道理。成汤闻言大悦，认定伊尹有经世纬国之才，于是破格“举以为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成汤本人则尊称其为“尹”。尹者，正也，成汤欲用伊尹以正天下，故称其为“尹”。后世遂沿袭下来，以“伊尹”称之，伊挚这个本名反倒不为众人所知了。

但是，当伊尹建议成汤“伐夏救民”时，成汤却有些举棋不定，以致使伊尹“七十说而不受”（《韩非子·难言篇》）。于是，伊尹畅言尧舜之道，历数夏桀祸国殃民之罪，诚劝成汤下定顺天承命，取夏而代之以的决心（《吕氏春秋·慎大览》：“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之后，伊尹又总结历代为王者治理天下的得与失，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伐夏兴商战略。史书上说，“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管子·地数篇》）。这是说伊尹善于因势利导，促使矛盾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在伐夏方略上，伊尹的主要着眼点不是军力强弱，而是人心向背和经济实力。为了摸清这方面的情况，伊尹三年中五次亲自潜入夏都，了解到了夏桀荒淫无道和人民盼望早日易主的迫切心情，摸清了夏王朝政治、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情况（《吕氏春秋·慎大览》：“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伊尹还暗中结交被夏桀遗弃的元妃妹喜，开展了一些离间活动（《竹书纪年》：“妹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并据此写了《女鸠》、《女房》两篇文章，将夏与商的优劣作了具体对比。为了使伊尹刺探夏王朝虚实之举不至引起夏桀疑心，伊尹与成汤还共同策划上演了一出伊尹奔夏、成汤追射的苦肉计（《吕氏春秋·慎大览》：“汤……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可谓用心良苦。后来的军事家孙武将使用离间计和战前侦探称为“上智”，认为有上智者方能成大功，并用“昔商之兴也，伊挚在夏”（《孙子·用间篇》）作为例证，充分肯定了伊尹在

灭夏中的作用。

此后，成汤采纳伊尹建议，着手结交并逐步兼并夏王朝的属国，翦除夏桀羽翼，壮大自己实力。始而灭葛，继而灭韦、顾和昆吾，基本上统一了豫兖平原，使夏商之间的强弱对比为之一变。随之，成汤又采用伊尹之谋，用停止岁贡的办法对夏进行试探。夏桀闻言大怒，调集九夷之师欲伐商。见夏桀尚可调动九夷之兵，伊尹认为直接伐夏的时机尚未成熟，便建议成汤向夏请罪并恢复岁贡，使夏商关系得以缓和。又过了一年，伊尹了解到九夷之师已不再听夏桀指挥，便建议成汤正式起兵伐夏。当时夏在西，商在东，成汤用伊尹之计，指挥军队迂回到夏都之西，出其不意地从有娥之虚向东进攻。夏军仓促应战，“未接刃而桀走”。成汤挥师追击，鸣条一战大败夏军，夏王朝灭亡。

辅佐嗣王 鞠躬尽瘁

成汤一统天下后，深嘉伊尹之功，任伊尹为冢宰，相当于后世之宰相。灭夏后，成汤欲将夏王的宗庙迁走，伊尹认为不可，因而做《夏社》一文，说服了成汤。诸侯感商汤之仁德，纷纷臣服。

商汤死后，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于是立太丁之弟外丙为王。外丙任命伊尹为阿衡，亦曰“保衡”。“阿”和“保”都有倚重之义；衡者，平也，合起来即为依赖其保障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商汤嗣王对伊尹的看重。外丙即位三年而逝，伊尹乃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在位四年而崩，伊尹又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即位时刚刚成年，无治国经验，伊尹便做《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章以教之。但是，伊尹的一片苦心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太甲继位三年便昏庸起来，暴虐成性，不遵商汤既定法度，做出了许

多乱德之事。为挽救太甲，伊尹将其放逐于商汤的葬地桐宫，让其守先王之灵，思自身之过。伊尹自己则权摄朝政，统率诸侯。三年后，太甲改过向善，伊尹将其接回，再掌朝政。重新掌权的太甲谨遵祖制，修德为善，诸侯归心，百姓安宁。伊尹嘉其行，乃做《太甲训》三篇，昭颂天下。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位。不久，伊尹寿终正寝，被安葬于亳。继任辅臣咎单感于伊尹一生功绩，做《沃丁》一文以为纪念。至太甲的第四代继位者大戊即位后，伊尹之子伊陟被任命为相，终于子承父志。

伊尹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也是个作风正派、不尚空谈的思想家。他一生著文不少，但均已失传，只在部分史书中保留着伊尹及其行迹、思想、著作的片断转述，这种转述集中地见于《史记》、《竹书纪年》、《孟子》各典籍中。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做《伊尹论》；山东、东昌、莘县的旧志中也都有关于伊尹的片断记载，但多是人云亦云，创意不多。无论如何，伊尹总是中国先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殷商创下六百余年基业，伊尹功不可没。

张鲁清真寺女寺碑文

张鲁系回族古镇，伊斯兰信仰历久不衰。清真女寺，乃女穆斯林敬主传道之所。张鲁女寺始建于清道光十四年，经百三十年风雨后，于文革动乱初期惨遭拆毁。二十世纪末叶，全国改革开放，宗教政策重光，随着张鲁清真寺的重建，女寺的恢复渐成众望所瞩。寺管会广纳众意，果断决策，集资募捐，迅速施工，遂使张鲁女寺在蒙尘三十年后再现昔日风采，吾镇女穆斯林从此又得聚礼传经之圣洁所在，吾教幸甚！吾民幸甚！值此女寺落成之际，为祈国家昌盛之福，明民族团结之志，特勒石为文以记之。

联曰：古寺重修重建，问谁能殚精竭虑；
穆民爱国爱教，看我辈戮力同心。

（杨巨源 撰）

二子殒命莘之野



位于十八里铺镇太子张庄的太子墓

东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并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 696 年，卫宣公宠妾加害继子急子（亦写作伋子），急子之异母弟寿舍命相救，二人皆被杀并葬于莘之野（今莘县十八里铺镇太子

张庄一带）。此事《春秋左氏传》有记载，《诗经·国风》有专章歌之，《东周列国志》有更详尽的描述。

宣公荒淫无道 儿媳变成宠妾

春秋初期，卫国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 718 年，卫宣公继位。宣公名晋，为人淫纵不检，继位前就与其父庄公的宠妾夷姜私通，生一子取名急子，寄养于民间。宣公继位后，夷姜得幸，朝夕相处，如同夫妇，宣公许诺日后让夷姜所生之子急子继位。急子长到 16 岁，宣公为其聘齐僖公的长女宣姜为妻。使者从齐国纳聘后返报宣公，宣公听说宣姜生得十分娇美，便暗生自纳为妾之心。

他命工匠在淇河之畔建了一座新台，朱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之后，他派急子出使宋国，自己却差人将宣姜从齐国迎至新台，纳为宠妾。对此事，《诗经·国风》中有《新台》之诗给予了无情的讽刺。诗曰：

新台有妣，河水洿洿。

燕婉之求，遽除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遽除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威施。

意思是说，新台高耸入云，光彩夺目；淇河波涛滚滚，一片汪洋。宣姜想嫁个英俊郎君，却遇见个不堪入目的丑八怪。这正如张网捕鱼，却逮住个令人恶心的癞蛤蟆。

急子从宋国返回后，到新台向宣公复命。宣公正与宣姜饮宴，见急子回来，毫无羞愧之意，让急子以庶母之礼与宣姜相见。急子生性敦厚，并无夺妻之恨，依然唯父之命是从。从此，宣公与宣姜在新台朝欢暮乐，将急子之母夷姜冷落在了一边。三年中，宣姜连生二子，长子名寿，次子名朔。俗话说“母宠子贵”，宣公宠爱宣姜，对宣姜所生的两个儿子也是宠爱有加，夷姜所生的急子反倒成了无足轻重之人。宣姜一心要让自己所生的儿子做王位继承人，遂日夜在宣公面前数说急子之非，宣公自然是偏听偏信。谁知公子寿天性孝友，与异母哥哥急子手足之情甚笃，如同胞兄弟一般，常在父母面前为急子说好话；加之急子温柔知礼，处事谨慎，从不做失德之事，宣公与宣姜一时抓不到把柄。宣公只得在私下里将寿托付给自己的心腹大臣，约定待自己归天后立寿为卫国国君。

宣姜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朔虽然与寿同出一母，禀性却迥然不

同。朔生性贪婪狡猾，年龄稍大一些便私养武士，一心要谋取国君之位。怀此目的，他不但嫌弃急子，连自己的同母之兄寿也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事有先后缓急，朔先把急子定为进攻目标。在生母宣姜面前，他经常以言语挑拨，多次对宣姜说：“母亲虽然得宠，但有急子在先，日后卫国江山必为急子所掌。急子为君，夷姜必为国母。夷姜被你夺宠，到那时我们母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此言正说中宣姜心病，于是母子二人常常在宣公面前谗害急子。

一天，急子生辰，寿治酒相贺，朔也同席。饮酒间，急子与寿言语相投，十分密切。朔见状大妒，托病辞席，擦眼抹泪地到宣姜面前搬弄是非。他无中生有地说：“席间急子装醉叫我‘儿子’，还说：你母原是我的妻子，你呼我为父理所当然。孩儿骂他，他便追打，亏得哥哥劝住，我才逃席回来。”宣姜信以为真，立即面见宣公，除将朔的谎言和盘托出之外，又添油加醋地说：“急子还要我陪他睡觉，说夷姜是他的祖母，我是他的旧妻，却被大王你强占了，今后总有一天要把我连同卫国的江山一块还给他！”宣公召寿问询，寿说绝无此事。宣公半信半疑，传谕责备夷姜教子无方。夷姜怨愤填胸，自缢而死。

继母加害继子 亲子舍命相救

夷姜死后，急子痛念其母，常暗暗啼哭。朔与宣姜又借机在宣公面前编排急子的坏话，说急子扬言要让宣姜母子偿命。宣公虽不全信，但对急子已无好感。不论宣姜与朔如何陷害急子，他都只有听之任之了。

不久，齐僖公联卫伐纪，卫宣公派急子赴齐国商定出兵日期。

宣姜见时机已到，便准备实施蓄谋已久的借刀杀人之计。从朝歌去齐国，莘野是必经之地，须在此弃舟登车，改为陆行。宣姜让朔派武士假装强盗，预先埋伏于莘野，认准急子船上的白旄标记，到时一齐下手，杀死急子，拿白旄回来复命。朔平日私养武士，此时正用得上，便依照宣姜之计作了安排。

寿见母亲与朔在一起私议，似有不可告人之事。待朔走后，便找宣姜探听消息。宣姜认为寿是亲生儿子，不会胳膊肘往外拐，便和盘托出了加害急子的计划，并谎说这是宣公的主意。寿一听大惊，急忙找急子说明情况，劝急子不要出使齐国，不如暂时出奔其他国家，日后再作打算。急子是个至孝之人，他说：“不遵父命即为不孝，况世间哪有无父之国？即便奔往别国，终究难以存身。既然父王让我死，我只有以死全孝，别无选择。”于是毅然束装登舟，启程赴齐。

寿泣劝无效，心想：如果急子此去遇害，即便我以后登上国君之位，也于心不安。子不可无父，弟不可无兄，不如我另置一船，先兄而行，代兄一死。父亲倘能因此感悟，我也算忠孝两全。于是，他另雇一船，载酒下河，与急子饯行。兄弟二人舟中对饮，各怀心事。急子认定这是诀别之酒，连连举杯，和泪而饮，不久便醉倒于席上，沉睡不醒。寿却有意留量，见急子睡去，便对从人说：“君命不可延误，兄长既醉，我当代往。”即取白旄插于自家船头，又给急子留书一简，便命开船。行至莘野，正要离舟登车，埋伏的武士呼哨而出，将寿误作急子杀死，携旄而归。

急子酒醒之后，不见了寿与船上白旄，只有简书一片，上书“弟已代行，兄当速避”八字，顿时大惊，立即驱舟追赶。途中与凯旋而归的武士们相遇，急子说明自己身份。武士们知道杀错了人，怕回去不好交差，索性将急子一并杀死。至此，宣姜害人害己，终酿悲剧，害了别人的儿子，将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搭了进去。

二子初葬莘野 佳话千古流传

急子与寿被害后，当地民众嘉其义烈，将其遗体就地分别埋葬。寿葬于北，即今之莘县十八里铺镇田海村前；急子葬于南，即今太子张庄村北。急子的胞妹闻知兄弟被害，私逃出来到莘野寻找哥哥遗体，至杜婆村患伤寒病不治而死，被村民就地安葬（后来杜婆村改名“妹冢”，即为纪念此事）。对卫宣公和宣姜袭杀二子之事，国人有诗讽之。诗见于《诗经·国风》，原文是：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愿言思之，不瑕有害。

大意是说：二子乘着木船，奔向遥远的地方。每一想到他们，便使人心中悲伤。不知他们有什么过错，却落得如此下场。时人不敢直斥宣公昏庸、宣姜残暴，却以怀念二子的语气曲折地表达了内心的怨恨。

朔得到回报，暗喜一箭双雕，自己日后必然成为继位国君。宣姜闻讯，虽为寿之死痛伤，却幸除去了急子，也算一喜一忧。宣公听说两个儿子同时遇害，惊得面色苍白，泪如雨下，半晌才说出话来，连连叹息：“齐姜误我！齐姜误我！”从此得下一个怪病，一闭眼便见夷姜、急子和寿一齐前来索命，常惊得大汗淋漓，祈祷无效，半月即亡。朔发丧袭位，是为卫惠公。

卫惠公即位第三年，亲自率兵联宋伐郑。寿与急子的生前旧部乘惠公外出，向百官陈述惠公朔谋杀亲兄、气死宣公的罪行，拥公子黔年即位，拒惠公于国门之外。因宣姜系齐国人，不好加罪，

便将其幽禁起来,待日后遣回齐国。惠公朔逃至齐国,10年后说动齐襄公联兵伐卫,赧黔年下台,自己重新登上了国君宝座。

黔年在位期间,将寿与急子遗体从莘野迁回朝歌,重新治丧下葬,莘野之墓遂成空坟。但当地百姓深感二子孝义,仍每年为其坟添土不止,使墓丘不断增大。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测量,急子之墓直径达57米,最高点与地平面的相对高度为7米。世纪末的测量数据为:直径(南北)44米,高5米。寿之墓早被平毁,已无遗迹可寻。邻近急子墓之李楼村曾名“孝伋洼”,张庄则最终定名“太子张”,皆与二子墓相关。急子墓前曾发掘出石碑一块(现存莘县文物研究所),上刻“孝伋之墓”四字,只有立碑人的名字,无年代标识。位于妹冢镇北(今妹冢小学院内)的皇姑坟于1957年4月被莘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被平毁。太子冢于1978年4月被莘县革命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周边村庄群众捐资树碑于太子冢之侧,以为永久标记。

关于二子被害之事,《春秋·桓公十六年》只有一句话:“十有一日,卫侯朔出奔齐。”《左传》对这句话是这样诠释的:“初,卫宣公娶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呼!’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职立公子黔年,惠公奔齐。莘,卫地,东昌莘县北莘亭故城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亦有“二子争死”的记载。

孙臆列阵马陵道



位于大张家镇马陵村的齐魏马陵战址纪念碑

战国时期，莘地（今之莘县）位于魏国和齐国交界处。公元前341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军师孙臆采用欲擒故纵的“减灶”之计，在莘地南部马陵道设伏兵击败庞涓率领的魏军，这就是为历代军事家津津乐道的“马陵之战”。古战场在今之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一带，该地现有1991年5月所立“孙臆庞涓马陵之战处”纪念碑一通。对此事记载最详的史书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一师二徒 贤愚迥异

据说，战国时期楚国有一奇人，因其隐居于鬼谷，人称“鬼谷子”。鬼谷子博学多才，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投师学艺者颇多。《史记》载，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鬼谷子还有两个广为人知的学生，就是后来分别投靠齐、魏，又屡在战场上为敌对阵的孙臆和庞涓。

孙膑是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即孙子）的后代，至孙膑时移居齐国阿地（今阳谷县阿城）。孙膑青年时投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与庞涓同门受业。孙膑天资聪明，又善于动脑，悟性极强，对师父所授之业常能举一反三；加之受其先祖孙武的影响，俗话说，门里出身，强出三分，孙膑能结合史书上所述战例去理解师父的讲授，其学业长进之快常常出乎师父的预料。故鬼谷子常说：此子日后必成大器。而庞涓却是个骄傲自负又心胸狭窄之人，虽然不乏聪慧，学习却极不刻苦，常常浅尝辄止，自道为阵之法不过如此。刚刚入门，便认为已学到了师父的全部本事。对这样的学生，鬼谷子越来越失望，只能听之任之，而把主要精力都用以指导孙膑。庞涓表面上服气孙膑，内心却十分嫉妒。为了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对孙膑常怀陷害之心。

庞涓离开鬼谷子后，虽然不学无术，却因曾师从于鬼谷子而被人器重，加之他能说会道，善于自吹自擂，后来便被魏惠王封为将军。庞涓做了将军，并没有忘记孙膑。孙膑当时在齐国，齐国又强于魏国。庞涓怕孙膑被齐国重用后与自己为敌，便处心积虑地要去掉这个眼中钉。经过周密策划，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请孙膑到魏国做客。孙膑如约前往，庞涓却说孙膑来迟，怠慢了魏王，私自将孙膑处以膑刑，即剔除膝盖骨，使其不能行走。孙膑的原名史书未载，这次受刑后才改名孙膑，以示自己永不忘这奇耻大辱。

孙膑受刑后被囚禁在别室，他一边养伤，一边寻找逃回齐国的机会。后来，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一见机会难得，便买通看守的兵卒传出密信，要求齐国使者与自己见面。见面后，孙膑诉说了事情的原委，求使者帮忙离魏返齐。使者十分同情孙膑的遭遇，也十分珍惜这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便将孙膑藏在自己车中载回齐国。孙膑到齐国后，被齐将田忌待为上宾。一次，齐威王悬赏千金令诸公子赛马，田忌的马力不如其他公子，孙膑却说：“我能教

你获胜。”当时每个公子的马都有上、中、下三等，分别比赛，最后决定胜负。孙臆让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对其他公子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结果，田忌的马一负二胜，总分占先赢得千金。齐威王问田忌取胜之策，田忌乘机将孙臆推荐给威王。威王问用兵之道，孙臆应对如流。威王大喜，遂任孙臆为军师。从此，孙臆与庞涓各掌一国兵权，成了战场上的对头。

围魏救赵 大战桂陵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争霸，征战不断。起初，魏国占据中原要地，国势最强。至魏惠王时，国势转衰，东方的齐国却因田氏的掌权而强大起来，大有争霸中原之势。魏惠王一心要恢复强国地位，便不断对邻国发起战争。公元前354年，魏惠王通过外交手段与秦、韩、齐三国结盟，以便集中力量灭掉赵国。他派大将庞涓率军突入赵国，赵兵一触即溃，魏军很快便将赵国都城邯郸包围起来。赵国为救燃眉之急，向齐国求救，表示齐国如能出兵解邯郸之围，赵国愿将中山之地（今河北平山一带）割让给齐国。齐威王答应了赵国的请求，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引兵救赵。田忌要兵发邯郸，孙臆却认为不可。他打了个比喻说：要理清乱丝，不能强拉硬扯；要解开斗殴，不能加入同打。如今魏军围攻邯郸，我们如果进军邯郸，必然会与魏军有一场正面恶战，胜负难料。与其按一般战争规律打一场胜负未卜之仗，不如出奇兵打一场必胜之仗。现在魏军主力在围攻邯郸，国内必定空虚。我们如果避实就虚，发兵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定要回兵解救，这样既解了邯郸之围，我军又获得了半路截杀魏军的机会，岂不是一举两得。

一席话说得田忌心服口服，于是齐军浩浩荡荡直逼魏都大梁。魏惠王见齐军兵临城下，忙派人飞报庞涓，庞涓闻讯立即回师。孙臆探得庞涓大军南返，便指挥齐军弃大梁北上，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严阵以待。魏军北上南返，往来征战，已成疲惫之师；齐军一路西来，未遇抵抗，士气正旺，庞涓仗着匹夫之勇，一遇齐军便匆忙接战。齐军则以逸待劳，猛不可当。两军相交，胜负立见，魏军溃不成军，齐军大获全胜。史书上称此役为“桂陵之战”，“围魏救赵”的策略也因此脍炙人口，常被后代军事家借鉴。

孙臆设伏 庞涓丧命

桂陵之战后，魏国处境更加不妙。魏居中原，西有秦，东有齐，北有赵，南有韩，四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为了扭转不利局势，魏惠王决定北和南攻，与北方的赵国构和，集中力量打击南面较弱的韩国，力求将其灭掉，以扩大魏国的势力。

公元前 341 年，魏惠王派庞涓率兵伐韩，矛头直指韩国都城新郑（今属河南）。韩昭侯求救于齐，齐威王召众臣商议。孙臆说：“现在韩魏两国刚刚交兵，如果我们马上去解救，实际上就成了我们替韩国与魏国打仗，即便胜了，魏国恨我们，韩国也不会对齐国感恩太深，这样做不是上策。不如表面上答应韩国，却迟发救兵，这样既能使韩国在最危急的时刻获得援救，从而对齐国感恩戴德，齐军也不至于在与魏军交战中遭受太大损失。”齐威王依孙臆之计，遂复信韩昭侯答应驰救，却又久久按兵不动。

韩国得到齐威王答应出兵的承诺，自恃有了后盾，便调集全国军力，竭力抗击魏兵，结果五战皆败。孙臆见时机已到，便奏请齐

威王发兵。这次，齐军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仍以孙臆为军师。在孙臆的指挥下，齐军经博、莘等地抄近道直趋魏都大梁。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与魏惠王共商对付齐军之策。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又欲报桂陵兵败之仇，便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仍以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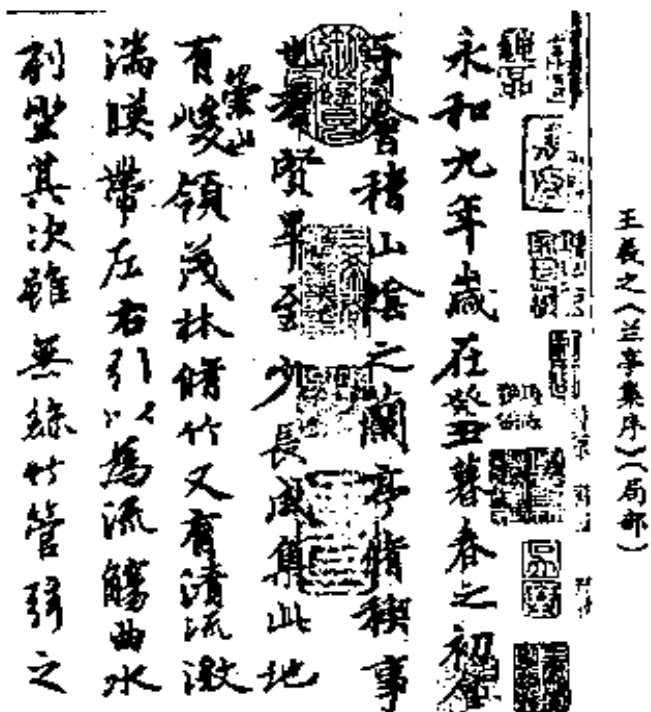
孙臆闻庞涓大军将至，对田忌说：“魏国虽刚从韩国撤回，军力有损，但庞涓起倾国之兵前来，意在报仇，哀兵可畏，只可智胜，不可力敌。”田忌问有何妙计，孙臆说：“庞涓有勇无谋，性格狂躁，向来看不起齐军。这次更是挟忿而来，求胜心切。我们不如后撤，以增其骄气，怠其心志，然后设伏兵击之。”田忌依其计而行。于是，齐军沿陶、曹、鄆一路后撤。孙臆又使用减灶之计，第一天让兵士挖十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第三天减为三万个。庞涓见齐军灶坑之数锐减，高兴地说：“齐军果然是乌合之众，刚撤退三天，就逃亡过半了。此时不乘胜追击，更待何时！”于是，留下疲弱之兵殿后，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孙臆计其行程，天黑时可抵马陵。此地道狭沟深，林茂草密，正宜设伏，便布阵以待。庞涓率军赶至马陵，天色已黑，便让兵士点火把照路。火光下，照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了皮，上写“庞涓死此树下”六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欲指挥军队后退，却因道窄难以掉头，人马拥挤，顿时乱成一片。沟旁埋伏的齐兵见火光亮起，便万弩齐发，箭似飞蝗。魏兵大乱，进退无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计穷兵败，大叫一声：“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太子申率后军赶到，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魏太子申，大获全胜。

马陵之战 影响深远

马陵之战虽是齐魏之战，实际上却成了战国历史的转折点。齐国两败魏军，一时成为东方强国。马陵之战次年，秦孝公派商鞅伐魏，大败魏军。魏国在不长时间内，两败于齐，一败于秦，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力耗尽，一蹶不振。而秦国却因变法而强盛起来，很快统一了河西关中之地，对关东诸国虎视眈眈。关东诸国被迫采取“合纵”策略，以期与强秦对抗。自此之后，战国由七国势均力敌逐渐变为六弱敌一强，秦国统一的最终结局，于此已见端倪。

马陵之战中，孙臆主张迟救韩国，运用的是卞庄刺虎的原理。春秋时鲁国卞邑大夫卞庄子见二虎相斗，不忙出击，而是隐于一旁观看。二虎斗够多时，弱虎被咬死，强虎身上也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卞庄子乘机出击，将强虎杀死，得二虎而归。孙臆迟出兵，意在借魏之军伤韩，借韩之军削弱魏军实力，最后使两国皆损，齐国独胜。在战术上，孙臆遇强敌而用智，遇骄敌而故纵，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不直捣大梁，则不能使庞涓退兵；不后撤，则不能诱魏军追赶；不减灶，则不能诱庞涓孤军深入。这三步连环计，最终都服务于马陵设伏。《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孙臆作为孙武的传人，可谓深得兵法精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马陵之战谁胜谁负都改变不了中国统一于秦的必然趋势；但孙臆在这一战例中所运用的军事计谋，实可谓千古战略与战术的佳作。

萧翼计赚兰亭序



被后人尊为“书圣”的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集序》，历来被众多书家推为“天下第一行书”，必欲一睹其真迹而后快，但如愿以偿者却寥寥无几。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王羲之书法的崇拜者。后来，他的一名大臣终于设计将《兰亭集序》真迹弄到了手，这个大臣便是时任监察御史的莘县人萧翼（事见《太平广记》）。

王羲之醉书兰亭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今山东费县）人。羲之早年学钟繇书法，后博览秦汉名作，书道日精。平生致力于楷、草两体，却以行书成就为最大。羲之曾任右军将军，故恒以“王右军”称之。孙过庭《书谱》说：“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好友共42人来到浙江绍兴兰渚山下的兰亭,按照古习举行修禊之礼,以消除不祥。这里群山合抱,曲水环绕,文人们一见,心旷神怡,便相约玩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他们将盛着半杯酒的酒杯放于上游的水面上,让其顺流漂下。文友们则一溜儿撒开,沿溪而坐。酒杯顺着弯弯曲曲的溪水漂来,到谁面前受阻停住了,谁便必须将此酒喝掉,并做诗一首。文友们在开心的游戏中忘却了平日的烦恼,也在诗作中抒发了各自的感慨。后来将这些诗集成一册,名为《兰亭集》,王羲之为此诗集自撰自书了《兰亭集序》。这顺意畅怀的酒后之作,竟成了王羲之的传世佳品。据说后来王羲之又重写过几次,但神韵上都不如当时的乘兴之作。《兰亭集序》的诞生,证明了艺术创作的偶发性和不可重复性。王羲之写《兰亭集序》这年四十七岁,《兰亭集序》成了他书法艺术的顶峰,后世学者将《兰亭集序》奉为“天下第一法帖”。宋代的米元晖曾为之写过这样的诗句:“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万金。”《兰亭集序》字字道媚劲健,婀娜多姿。文中20多个“之”字,写得形态各异,功力独到。整个作品章法严谨,静中有动,动中寓静,机巧万变,妙不可言,不愧为自然美和文人主体意识融合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历代文人仰慕兰亭书法,心摹手追,摹刻本不下几十种,形成了书法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兰亭集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

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区区 324 字，不但书艺精到，且文辞华美隽永，文中许多词句，常为后人引用。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心仪兰亭

世人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羲之本人也将这一乘兴之作视为不可多得的佳品，倍加珍爱，秘不示人，辞世之前又作为传家之宝留给子孙。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是个和尚，法名智永，出家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永欣寺。智永将传家宝珍存了一生，终因和尚无子，无法再传承下去。为了不使先人的墨宝落于俗人之手，智永临终前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心爱弟子辨才和尚。辨才也是个精通文墨之人，自然将师父的赠品视为珍宝。他亲手在自己卧室的木梁上凿出一个深洞，将《兰亭集序》密藏其中，从不轻易示人，只在夜深人静时自己偷偷地拿出来欣赏一番，过后又藏于原处，如此过了多年。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天下初定，有了些国泰民安的气氛。政事之余，李世民爱研摩书法，对王羲之的字尤为推崇。在他眼中，《兰亭集序》是空前绝后的“尽善尽美”之作。李世民收藏了一部分

王羲之的墨宝，但对他最欣赏的《兰亭集序》，却是只见过摹刻件，未能目睹真迹。对此，他一直引以为憾，不断派人寻找。后来听说此宝在辨才和尚手里，便下诏将辨才调入长安内道场做僧官，给予优厚待遇。几个月后，李世民在与辨才闲谈中将话题扯到了《兰亭集序》上。辨才说当初曾在师父智永那里见到过此物，师父圆寂后，历经战乱，不知流落何方。李世民无奈，只得将辨才放回越州。后来经多方调查分析，认为《兰亭集序》极有可能确在辨才之手，便又将其召进京来。如此往来多次，辨才坚不承认持有《兰亭集序》之事。李世民越是找不到书帖下落，就越是日思夜想，寝食难安。

有一天，李世民对臣下说：“朕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书法，以《兰亭集序》为最上品，朕心仪已久，梦寐以求，不将真迹搞到手，实在难以心安。经多方分析，此宝一定落到了辨才和尚手里，但他却拒不承认。辨才已经年老了，真迹放在他手里又没什么用，他死之后，宝物又不知会流落何处。朕决心要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搞到手。但正面索取已不可能，只有设计赚取，诸位爱卿谁能为朕办妥此事，朕将高封厚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道：“现任监察御史萧翼才艺双全，足智多谋。如派他前去，必能如愿以偿。”李世民大喜，遂召见萧翼，言明此事。萧翼说：“我若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前去索取，辨才绝不会将法帖拿出来。请皇上允许我以普通人的身份前往，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但臣有一个要求，请皇上把平时收藏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字帖借给我几件，以备作钓饵之用。”李世民欣然应允。于是，萧翼便化装成一个穷困潦倒的山东书生模样，带上李世民交给他的几件“二王”书法墨迹，搭乘商船顺洛水一路东下，直奔越州而去。

萧世翼计赚兰亭

萧翼，本名萧世翼，南朝梁元帝萧绎的曾孙。公元 555 年南梁灭亡后，萧翼逃到北方，在魏州莘县落户。这次他以山东书生的装扮去越州，原因就在于此。

到越州时，天已黄昏。萧翼步入永欣寺，佯作在巡廊中观看壁画。当经过辨才院门口时，便有意停足不前。辨才看见了萧翼，上前问道：“施主从何方来？”萧翼赶忙施礼答道：“弟子是山东人，到越州来卖些蚕种。弟子家境贫寒，却素喜书画，一路上所经寺院，都要进去观赏壁上作品，不想今日得遇禅师。”二人一说到书画，便有许多共同语言。辨才很欣赏萧翼的才华，便邀请萧翼到自己卧房中，弈棋抚琴，谈文说史，又作投壶、双陆之戏，情投意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辨才感慨地说：“我俩白头相识，却像多年的旧交一样融洽。今后我们倾心相交，不要拘束才好。”当晚，萧翼便留在辨才处。辨才拿出新酿美酒和时鲜果品，二人饮酒赋诗为乐。辨才乘兴口占一律道：

初酿一缸开，新知万里来。
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
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然灰。

萧翼亦吟诗作答，诗曰：

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
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
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
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

二人通宵长谈，至天明萧翼才离开永欣寺。傍晚萧翼又携酒入寺，再与辨才饮酒赋诗为乐。从此天天相聚，二人竟亲如手足，难舍难分了。

过了十多天，萧翼把曾祖父梁元帝亲笔书写的《职贡图》拿给辨才看，二人由此谈起了书法。萧翼说：“弟子素喜二王书法，自幼把玩临摩。且有几幅二王真迹，常带在身边。”遂出示辨才。辨才审视良久，说：“施主所持虽是右军真迹，但并非上品。老僧有一真迹，其贵重可谓举世无双。”萧翼问是何帖，辨才答曰：“兰亭集序。”萧翼笑道：“历经战乱，兰亭原件岂能幸存，必是伪作无疑。”辨才说：“吾师乃右军之后，生前亲手将此帖交付予吾，岂能有假！”第二天，辨才又将萧翼约到卧室之内，从屋梁上取出宝帖让萧翼鉴赏。萧翼看了一眼，故意挑出许多毛病，然后断然说：“果然是伪作！”辨才不信，二人遂争论不定。萧翼又将自己带来的几件书帖一起展于案上，二人共同比较切磋。自此，二人每天在一起研究王羲之书帖，有时还即兴临摹几幅。《兰亭集序》与其他几幅王羲之的作品都摆在几案上，天黑了亦不收起。

后来，辨才应邀到汜桥南严迁家中去吃斋饭，萧翼趁机来到辨才卧室。看门的童子与其相熟，并不阻拦，萧翼遂将自己带来的书帖连同《兰亭集序》一起席卷而去。萧翼回到自己下榻的永安驿站，对驿长亮明身份，让驿长速速报知越州都督。越州都督齐善行闻听萧御史奉旨来到，立即前来拜见。听萧翼说明来意及计取《兰亭集序》的过程，齐善行马上派人到严迁家中对辨才说：“皇上派来的御史要见你？”辨才不明原由，匆匆赶到永安驿，一见御史乃是与自己诗书相交多日的萧生，大惊。萧翼说：“在下奉旨前来取《兰亭集序》，今书帖已到手，王命在身，不敢迟延，即刻要回朝复命，特与禅师告别。”辨才一听，惊悔交加，立时昏倒，很久才苏醒过来。

唐太宗带走兰亭

萧翼带着《兰亭集序》，星夜兼程赶回长安，奏知皇上。李世民大喜过望。因为房玄龄荐人得当，赏锦缎千疋。萧翼计赚《兰亭集序》，使旷世珍品入于皇家，为国立了一大功，应获重赏，当即拜萧翼为员外郎，官位由八品升为五品；赐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里面皆装满珍珠；又赐内厩良马两匹，并配以珍宝装饰的鞍子和辔头；另外，在城内城外各赐给庄园一处。辨才和尚私藏国宝，秘不出示，犯有欺君之罪，本应加刑，今念其年老，免于追究。另赐绢三千疋，谷三千石，从越州府库就近发给。辨才得此赏赐，不敢私有，遂用以建造三层宝塔一座。辨才年事已高，又连遭惊恐，遂染病在身，饮食难下，一年后辞世。

李世民得到《兰亭集序》，如获至宝，从不轻易示人。为了不使王羲之真迹因传观而损坏，他命专门替皇家拓印碑帖的供奉官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各临摩数本，赐给皇太子和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卧于玉华宫含凤殿，召太子李治进见。李世民对这位皇位继承人说：“你是个很孝顺的人。我即将归天，临终前有一事嘱咐你，千万不要违背。《兰亭集序》乃国宝，为得此宝我费尽了心机，此法帖就是我的命。我命既绝，此帖不可独留世间。我归天后，须以此帖陪葬。否则，我死不瞑目！”李治不敢违先皇之意，遂将《兰亭集序》作为陪葬品封入昭陵。后来的《法书要录》中记述了此事。《尚书故实》中这样记载：“及奉讳之日，用玉匣盛之，藏于昭陵。”《谭宾录》中也说：“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五代时温韬曾掘昭陵，是否将此帖盗出，亦不可知。《兰亭集序》真迹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是冯承素摹本、褚遂良的临本和一些石拓本（如定武本），欣赏研究者只能观其神韵，再难睹其原貌了。

三槐王发祥莘县地



一九九一年重立的北宋名相王旦墓碑

王姓是中华第二大姓,据 200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王姓人口 8600 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4%。在王姓历史上形成的 21 个郡望中,就影响而言,三槐王列太原王、琅邪王后位居第三。三槐王的发祥地在今莘县莘城镇套庙王村,史书有记载,散居南方各地的三槐王后裔也一致认同。三槐王氏宗祠以“三槐堂”命名。北宋元佑六年(公元 1091 年),大文学家苏轼撰写了流传千古的《三槐堂铭》。第一个三槐堂建于开封,第二个三槐堂由王旦后人建于莘县套庙王村。

王练出任莘县尉

在汉字的演进史上,“王”始为象形字,状如火苗,“火盛为王”。后来变为会意字,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解释是:“三画而连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而连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王”用作姓氏，有四大源头，即舜时的妫姓、商代的子姓、周代的姬姓和来自域外的虏姓。三槐王氏源于姬姓。周的始祖名后稷，姬姓。至东周灵王时，长子晋被立为太子，人称“太子晋”。晋因直言敢谏触怒了灵王，被废为庶人。晋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虽然最终没能登上王位，百姓却仍以帝王视之，称其为“王子晋”，称其家族为“王家”。久而久之，晋的后人便以王为姓。后世的太原王、琅邪王、三槐王皆以晋为始祖，来历即在于此。

秦末，姬姓王氏后人王元因避秦乱迁居琅邪皋虞城（今山东即墨），后再迁至临沂，成为琅邪王氏一世祖。西汉末，王元之弟王威的九世孙王霸迁居太原，成为太原王一世祖。

东汉末年，姬姓王氏后裔中出了王祥、王览这对名噪一时的异母兄弟。王祥性至孝。母病思食鱼，隆冬无鱼可买，王祥乃脱衣卧冰，化冰求鱼，后被列入《二十四孝图》。王览性亦孝，且与异母兄王祥手足之情甚笃。母虐待王祥，王览每每舍命护之。西晋初，王祥官拜太保，进爵为公；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太傅，封即丘子。

东晋时，姬姓王氏后裔王导成为晋元帝司马睿的首辅。司马睿曾任琅邪（今山东临沂）王，与王导友善。司马睿称帝后，王导任宰相，王氏族中有多人身居要职，手握重兵，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的元、明、成帝在位期间，王导一直任宰相，是稳定东晋统治的重要人物，琅邪王也因而名声大噪。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琅邪王氏后人，他善行、隶，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被后人誉为“书圣”。

南北朝时期，姬姓王氏后裔王俭娶南朝宋明帝之女阳羨公主为妻。其曾孙王褒始在南梁任职，后任北周光禄大夫、少司空，封石泉康侯。

唐代，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携家迁居莘县（《初纂安徽柳巷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

尉，遂徙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此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有记载）。

关于姬姓王氏移居莘县的时间，史有两说。范仲淹为三槐后代王质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其先太原人”，至王言时才“占籍大名”。元代赵孟頫为王言撰写的简历《宋尚书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中亦说自王言起定居大名莘县。这是“王言迁莘说”。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纂修的《新唐书》和《三槐王氏家谱》则认定王练任莘县尉时携家居莘，这是“王练迁莘说”。王练和王言均为唐代人，王言是王练的六世孙。王练迁莘说见于正史，安徽滁州三槐王氏家谱中又有其先祖王练任莘县尉并携家居莘的明确记载，此说应十分可信。王练官职不大，其后代却不乏位高爵显之人。大官携家在外任职，其祖籍莘县并不为人知晓。至王言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黎阳（今河南浚县）令时，距莘县不足三百里，老家莘县才渐为人知。至王旦成名时，人皆知其曾祖父王言是莘县人，曾任黎阳令。以上各代情况不详，更不知王练曾任莘县尉之事，故范仲淹给王旦的侄子王质写墓志铭时，敢于断言王家由王言那一辈“占籍大名”。至元代赵孟頫给王言撰写简历时，距王旦所处的时代已近三百年，并没有注意到《新唐书》中关于王练曾任莘县尉的记载（县尉这官实在是太小了），而是对范仲淹的结论深信不疑，这也在情理之中。如此一误再误，王氏迁莘的时间便由王练时期变成了王言时期，阴差阳错地被推后了一百多年。

王佑预言成现实

王言之子王彻，五代后唐进士，曾任左拾遗、赠侍中，官不算大。王彻之子王佑，《宋史》有传。传中说他“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十七岁时，一封书信受到时任中书令的大文人桑维翰赞赏，

从此“名闻京师”。成年后先任后晋河北鄆都节度使杜重威的幕僚，归附后汉后被贬为沁州（今山西沁源）司户参军。后周时期，王佑先后任过魏县（今属河北）、南乐（今属河南）知县，怀才不遇，抱负无由得展。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王佑以监察御史身份任兗州（今属山东）知州，4年后改任知制诰。其后，又任过潞州（今山西长治）知州和大名府（今属河北）知府，后来因替符彦卿仗义执言被贬为地方官。宋太祖末年，王佑复回朝任知制诰，不久又被奸相卢多逊排挤出京，任镇国军（今陕西华县）行军司马。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才以六十四岁的年龄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即病死。王佑才华横溢，英名远播，文才人品皆在同僚之上，因而在朝中声誉颇高，大家都认为是个当宰相的材料；但其仕途却是才能难展，坎坷连连，以至壮志未酬，郁郁而死。他心有不甘，又见其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于逝世前不久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宋代，太尉、司徒、司空三要职合称“三公”，是众臣之首。据传，周代宫廷外植有三株槐树，百官朝见天子时，三公皆面槐而立，后人遂以“三槐”代指三公。王佑植三槐于庭，无非是要用以表达子承父志，大展抱负的愿望与信心。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王佑的三个儿子果然个个聪颖，先后踏入仕途；老二王旦更是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相位，使王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王旦，王佑次子，《宋史》中有其长篇传记。王旦自幼聪慧过人，且笃于学，其父常说：“此儿当至公相。”王旦生于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23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之后，王旦越来越显示出其非凡的才能，官位一步步攀升。他先后担任过大理评事、平江（今属湖南）知县、潭州（今湖南长沙）银场监理、著作佐郎、殿中丞、郑州通判、濠州（今安徽凤阳）通判、右正言、知制诰、集贤殿修撰、理检院知事、兵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审官院知事、银台驳司、

知贡举、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等职，一步步靠近北宋的统治中心。北宋咸平四年（公元 1001 年），王旦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不久又加拜尚书左丞。5 年后，王旦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登上了宰相之位，时年 49 岁。从此，王旦成了宋真宗赵恒的股肱之臣。赵恒称王旦为“致太平者”，几乎是言听计从。王旦辅佐赵恒十余年，期间独掌相权达五年之久，人称“太平良相”。王旦任宰相期间，又先后兼任集贤殿大学士、明德皇后园陵使、大行皇后园陵使、国史监修、天书仪仗使、封禅大礼使、兵部尚书、枢密院知事、祀汾阴大礼使、昭文馆大学士、恭谢太庙大礼使、玉清昭应宫使、玉清奉圣像大礼使、司空修宫使、景灵宫朝修使、天书刻玉使、司徒、恭上册宝南郊恭谢大礼使、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太保、太尉等要职，可谓位极人臣，荣极人臣，为百官所称羨。天禧元年（公元 1017 年）王旦病故后，赵恒废朝三日，亲临哭丧，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加谥号“文正”，并停止一切饮宴活动，以示哀悼。王旦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皆被授官。真宗赵恒还特别加恩，追封王旦的曾祖父王言为许国公，祖父王彻为鲁国公，父亲王佑为晋国公，皆累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分别追封王旦的曾祖母姚氏、祖母田氏、母亲任氏、边氏为许国夫人、鲁国夫人、晋国夫人、秦国夫人。

宗祠命名“三槐堂”

王佑有两位夫人：任氏和边氏。王旦系边氏夫人所生。边氏母家祥符县新里乡大边村（今属开封新里乡）。王旦病故后，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父家大边村，遵王旦遗嘱，葬仪从简，甚至连墓碑也未立。直至 38 年后的至和二年（公元 1055 年），时任枢密直学



保存于莘城镇王化村的“三槐堂”匾

士、右谏议大夫的王旦之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言及欲为其父立碑之事，赵祯慨然应允，并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字，嘱王素刻于碑额；又下诏命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碑文中说：“观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谓至哉。是以君明臣贤，德显名尊，生而俱享其荣，歿而长配于庙，可谓有始有卒。”于是，王素受钦命为其父立碑，并按照三公葬格建了墓道，配置了石人石马。旧时的大边村现在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厂址，1957年建厂征地时，此地尚有部分石人石马，当是王旦墓遗物无疑。

北宋元佑六年(公元 1091 年)，王巩、王震在开封县城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因有王佑手植三槐之事，故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并将宗祠命名为“三槐堂”，王巩好友苏轼特撰《三槐堂铭》以记之。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轰动一时，三槐王氏之名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北宋末，辽兵屡犯宋都，京城一带战事不断，加之黄河不断泛滥，王旦墓连连面临被淹之厄。于是，三槐王氏的后人决定将先人遗骨迁至故里莘县群贤堡村(后改称套庙王村)重新安葬，石碑、翁仲、石兽、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同时建宗祠三槐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

三槐王氏自王旦之后，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

士、右谏议大夫的王旦之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言及欲为其父立碑之事，赵祯慨然应允，并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字，嘱王素刻于碑额；又下诏命史馆修撰、翰林学



王巩墨迹

伦、王楠在《宋史》中均有传记,可见其影响之大。其中王巩以书法见长,其墨迹后来被收入《三希堂法帖》和《停云馆法帖》。正因为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故处于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一度被称为“群贤堡”。至清代中叶,因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当地人皆称其为“套庙王”,群贤堡之称遂渐被人遗忘。

据莘县旧志记载,王旦祖茔在莘县城东北二里之群贤堡(今套庙王)村东,占地十亩,“旧有神道碑数通及石人、石兽、望柱等,至明初尚存”。永乐年间改修会通河闸,将陵墓中之石刻件拉去镇邪,三槐王陵之地上物遂丢失殆尽。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莘县知县贾克中重修王旦墓。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堤甚高。十三年(公元1500年),知县孟隆重立王文正公墓碣一通”。从三槐王氏后人在套庙王建王旦墓至明弘治年间重修王旦墓,历时约四百年。明正德莘县志中所列“莘县十景”,“郊外名坟”是其一。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套庙王之三槐堂圯毁,知县杨得仁遂将原文庙的房屋加以修缮,易名为“三槐精舍”,用以奉祀王旦牌位。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知县蒋克家在县城内鼓楼东路南(今工商银行处)重建三槐堂,内供三槐王氏列祖列宗牌位,厢房系学子读书处。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槐堂被拆,“三槐堂”匾额被王氏后人辗转保存下来,现存于莘城镇王化村。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三槐堂外景照片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三槐堂匾额系楷书题写,今已不知何人所书。

三槐王氏后人众多,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出仕为官者,携眷属在外,后来随宋室南迁,今散居南方各省及东南亚国家;一是居家务农者,今日在莘县的聚居地是套庙王和王化,冠县、聊城、堂邑一带亦有部分后裔。近年来四川、安徽、福建等省的三槐王氏后裔纷纷来莘县寻根问祖,南方不少地方也建有三槐堂,三槐王氏作为一大望族已成为许多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王旦清正为官



泰山岱庙中的王旦蜡像

祖籍莘县的王旦是北宋真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宋真宗赵恒共在位 22 年，王旦在其手下连续担任要职 18 年。这 18 年中，有 10 年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宝座上。任宰相的 10 年中，又有 5 年是在独掌相权。这样稳定的君臣关系，在魏晋以后的封建王

朝中是不多见的。王旦久居相位，真宗对他又言听计从，他如果利用职权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卖官邀宠，贪污腐败，收受贿赂，广置田产，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但王旦却处处出以公心，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谋私利，更不以势压人，胡作非为。纵观他一生所为，完全当得起“清正”二字。在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笼罩下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这里且不说他如何帮助真宗处理内忧外患的国家大事，只说他日常待人处事的一些小节。从这些见于史书记载的小事中，已可窥见他清正为官的人品和节操。

知人善任 任人唯贤

王旦身为宰相，又得到真宗特别倚重，他要升谁的官，降谁的职，在皇帝面前有一言九鼎之重。正因为如此，王旦在荐人方面独具慧眼，且十分谨慎。

不用小人 王钦若是个善于耍两面派的人物，且善于巴结皇帝，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有一次真宗欲提拔王钦若为宰相（当时可以多人同时任宰相，但有主次之分），王旦坚决反对。他说：“任人须用贤人，王钦若绝非贤人，朝中大臣都有这样的看法。”直至王旦死后，王钦若才爬上宰相宝座，因而他常恨恨地对别人说：“王旦使我晚做了 10 年宰相。”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奸臣。

翰林学士陈彭年，为人奸诈，外号“九尾狐”。他两次找王旦要求升官，王旦都避而不见。又转而去求另一位宰相向敏中，向敏中把陈彭年留下的材料拿给王旦看，王旦闭目置之，不屑一顾。向敏中不解其意，王旦说：“这个人只知往上爬，别的一无所能。”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彭年的品行果如王旦所言。

反对要官 当时对宫内宦官有加封虚职的习惯，但所封之职都是观察留侯一类的低职。一个受真宗宠信的宦官临死前要求加封个节度使，王旦不同意，真宗也就没有这样做。连虚职都不许自己要，可见王旦对要官者之厌恶。

谏议大夫张师德是个有本事的人，两次登门拜访王旦请求晋升职务，王旦都拒之门外。张师德以为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求向敏中向王旦解释。王旦对向敏中说：“我多次在皇上面前夸师德品行好，有才干，没想到他竟两次登门要官。一个人状元及第后，重用只是早晚之事。如果再登门求官，让那些无门路可走的

人怎么办呢？”史料记载，后来张师德先后升任右正言、知制诰、吏部郎中、谏议大夫，都是王旦推荐的。

知人如镜 中书省请求让盛度任右谏议大夫兼开封知府，真宗征求王旦的意见，王旦说：“我估计盛度一定不情愿担任此职。”任命既下，盛度果然坚辞不受。原来王旦深知盛度虽有学识，但酷爱文学，对政事官位不感兴趣。真宗听说后感叹地说：“王旦知人如镜，总能使人各得其所。”

有一次，好友杨亿问王旦：“你看丁谓这个人怎么样？”王旦说：“丁谓有些才能，但治国道理懂得不多。任了要职，如有个贤能正派的人帮助他，或许能有个好结果；若是独自当权，必定误国害己。”后来丁谓当了宰相，终因勾结宦官恶僧，多行不法之事，被罢官抄家，死于异地。王旦的预言竟成事实。

爱护属下 许州知州石普有违法行为，朝廷的意见是派人到许州就地审判。王旦说：“石普是个武人，性情粗暴，不懂法典。如就地审理，他必自恃有功，妄生事端，对国家和他本人都不利；不如将他召回朝中问罪。”御史按王旦的意见办，果然一讯而服。朝中大臣都认为王旦这种安排既正了国法，又不使属下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堪称两全之策。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奉旨征兵，因军令太严且方法不当，士兵有哗变迹象。真宗问王旦如何处置，王旦说：“张旻忠心为朝廷办事，只是方法有些粗暴简单，如加罪于他，恐伤其他武官之心；若镇压闹事的兵士，又必扩大事态。不如将他调上来当个文职军官，既解了他的兵权，又能平息众怒。”真宗采纳了王旦的建议，果然各方皆无异议。

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向王旦辞行，王旦只说了一句话：“东南一带的老百姓已经很困难了！”言外之意是，你去了之后要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听命于朝廷的同时，多为老百姓办些好

事,改变一下他们的困难处境。薛奎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公含而不露,一语中的,真有宰相风度!”

不遗贤才 寇准当宰相比王旦早。后来寇准被人诬陷罢官,王旦才当了宰相。因此,寇准一直认为是王旦将自己挤下去的,因而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坏话。真宗将此事告诉了王旦,王旦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虽然年龄大些,但治国经验不多,寇准能向你坦言我的得失,正说明他的正直忠诚。对这样的官员,朝廷应当重用。”王旦死后,寇准复登相位。寇准向真宗谢恩,真宗说:“这事不用谢我,要谢王旦。王旦临死前对我说:‘目前朝中唯一可担当宰相重任的人就是寇准。’”寇准一听,感慨万端,并深深自责,自愧不如王旦。

不图回报 王旦很受真宗信任,他推荐的人真宗一定重用。正因为如此,他对荐人十分谨慎。对那些言语中流露出一些才华或有些名气的人,他不忙于推荐,而是先暗中察其言行,再当面询问他对朝政利弊的看法,有的还要让其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稿呈上,从中选出优秀的,暗中把名字记下来。到了需要提拔官员的时候,就秘密地写上几个人的名字交给皇上,由皇上作最后决定。王旦推荐的人,外人很少知情,被荐者也大都浑然不觉,不知官运为什么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检阅内廷保存的奏章底稿,才发现朝中有很大大一部分要员是王旦推荐的。

严以责己 宽以待人

王旦身为宰相,对自己要求一贯严格,出了问题自己首先承担责任;对别人则宽大为怀,从不责备求全。

身正不怕影子歪 有一次真宗作了一首《喜雨》诗,拿给枢密院和中书省的官员传看。王旦看后对王钦若说:“皇上的诗中误写

了一个字,是不是呈进去改过来?”心怀叵测的王钦若说:“一字之误,无碍全诗,不必改了。”背后却把诗中有误字的事告诉了真宗,并颠倒黑白地说王旦明知有误,却不让改。真宗责备王旦,王旦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连连请罪。马知节了解实情,详细告诉了真宗。王钦若此举不但没有达到打击王旦的目的,反而使真宗对王旦更信任了。事后群臣纷纷议论:“王公大度能容,真宰相器也!”

勇于承担责任 有一年宫中发生火灾,王旦立即上表请罪,请求皇上追究自己的失职之罪,免去宰相职务,真宗不允。后来查明火灾是荣王宫一侍婢盗卖宫中金器,恐被发觉,故意纵火所致。纵火者被处死,失职与知情不报者也当斩首,案件涉及一百多人。王旦对真宗说:“罪犯已受到应得的惩罚,以我为首辅的朝中大臣也都上书请罪,如再归咎别人,岂不失信于民?”一句自担责任的话使一百多人得以幸免。

有个占卜师上书议论宫中事情,被处死刑。抄家时发现了一些朝中官员向占卜师求问吉凶的书信。真宗大怒,要将这些人交监察御史问罪。王旦说:“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只要不议论朝政,不应问罪。”真宗仍怒气不息。王旦取出自己曾用过的占卜之书让真宗看,并说:“我年轻时也常做占卜之事,如要问罪,臣亦不免。”真宗这才消了气,赦免了受牵连的官员。王旦回到中书省,立即将抄出的信件一火焚之。后来又有人想借此事整人,因无证据,终未得逞。

不挟嫌报复 有一次,王旦掌管的中书省往寇准掌管的枢密院送的文稿中有些失误,寇准告诉了真宗,真宗责备了王旦,有关人员也因此受到处罚。时隔不久,枢密院送往中书省的文稿中也出现了失误,办事人员高兴地拿给王旦看,想让王旦告诉皇上,来个以牙还牙;王旦却让他们退回枢密院改正后再送来。寇准知道后很惭愧,见了王旦赞叹地说:“老朋友,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度量?”王旦一笑了之。

寇准在边关做生日，造假山，搭长蓬，大摆宴席，穿用之物既奢侈又超格。有人奏知真宗，真宗很生气，对王旦说：“寇准做什么事都想模仿我，这怎么行？”王旦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寇准实在是个贤能之臣，就是好办点傻事，真拿他没办法。”一句话把寇准的问题由大事变成了小节，真宗也顺水推舟地说：“对，这样做确实是傻。”寇准因而逃脱了一场大祸。

是非分明 大智若愚 陈彭年等人曾劝王旦说：“平常议事时，有些奏章未经皇上过目你就擅自批复，恐怕别人会说你专权。”其实这是真宗特别授予王旦的权力，其他大臣不知内情。但王旦并不解释，更不以皇上之名压人，只是很谦虚地感谢他们的关心。真宗得知后，对陈彭年等人说：“王旦在我身边多年，我知道他禀公处事，毫无私心，我早已告诉他小事可以自行做主，你们要好好维护他。”陈彭年等人为此特去向王旦道歉，王旦却说：“我身居高位，正需要大家的监督和帮助。”对此事毫不在意。

御史中丞王嗣宗好言人短，常以诬陷为能事。为了诋毁参知政事冯拯，王嗣宗有意与王旦之弟王旭结交，以便寻机进言。王旦察知此事，反而有意处处出面保护冯拯。王嗣宗心怀愤恨，王旦却泰然处之。

主动避嫌 王旦步入官场不久，真宗就发现他是个堪当重任之才，连连提升。当真宗要加封王旦任知贡举等掌管官吏审选的要职时，王旦的岳父赵昌言正任参知政事（副相）。为了避嫌，王旦再三向真宗辞去了这些别人求之不得的重要职务。两年后赵昌言出任凤翔（今属陕西）知府，真宗当天就加封王旦为知制诰，并给予特别赏赐。

王旦的弟弟王旭为官清廉，才气过人，真宗欲委以重任，王旦以避嫌为由坚辞。真宗说：“前代兄弟同居要职者不少，朝廷任人唯贤，岂能因为你浪费了王旭这个人才？”王旦退了一步说：“实在要

提拔他，可以封个虚职。”真宗无奈，只能让王旭做了个有职无权的三司判官。

王旦的女婿苏耆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真宗不知其关系，问王旦：“此人如何？”王旦不置可否，苏耆因此没被选中。殿试过后，枢密院知事陈尧叟埋怨他说：“苏耆才学过人，你说一句话他就能入选，为何闭口不言？”王旦说：“国家以才选士，自有一定标准；我身为宰相，岂可自荐亲属。”

王旦的另一个女婿韩亿献文应试，真宗知其关系，欲召试加官，王旦坚决不同意，力辞得免。后来，韩亿按惯例被派到蜀都任职，地僻路远，无法带家眷。王旦劝女儿说：“韩亿入川后，你可回娘家居住，不必忧虑。我若求皇上将韩亿留京任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不贪恋官位 50岁以后，王旦体弱多病，自觉精力不继，怕贻误朝廷大事，连连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这种自请辞职的做法在历代担任宰相职务的人中是不多见的。真宗感到王旦是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膀臂，坚持不允。他先是用诏书给予褒扬鼓励，后来又当面劝说，并不断给其加封兼职。真宗越是重用，王旦越感到精力不支，难以胜任，怕一旦发生失误会使国家大事受损，过了几年，他继续上书辞职。真宗又特许他不必每日上朝，每5天面见皇上一次即可；遇有军国大事，再随时入朝参议。王旦再托其他朝臣向真宗言明苦衷，真宗仍不应允，但对王旦不再加官，只加封邑。后来真宗见王旦确实形容憔悴，十分可怜，才勉强同意其辞去宰相职务，以太尉身份兼玉清昭应宫使。按宋朝惯例，玉清昭应宫使必须由宰相兼任，王旦辞去宰相仍兼此职是真宗的格外优遇。王旦辞去宰相职务后便一病不起，终于在60岁那年逝世。

王旦在朝中任要职多年，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益；别人有事，他却全力帮忙。《宋史·王旦传》中说：“旦任事久，人有谤之者，

辄引咎不辩；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辩者辩之，必得而后已。”这是对王旦人格的公正概括。正因为如此，真宗信任他，依赖他，臣僚们敬重他，佩服他。王旦连续执政多年，始终以“贤”闻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清廉节俭 至死不渝

王旦在为官期间，十分注重作风的清廉和生活的俭朴，时刻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宋王朝一统天下不久，就刮起了一股奢靡腐败之风，一些朝官公然贪污受贿，并将搜罗来的钱财大肆挥霍。在王旦之前任宰相的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弄得鸡毛堆成山。在王旦之后任宰相的丁谓，勾结宦官，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宋史》）。仁宗时的宋祁整日点华灯拥歌妓醉饮，有人问他：“你还记得上学时吃咸菜的事吗？”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当年吃咸菜，不就是为了今天做官享福吗！”王钦若知贡举时，公然和妻子一起收贿卖官，一个进士就卖 350 两。尚书左丞蒲宗孟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 10 只，燃烛三百。淮南转运使魏兼到南方赈灾，却不分昼夜地用赈灾粮款饮宴作乐，以至当地出现了“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的民谣。在这种奢靡之风包围下，王旦的清廉之风就更显得鹤立鸡群了。王旦在朝为官 27 年，史书中竟无一点贪赃奢侈的评议，有的只是对王旦廉洁节俭的记述和赞赏。

不尚奢华 王旦家中的被服用具皆务求朴素，不尚华丽。家里人想用绸子把常用坐垫包起来，希望好看一些，以与王旦的宰相身份相称，王旦坚决不同意。王旦的弟弟王旭在街上相中了一条玉带，想买又怕哥哥反对，便拿回来给王旦看。王旦让他系在腰间，然

后问：“你自己看着好看吗？”王旭说：“我自己看不出来。”王旦说：“系上这么重的东西，自己又看不见，只能让别人看，这不是自找苦吃吗？”王旭明白了哥哥的意思，赶紧把玉带退了回去。

王旦从不大摆宴席为自己庆寿。王旦逝世的前一年，真宗知道了这种情况，觉得一个堂堂的宰相，年龄那么大了，威望那么高，身体又不好，也该象模象样地做一次寿了，便在王旦生日那天自作主张赐给酒肉米面，并指令有司负责搭棚，开封府负责组织乐队，特许王旦宴会亲友并属下诸官。王旦力辞，真宗执意不允，最后终于违心地过了一次（也是一生唯一一次）有家庭以外的人参加的寿诞。

不置田宅 王旦常说：“子孙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老一辈人多置田产没有好处，弄不好会使他们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性，甚至为争田产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真宗见王旦的住宅过于简陋，多次要帮他营建，王旦总是说：“这是前辈的旧居，我不忍心拆掉。”后来门墙坍塌了，管事的人施工修缮，临时在旁边开个小门出入。王旦骑马回家经过小门，总是小心地低头伏鞍而过，没有一句怨言。

不蓄声妓 王旦位高名显，家境殷实，却终生只娶一妻赵氏，不纳妾，不蓄声妓，这在当时纳妾押妓成风的官场中是绝无仅有的。

王旦给子女定婚，也不大讲究门当户对。史书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没有举例说明，想来一定言之有据。在门阀观念很重的封建时代，能不在声望地位上斤斤计较，也应算是难能可贵了。

不受私请 《宋史·王旦传》中说：“旦为相，宾客常满，无敢以私请。”座中客常满，说明王旦人缘好；没人敢以私事相求，说明王旦的原则性已为众人所知。除皇上赏赐外，王旦不收受任何人的东西，也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他人谋私利。王旦的子孙，多是经科

举之路进入仕途。只是在王旦死后，其已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夫人才因王旦之故得到皇上的荣誉封号，儿子才得以各加一官。可以想见，如果王旦在世，连这些荣耀他也会坚决谢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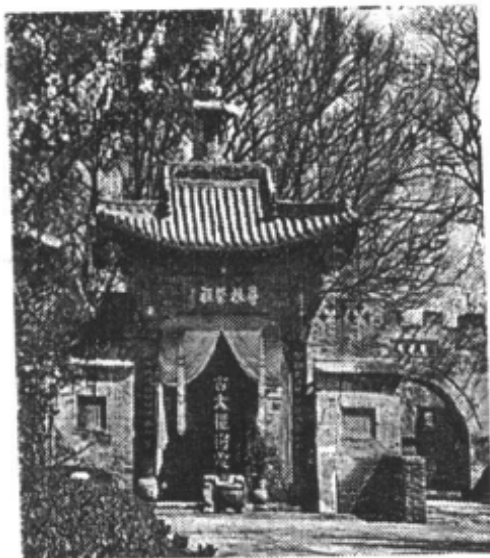
不摆架子 王旦上下朝，总是骑马往返，从不坐轿，他不愿让轿夫为抬自己累得满头大汗。在家中，他对弟弟和守寡的嫂子十分尊重，从不发怒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王旦生性好洁净，饭菜偶而不太干净，他仅是少吃一些，从不埋怨或训斥。有一次，家人故意在肉汤中弄上一点灰，他默默地只吃饭不喝汤。问他为什么不喝汤，他说：“我这几天不大喜欢肉味。”后来家人又故意在饭里弄上一点灰，王旦仍不发急，只是说：“我今天不想吃饭，再给我煮点粥吧。”

不要厚葬 王旦临终前，将好友杨亿请到病床前代写遗表。王旦再三对杨亿说明：“我虽然做了几年宰相，但绝不能临死时为亲友求官。遗表中只写我平生经历，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

在给家人的遗嘱中，王旦告诫子弟：“我们王家素有清名，你们一定要保持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我死后，不要厚葬，棺木中不许装金银珠宝。”真宗赏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坚辞不受，请人代笔写奏章向真宗申明自己的态度，并亲自在奏章后面加了一行字：“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意思是说：金银乃身外之物，多了也没什么用处，只会成为祸根。不如将此分散给大家，以免招来灾殃。写完之后，派人连同金银一起送回宫中。真宗不同意，强令再抬回来。谁知刚走到门口，王旦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就是近千年前的宰相王旦。

明初东昌大移民



山西省洪洞县古大槐树处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曾有过一次历时近五十年、由官府组织的向中原地区的大移民,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历史所罕见。当时的鲁西(包括东昌府和兖州府的西部)是移民的集中安置地之一。此事史书中虽无十分详尽的记载,但民间的宗族谱牒中却屡见不鲜。“要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老家名字叫什么?山西洪洞老鹳窝”的民谣更是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大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全国人口分布极不平均之势。黄淮和华北一带地广人稀,一片荒凉景象,晋南、湖广和山东的登、莱二州等周边地区却人满为患,地不敷耕。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多多,归纳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

兵祸频仍 元朝统治时期,民族歧视十分严重,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处于最下等地位。统治者认为“汉人无补于国”,遂令

“空其人以为牧地”，这一歧视政策使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业流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走投无路的贫民纷纷揭竿而起，相继爆发了台州的方国珍起义、刘福通的红巾军起义、蕲州的徐寿辉起义、濠州的朱元璋起义、泰州的张士诚起义。为镇压农民起义，元军攻城掠地，掳掠杀人，行为极其凶残。《元史》中多见“拔其地，屠其城”、“斩首万余级”、“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民十亡七八”、“赤地千里”的记载。《明太祖实录》中说，扬州城被元军攻陷后，全城被屠，只有 18 家幸免，这 18 家绝对不会是平民百姓。朱元璋得天下后，用移民之法恢复生产，农民刚得到一些休养生息，接着又发生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为夺取皇位，率军从北京攻向南京，中原地区再遭大难，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燕王扫碑”。在这次战争中，燕军屠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凡敢于抵抗或维护建文帝统治者，有一人杀全家，有一户杀全村。据《明史》记载，真定一战，燕军“暂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临清肖寨村李氏族谱中有这样的描述：“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在接连不断的兵祸中，中原农民死的死，逃的逃，有许多村庄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

天灾为患 俗话说：祸不单行。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农民除累遭兵燹外，还屡遇水、旱、蝗、疫之患，无异雪上加霜。东昌府和所辖各县的旧志中频见自然灾害肆虐的记载，《元史》、《明史》和《明太祖实录》中也多有描述。仅元朝统治中原的最后 10 年间，鲁西一带的旱涝灾害就达 18 次之多（《元史》）。下游的黄河向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加之元朝统治者对黄河放手不管，甚至连决口也不堵，造成黄河自由泛滥，致使中原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身，不少地方人烟绝迹。《元史·五行志》记

载，从元至顺元年到明洪武二年（公元1330至1369年）的四十年间，波及中原地区的黄河决口就达七次之多。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七月，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大水，“水出平地丈余，禾稼庐舍漂没甚众”。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53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圯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55年）秋，“东平、东阿、平阴三县河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房，伤禾稼”。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公元1341至1365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大蝗灾共有十八九次。从元统三年到至元六年（公元1333至1340年）的七年中，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就达十五次之多。水、旱、蝗灾加上瘟疫流行，于是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杀其子而食”、“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等令人惨不忍闻的现象。这些资料皆见于《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看来不是统治者自己往脸上抹黑。

天灾人祸造成的最大恶果便是大批农民的流离失所。土著之民，十不存一；官家租税，累年不入；村落之内，十室九空。受害最烈者，当属冀鲁豫交界处。当地有一个传说：有人在冀鲁豫交界处的一个十字路口摆上一锭元宝，三天之后再去看，竟然原封不动。这个传说不是说此地民风已到了“路不拾遗”的境界，而是证明这里确实已是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了。因为人口大减，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县合并、州降县、府降格的做法，仅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就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多个直隶州降成了县。中原的荒凉，由此可见一斑。

中原生民涂炭，晋南却是另外一种景况。元末农民起义时，那里有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元将扩廓帖木耳（绰号“王保保”）镇守，加之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故起义军皆知难而退。“燕王扫碑”之战，南北征杀四年，这里又因地处偏僻未被殃及。中原地

区闹大灾荒时,这里却因地处黄河中游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今天下劫火燎空,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可见晋南与中原生存环境差别之大。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山西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便纷纷来此谋生。这样一来,中原一带人烟稀少,晋南地区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初统计,当时河北、河南的总人口仅 378.4 万人,而山西一个省的人口就达到 403.4 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人口均衡、天下太平,明朝统治者把移民提上议事日程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移民的具体实施

明太祖朱元璋一登上皇位,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不少大臣亦纷纷上书皇帝,陈说移民的必要性。督府左断事高巍在奏章中说:“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藁葬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户部郎中刘九皋在奏折中陈述:“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璋因此谕令户部侍郎杨靖:“山西民众,宜如其言。”这八个字实际上就是一道大移民的命令。

明初大移民,始于洪武三年,止于永乐十五年,历时近半个世纪,其间有多次大的行动。今聊城市辖区内许多村庄的族谱中有不少说是自山西迁此,但时间不一,原因就在于此。当时移民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遣返,二是屯田。遣返是将中原地区流入山西

之民遣回原籍；屯田分军屯、商屯、民屯数种，其中最多的是民屯。民屯就是将山西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之户迁到地广人稀的中原或北方地区垦荒种地，规定几年内不纳赋税。山西的移民对象集中于晋南，因为就全省人口稠密度而言，首推晋南，晋南又以平阳府为最。晋南共有 51 县，平阳府就占了 28 县。平阳府所辖各县中，又数洪洞县人口密度最大。且洪洞地处交通要道，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故自然而然地成了移民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洪洞县居民外迁任务重，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将洪洞当作了移民的集散地。按当时官府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洪洞县志资料），其余的皆按律外迁。官府还规定，凡外迁之民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按照官方指定的去向，在官兵监护下从广济寺门前的大槐树下出发，分赴中原及各迁民目的地。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何况山西又是富庶之乡，舍富乡而就贫地，绝大多数农民自然很不情愿。于是，官府便采取了一些招诱、征派的强迫措施，甚至用长绳串捆起来，由官兵强行押送，那种“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生离死别是可以想象的。后来有人说“解手”一词来源于移民，又说鲁西人好倒背手走路也是在移民路上形成的习惯。此说虽有些牵强，但也不无道理。移民们离开洪洞时，真可谓一步一回头，开始还能看见广济寺，后来便只能望见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了，所以人们便把洪洞县、大槐树和老鸹窝这几个名词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成了祖根的象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群众中所说的“老鸹窝”实乃“老鸮窝”之误。鸮是一种大型涉禽，形似鹤，夜宿高树，主食鱼、蛙。洪洞县地处汾河之滨，鸮鸟颇多，常在槐树上筑巢。因中原地区多老鸹（乌鸦），故而后来有此误称。

据有关史志记载，明初山西共有 18 次大规模移民行动，其中

迁往河南、鲁西一带的就有 10 次。“明太祖洪武年间，屡移山西民于……鲁、豫等处”（《续文献通考》）。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九月，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零七十二顷”。是年十一月，又以“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为由，“命后军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愿徙者，验丁分田”。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十二月，“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鲁西、河南一带有一半左右的村庄是明初建立的。因为这种移民均带有屯田性质，故村名中多有“屯”、“营”、“寨”等字样；也有一些村是以姓氏或生产行业、地理特点命名的，村名来历比较复杂。为了使移民得以顺利进行，明朝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落户后可以“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等。但也有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如同宗同姓之民不能迁居一地等。为了便于日后相认，移民中的同胞或同宗兄弟常有打破铁锅各持一块的做法，由此产生了“打锅牛”、“打锅刘”之类的称谓。还有一些同宗兄弟为了能生活在一地，便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改作不同姓氏，这种异姓同宗的例子在鲁西一带也屡见不鲜。“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概由此而来。

明代，东昌府辖恩县、武城、清平、夏津、丘县、馆陶、堂邑、冠县、平山卫、博平、茌平、莘县、朝城、观城、范县十五县和高唐、临清、濮州三个直隶州。在这十八个州、县级单位中，接受移民最多的是莘县、临清、夏津、茌平、清平、高唐，另外还有当时隶属兖州府的东阿、阳谷和寿张。仅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 年）由山西潞、泽二州迁往临清的移民就有一千户之多（《明太祖实录》）。明初的鲁西移民，以洪武年间为最多，永乐年间次之。临清肖寨李氏族谱序中说：“尔近溯之，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定鼎之后，东省户口零落，遂移于清邑居焉。”该村张氏族谱序中也说：“张氏系出于山西之

洪洞……自有明奉敕迁徙清源，遂聚族而家焉。”台前县八里庙村贺氏族谱中说，贺氏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自山西洪洞“迁于兖州府东阿县西南张秋镇”。似这类记载，各县、市、区民间族谱中比比皆是。另外，洪武二十五年还曾徙青州、登州、莱州无地可耕农民五千六百二十五户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徙登、莱二州无地少地贫民一千零五十户至东昌编籍屯种。虽然当时迁往东昌府的移民总数史无记载，但从史书的零星资料和众多民间族谱记载分析，移民的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皆为史所罕见。

大移民的深远影响

明初大移民虽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但从当时的形势看，移民确系强国富民的战略需要。从效果上看，总的方面也是积极的。归纳起来，其作用和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户口增殖 元末，全国户口锐减，且人口分布疏密不均。明初的50年中，发生在山西的大规模移民共移出人口近百万（侯伍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其中迁到山东的有10到15万之多，且多集中于鲁西。移民之后，窄乡移往宽乡，窄乡人多地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宽乡的荒地得到了开垦，人皆有其田，农民的休养生息大大加快，最明显的标志是户数大增，人口大增。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全国共有1065万户，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就增加到5605万户，12年中户数增加了四倍多。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山东全省共有75万户，到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变成了108万户。100年中增加了30万户、150万人，且所增加人口大都集中在鲁西。洪武八年（公元

1375年),东昌府共有24029户、110192人,至天顺年间的不足百年内,就发展到了54239户、424494人,其增长幅度是十分可观的。

二、农田扩大 移民初期,明朝政府的规定是垦荒地三年内免交赋税;洪武二十七年又规定,额外所垦之荒,“听其自有,永不征税”,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农田的迅速扩大。按《明太祖实录》所载资料推算,从洪武元年到十四年,全国垦荒总面积为1803170顷。洪武元年全国农田总数为180多万顷,至洪武二十六年已扩大到8567623顷;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7亩,这无疑是一组很有说服力的数字。

三、粮食增加 地多了,粮食产量必然迅速攀升。《明太祖实录》提供的资料是:元末全国岁入税粮12114700担,至明洪武二十六年增加到32789800担,20多年中增加二倍,这种变化的出现也不能不归功于一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活动。

四、文化交流 范围广大的省际文化交流是明初大移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副产品。元末,中原灾民西流,将中原文化带到了山西;明初,山西农民东迁,又将山西文化带到了中原。即以棉花种植为例,棉花在我国原产于湖广、江南一带,元代传到了山西。明初,移民们又将这种种植技术带到了中原,使冀鲁豫乃至北京一带都开始种植棉花,济南、东昌、兖州三府更是成了棉花集中产区。应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聊城地区靠棉花打农业翻身仗,其中也有大移民的一份功劳。

随着移民的不断东来,民俗方面也出现了西风东渐之势,许多山西民俗被带到了中原。当年东昌府的移民多来自山西的泽州、潞州,泽州的地方剧种“泽州调”也被带到了鲁西一带,民间称为“本地傩”,后来习称“枣梆”。可以看出,这个剧种名称中就含有“山西人”三字,足可见山西移民不忘故土的情怀。鲁西人过寒食节也是从山西带来的。寒食节是纪念春秋时介子推的节日,介子

推是山西人,山西人最早纪念他。后来移民将此习俗带入中原,很快便在更广大的区域内流传开来。从方言来看,今天鲁西一带的许多方言词语都源自洪洞方言,如:外祖父母叫姥爷、姥娘,年老称上岁数,无说没,没注意称不细顾,赶说撵,面叶称豆旗子,以手掩物称捂,骂称卷,去年说年时,昨天称夜几个,麻雀称小虫,蝙蝠称夜蚂虎,用手提东西称提溜儿,受拘束称拿捏,厕所称茅子、茅房,肥皂称胰子,做梦叫发吃怔,春节称年下,啥时候叫多会儿,散戏叫煞戏,刚才叫将才,打嘴巴叫掴,责备人叫嚷、吵,腋下称胳肢窝,食品腐败叫斯气,让牲口后退叫稍,等等。可以说,如今鲁西人的一言一行中,无不打着当年大移民的深深烙印。

野猪林遗址碑文

据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记述,北宋末年,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遭高俅陷害,刺配沧州,好友鲁智深暗中随行保护,在野猪林挫败了差人加害林冲的阴谋,使林冲绝处逢生。后来林、鲁二人均被逼上梁山,与宋江等共举义旗。历史上确有野猪林其地,地在观城东约八华里处,树茂林深,常有野猪出没,“野猪林”之名由此而得。后有猎户在此定居,繁衍成村,林名遂成村名。野猪林东临徒骇河,南望马陵道,村东有坑曰“元宝坑”,村西有路曰“汴沧道”,乃古沧州至汴京必经之地,其地理位置正与《水浒传》记述相吻合,可见书中叙说当有所本。明代野猪林属在坊堡管辖,《正德观城县志》有记载,现属山东省莘县观城镇。一九五八年村中住户分别迁至朱庙、马沟等村,树木亦被砍伐殆尽,野猪林村不复存在。为存念家乡古迹,莘县台属联谊会会长赵德亮之父、祖籍朝城南街之台胞赵宪廷先生慷慨捐资勒石,聊城地区政协工委主任许继善挥毫题字。值此新碑落成之际,特撰文追述,以为永记。

(杨巨源 撰)

榆林军反明抗清

从明崇祯十二年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 1639 至 1673 年），爆发了一场以范县城（今莘县古城镇）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人称“榆林军”起义。起义历时 34 年，波及范县、朝城、观城、阳谷、寿张、梁山的大部地区，给日暮途穷的明朝统治以沉重打击，也使初入中原的清朝统治受到了强烈震撼。

明末清初，曹、濮二州所辖的范县、朝城、观城、郛城、成武一带，屡遭水、涝、蝗、旱等灾害。翻开这些县的旧志，触目尽是这样的记载：

崇祯五年，大水。

崇祯十年，大旱。

崇祯十二年，淫雨成灾。

崇祯十三年，大旱，斗米一两二钱，草根树皮食尽，至有骨肉相食者。

崇祯十四年，瘟疫流行，秋遭蝗灾，越城逾屋，树木压折，平地积蝗尺余。

顺治元年，春夏无雨，连年饥荒。

顺治十年，黄河决于金龙口，莘县、朝城、范县、阳谷、寿张、聊城、博平之间皆可行船。

康熙三年八月至次年五月，无雨，禾稼枯尽赤地百里。

……

曹、濮二州受灾，尤以临黄县份为重。黄河的滚滩和泛滥，致使大片农田变成荒滩，无法耕种。农民失去了土地，便失去了赖以糊口的生计，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成千上万的饥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农民起义呈一触即发之势。洪水造成的荒滩，夺去了农民的衣食之本，却造就了大片的榆林。榆钱随风飘洒，落在潮湿的滩地上便生根发芽，一片片的榆树一年年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榆树林。无家可归的饥民便成群结队地住进榆树林中，搭起简陋的草庵避雨，采集榆钱、榆叶、榆树皮充饥，榆林一时成了饥民的家园。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梁山县的李青山首先举起义旗，率领饥民拿起刀枪，反抗官府，打劫富户，开仓放粮。当时的明朝统治已是朝不保夕，官员们闻风而逃。义军占领了县城，取消了税赋，饥民们群起响应，好消息不胫而走。与梁山仅一河之隔的范县饥民听到消息，很受鼓舞，他们从梁山农民的义举中看到了希望，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在群众中紧张地酝酿着。

这年年底，随着农民最难过的“年关”的临近，暴动的酝酿也基本成熟。古城西仓的梁敏聚集了数百人在榆林中安营扎寨，白天外出打劫富户，夺取衣物钱粮，找铁匠打造兵器，夜晚潜回榆林中隐蔽。无边无际的野生榆林成了暴动饥民隐身的绝好去处。大家有衣共穿，有粮同吃，以榆林为家，有刀枪自卫，这种生活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有很大的号召力。有些饥民本来就生活在榆林中，这时便顺水推舟地加入了起义队伍。到次年春天，义军已发展到3000多人。他们以榆林为大本营，同时派出部分人员进驻玉皇庙、前后冯固等十余个村庄，以便打探消息，寻找进攻目标。义军在榆林中搭建住房，又挖了许多四通八达的地道，既可作栖身之所，又可当作存粮储物的仓库。如有官兵来犯，还可以通过地道往来转移接应。官兵也曾来过几次，但义军隐于榆林中，进可攻，退

可守,官兵只在榆林边上打转,却始终未敢深入榆林一步。义军生活在榆林中,昼出夜伏,伸缩自如,生活得逍遥自在。在商量给义军取名时,梁敏说:“咱以榆林为家,靠榆林起义,就叫榆林军!”从此,“榆林军”的名字传遍了四方。后来,一些官府的文告中称其为“榆园军”,《辞海》的条目也采用“榆园军”之说;但在当地,榆园军的称呼始终不如榆林军响亮。

清顺治入关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因忙于肃清明朝残余势力,一时无暇顾及地方上的小股义军,榆林军便趁此机会继续发展壮大。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葇县的刘思同、李正心、赵义等拉起一支义军与官府对抗。这年十月十五日,黄镇山在朝城率众起义,迅速攻破县城,并在县城周围村庄安营扎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文思明、任凤廷在观城起义,率义军攻克县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范县的榆林军感到自己已具备了攻打县城的实力,便在葇县、朝城、观城兄弟义军的鼓舞下一举拿下了范县城,将县令孙养廉一家杀死。接着,又一支起义军在任七和张七的率领下在观城起事。这支义军仿照范县榆林军的做法,也开进榆林,挖地道,存粮草,准备长期与官府对抗。这样,四县义军东西南北呼应,声势更加壮大。官府也曾多次派兵进剿,但义军神出鬼没,官兵有力使不上,徒增伤亡,最后只有望林兴叹。

在黄河南岸,除梁山外,又有郛城、鄆城饥民相继起义。他们也是以榆林为依托与官兵周旋。这样,黄河两岸义军遍布,因为他们大都隐蔽在榆林中,故后人通称之为“榆林军”。与此同时,鲁东地区相继爆发了赵应元、张輿领导的“登莱起义”、谢迁领导的“新城起义”、于七领导的“栖霞起义”。东西起义军遥相呼应,一时使清朝统治者卧不安眠,食不甘味。

顺治七年(公元1655年),三省部院张存仁统兵攻打朝城起义军,义军退往范县,与范县榆林军会合,隐入漫无边际的榆林中,与

清兵相持数月。清兵面对茫茫榆林，无计可施。进榆林如进迷魂阵，处处挨打；不进榆林又找不见义军的影子，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只得收兵而回。

这样，义军又在榆林中坚持了5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黄河决口，水位居高不下，榆树大部涝死，地道也因水淹坍塌。清兵见时机已到，乘机进攻。榆林军失去了榆林屏障，只得与清兵正面对阵，终因兵力悬殊而被击溃。榆林军在官府的眼皮底下活动了整整十年，他们虽以失败告终，却以实际行动向封建王朝统治者宣示了“水可覆舟”的道理。

苏村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伪军一万余人对我晋西抗日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杨勇、段君毅、苏振华率军区和行署机关跳出敌合围圈，转移至马集、呈旺一带。日军尾随而来，妄图对我形成新的合围态势。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军区特务第三营营长钟绍新奉命率九、十两连于十七日夜进入苏村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次日晨，敌寻迹而至，我阻击部队果断迎击，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连连打退敌人进攻。上午，敌增加兵力对苏村实施包围，并动用坦克、大炮和飞机向我军阵地猛攻，我阻击部队在人数、武器均处劣势的情况下与敌浴血拼杀，寸土必争。营长钟绍新、九连连长黄学友等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士们子弹打光用刺刀，刺刀弯了用枪托、砖头与敌搏斗。巷战至下午，敌人施放毒气。我固守最后两个院落的指战员中毒昏迷，遭敌人杀害。是役，我阻击部队与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战竟日，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保证了军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此战共毙敌三百余名，我一百二十三位指战员壮烈牺牲。苏村阻击战威震敌胆，我抗日将士气贯长虹。为牢记先烈壮举，激励后人奋进，特勒石树碑，永为纪念。

（杨巨源 撰）

郑板桥出任范县令



郑板桥画像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于清乾隆七至十一年（公元 1742 至 1746 年）任范县县令。郑板桥任县令时的范县城现为莘县古城镇政府所在地。郑板桥以进士身份出任一偏远小县县令，实为大材小用。在任期间，他体恤下情，举重若轻，主张轻刑简政，鸣琴而治，不事扰民之举，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傲视权贵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理庵居士、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橄榄轩人，晚年常以板桥老人、板桥老道人自署。郑板桥祖籍江苏兴化，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 1693 年）。他三岁丧母，由继母和姑母抚育成人。康熙年间入庠（成为秀才），雍正年间中举。乾隆元年（公元 1733 年），四十岁的郑板桥以二甲第八十八名考中进士。由于他自恃有才，不媚权贵，中进士后又坐了九年冷板凳，直至四十九岁时才被迫扒门子放了个实缺，被任命为地处偏远的范县县令。郑板桥万般无奈，只得随遇而安，轻车简从地启程到范县赴任。

乾隆初年，范县一带豪绅恶霸横行，钦命县官常被他们挤兑得

无计可施,只得摇摇头走人。听说郑板桥要来,豪绅们想给他来个下马威,派了八个地痞流氓抬着一顶四人小轿来接。一路上,轿夫们忽跑忽停,上下颠荡,把个郑板桥颠得上顶下蹲,前冲后磕。轿夫们却唱起了早已编好的小调:

今日老爷乍到,先坐簸箕小轿。

往后不听使唤,颠掉头上纱帽。

郑板桥听了,心里明白大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走到一个村头上,他忽然大呼停轿:“老爷我是老寒腿,不能睡床,顺便买二十块土坯回去盘炕。”二十块土坯加上一个大活人,把轿夫们压得热汗直流,连连求饶,并供述了事情的原委。郑板桥听罢哈哈大笑,说:“既然如此,把土坯扔下去吧,以后看老爷慢慢收拾那些王八羔子!”郑板桥的将计就计,反倒让地方恶势力吃了个“下马威”。

郑板桥是读书人出身,信奉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处世之道。他做官不是为了敛财自肥,也不是为了猎取虚名,而是“心存君国”,立志上报朝廷,下安黎庶,做一个有益于百姓的好父母官,把范县治理成升平兴旺的“乐土”。上任后,他对不合时宜的旧典章、老规矩心存异议,常别出心裁,巧妙地加以变更。一天,他让工匠在衙署临街的墙壁上挖了几十个透明的窟窿。人怪而问之,他说:“这衙中酸腐之味甚浓,使人难耐。今凿壁通风,出出前任县官留下的恶俗气,也顺便听听民间的疾苦声。”到任不久,他就写了一首题为《十日菊》的诗:

十日菊花看更黄,破篱笆外斗秋霜。

不仿更看十余日,避得暖风禁得凉。

此诗以秋菊自喻,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趋势媚俗、不惧怕挫折的斗士心态。

郑板桥知范县初期,因讼案稀少,衙署多暇,闲来常赏花饮酒,

醉后击案高歌，声达户外。衙外民众常议论新县太爷是个疯子。郑板桥听说后深深自责：“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未闻有狂官。”从此白天不饮酒，晚饭后饮酒也止于三壶，且饮后便睡，次晨起来宿醉已醒，既不扰民，又不误公事。郝表弟听说此事后认为他不能尽兴饮酒，太苦了自己。他却不以为然，回信写道：“古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良有以也。我今直视官帽如桎梏，奈何！奈何！”可见郑板桥对官位是看得很轻的。在一首题兰竹诗中，他更明确地说道：“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一种不愿与世俗为伍的厌政之态跃然纸上。

郑板桥既然不怕丢官，对来自官场和豪绅的挑衅也就无所畏惧。一次，曹州知府宴请属下官员，官员们故意出难题，要郑板桥在一张纸上一笔写成一个字，而且必须四角皆满。郑板桥傲视群僚，大笔一挥，写了一个大大的“乙”字，左上角落笔，右下角收笔，笔走龙蛇，四角皆满。群僚皆嫉其才，可又无可奈何。还有一次，富绅魏善人收租逼奸，受害人朱月姣告到县衙。郑板桥知民女冤屈，却又苦于无人证。于是，他故意当堂申斥朱月姣，朱月姣大骂“糊涂官”不止。魏善人高兴了，要设宴请客，郑板桥欣然前往。他利用自己酒量大的优势把魏善人灌醉，乘机录了口供。次日再审，郑板桥判朱月姣胜诉，朱月姣这才明白了郑板桥的苦心，郑板桥却用四句诗总结了此事：

济贫惩伪善，奇案须奇判。

若说我糊涂，难得糊涂官。

挑战世俗

郑板桥在江淮一带长大，对北方的一些民间旧习本就不很看

重；加之他性格怪异，放纵不羁，故常能做出一些挑战世俗的怪事来。

当时，县城中有崇仙寺和大悲庵，寺中有僧，庵中有尼。有一僧一尼不耐古佛青灯，遂相私通，被人捉拿送官。郑板桥见两人年貌般配，又都年轻，不愿出家修行，便判其双双还俗，结成夫妇。后来有人做诗咏此事：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

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还有一次，一个富翁嫌未婚女婿家贫，欲退婚又怕男方上告，便给郑板桥送了一千两银子重礼。郑板桥将计就计收下礼物，第二天就派人传信认富翁之女为义女，并将义女接到衙署小住。郑板桥察知义女无悔婚之意，便做主招穷女婿上门，就在衙中拜了天地，第二天雇车把小夫妻连同一千两银子送回家去。这样一来，县太爷主婚，富翁脸上光彩；女婿有了一千两银子也不再穷了，一桩美满姻缘被郑板桥撮合得天衣无缝。

在处理一些涉及世俗的案件时，郑板桥常常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睿智，把事情办得极富戏剧性。范县城中学财主之女英梅与邻家的儿子杨九一块长大，情投意合，私下里有婚姻之约。季财主嫌杨九家贫，坚不许婚，还给女儿另找了财主李五的儿子李滑溜，英梅却誓死不嫁。父女相持不下，闹上公堂。郑板桥问清来龙去脉，心生一计，命人在大堂正中摆了一把椅子，叫杨九站在椅子后面，李滑溜站在椅子前面，然后对季财主说：“婚姻大事，要听父母之命。今天就听你一句话。是要以前的，还是要以后的？”季员外不假思索地说：“以前的不算，跟以后的订婚。”郑板桥马上接过话茬说：“此事由季员外一句话定音，椅前的李滑溜回家另寻妻室，椅后的杨九由本县做主与英梅订婚。谁若反悔，定责不饶！退堂！”

对于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人和事，郑板桥每每痛加申斥，无丝

毫姑息。范县城中有艾中仁、艾中义兄弟二人，都曾中举，在地方上有些名气。二人虽名“仁”、“义”，做事却处处有悖仁义宗旨。为争二分宅基地，兄弟俩反目成仇，多次讼上公堂，闹得郑板桥十分厌烦。一天，二人又找郑板桥评理。郑板桥不听他们胡搅蛮缠，自己闭目吟起诗来：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家业不可争。

手足之情和为贵，难得一世为弟兄。

吟罢，展纸命笔，转眼间写成一张判词，掷下堂来，自己转身走进后衙去了。艾氏兄弟抢着去看判词，只见上面写道：“鸢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嘤其众，义也；羔羊跪乳，马不欺母，礼也……禽兽尚知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德？以祖宗遗业之小物，伤兄弟手足之大情，岂不悲哉！兄读五经，全无教弟之才；弟诵四书，焉有伤兄之理？艾中仁不仁，艾中义不义。念先人之恩，想兄弟之情，早悔改，可警之。”

鸣琴而治

郑板桥身为父母官，却不以父母官自居，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为官之道。他经常布衣简从，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在范县城乡，他饱览了北方的田园风光，也接触了啼饥号寒的贫民阶层。这一时期的诗文中，颇多对农家风情的素描和对农夫苦贫的同情，甚至把农夫列为“天地间第一等人”，这与当今一些做官者说的“中国的农民真好”有异曲同工之妙。郑板桥有一首《喝道》诗写其下乡查访不扰民的情况，诗曰：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间俗入林深。

一杯开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

郑板桥还写过一组十首《范县诗》，此诗洋洋洒洒百余行，把范县一带农民耕种收藏的田园生活写得毫发毕现，使人如临其境。另一首题为《范县》的诗中有句曰“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对农民见官之难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有一年范县风调雨顺，农业喜获丰收，郑板桥写《有年》诗述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另一首《登县城东楼》诗中写道：“过客荒无馆，供官薄有田。时平兼地僻，何况又丰年。”对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表示了极大的满足。郑板桥离范县赴潍县任职之前写了一首《赠范县旧胥》诗，诗曰：“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与年丰。”话不多，却洋溢着对范县的祝福与留恋之情。他还为范县旧友亲书“和蔼包容”匾额，申述自己的处世之道（此匾现存阳谷县李台乡民间）。到潍县后又作了一首《自咏》诗，诗中所述仍多为范县景物，可见郑板桥对范县印象之深。

在社会治理方面，郑板桥坚持“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供亦不尚严刑”，对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强盗”，也不持敌视态度，而是给予同情和规劝。在一些诗文中，他甚至详细地描述了富翁和官府逼民为盗的过程，把强盗写得比官老爷还有恻隐之心。对黎民百姓，他更是怀着一腔爱惜之情，从不装模作样，吓唬喝斥。郑板桥家乡兴化一带有一种叫茨菇的球茎植物，富含淀粉，可做菜。一年冬天，一个叫金焕根的农民从兴化运到范县一船茨茹，本应卖九百文一担，为了尽快脱手，他只要八百文。菜行老板欺他是外地人，一下子把价钱压到四百多文。金焕根面临赔光老本的危险，听说县太爷是兴化老乡，便壮着胆子去找郑板桥帮忙。郑板桥有些为难：管吧，买卖自由，官府不应干涉，况且金是自己同乡，明问明断有袒护之嫌；不管吧，金是个菜农，这船菜赔了，一家老小连年都过不好。思之再三，终于有了主意。他把金焕根叫到跟前，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次日一早，郑板桥上街巡查，金焕根故意将一盆洗

茨菇的泥水泼在菜行门口，菜行老板与金争吵时，郑板桥正好赶到。问明原委后，郑板桥对着一片泥水躬身便拜。老板惊问何故，郑板桥说：“家乡的泥土就是故土，故土在此，焉有不拜之理！”老板也是个聪明人，一听便知其意，立即吩咐伙计：“父母官家乡的茨菇，千里运来，十分宝贵，全部按牌价收下，九百文一担！”郑板桥连忙拦住：“虽是我家乡运来的菜，也不能让范县老百姓吃亏，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按八百文作价吧。”于是，一场价格争执以皆大欢喜结局。

郑板桥初到范县时曾立过一个规矩：杀猪不能卖猪头，猪头自己留着吃也要纳税。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郑夫人却知其原委。原来在家乡兴化时，郑板桥买了个猪头过年。白天买回家，晚上屠户便找来要求原价赎回，因为有个渔民急于买个猪头敬海神，愿出两倍的价钱购买。郑板桥由此对屠户有了很深的成见。为了劝夫，郑夫人让衙皂抓了个活老鼠拴住瓜子吊起来，老鼠吱吱地叫个不停。郑板桥怪问何故，郑夫人说：“小时候妈妈给我做了一件花衣服，还没穿就被老鼠咬坏了，我看见老鼠就来气！”郑板桥笑道：“兴化的老鼠咬了你的衣服，你拿范县的老鼠出气，是何道理？”郑夫人说：“这是跟你学的，你不是也恨杀猪的吗？”郑板桥一听恍然大悟，第二天就贴出布告，取消了禁卖猪头的规定，并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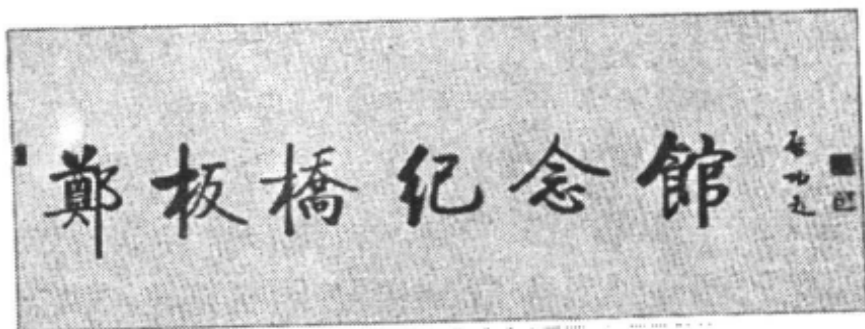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

屠夫势利虽可恨，为官不应记私仇。

郑板桥体恤农民之苦，更恨投机取巧和懒惰之人。十字坡有个种菜能手耿五种的萝卜中有一个长到十几斤重，他知道郑板桥喜看丰收景，便将萝卜王送进了县衙。郑板桥一高兴，将自己常骑的毛驴赏给了耿五。有个姓朱的财迷见小的可换大的，便将自家最好的毛驴献给了郑板桥，心想或许能换回一匹马来，不料郑板桥

却将耿五送来的萝卜王赏给了他,此事一时传为笑谈。还有一次,郑板桥突然贴出告示请全县的乞丐吃饭。饭后,郑板桥给乞丐训话:“你们不干活,吃闲饭,犯了不劳而食之罪。黄河、金堤河有滩地无数,我要你们从今天起丢掉要饭棍,划滩开荒,种地五年不交粮,栽树十年不征税。前些天县衙抓赌,我罚他们送来了农具、种粮,今天就发给你们,回去马上动手。谁再上街要饭,本官有大板侍候!”三年后,河滩大变样,范县境内也很少再见到乞丐。

郑板桥做官,以让百姓安居乐业为目标,因而在鸣琴而治的同时也很看重教化。有一段时间,朝城县令出缺,郑板桥曾兼理朝城县事。在一段题画文字上他曾这样写道:“朝城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妙。”历史上曾有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退修诗书于范的传说,为纪念此事,郑板桥筹资修建了仲子庙。今庙已不在,唯庙门残匾尚存。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启功题写的“郑板桥纪念馆”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

年),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六年后,因不满社会黑暗,愤而辞官归里,以卖画为生。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在穷困潦倒中病逝,时年七十二岁。

丘莘教举旗反清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丘莘教在直南、鲁西一带举旗反清,因起义队伍分别以黄、红、白、绿、黑色旗帜为标识,故称“五旗军”。这次起义虽只坚持了三年时间,但对清廷统治基础的震撼却是巨大的。

一月内连克十五城

清朝自顺治入关到咸丰登基,其统治已历200年。咸丰以病弱之躯君临天下,加之他沉迷酒色,少理朝政,清王朝的统治已是内忧外患交加,显现出风雨飘摇之势。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列强侵扰,民不聊生。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当时的官场现状:“咸丰坐了十年半,顶翎赏了一大片。说他是文科,未曾把书念;说他是武科,不识弓和箭;说他是军功,与敌未见面。回家去扫墓,祖宗吓了一跳:我的儿,咱家没有梧桐树,哪里来的凤凰蛋!”上层的腐败必然造成下层的灾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遇灾荒,更是雪上加霜。贫民面对死亡,只有奋起抗争。于是,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北方则有捻军揭竿反清。捻军以安徽北部为活动中心,影响遍及苏、鲁、豫、鄂、皖。捻军所到之处,贫民如影随形。有首民谣说:“捻子哥,大红脸。人虽穷,腰不弯。杀了官兵杀地主,救咱爷们穷光蛋。”清朝统治者把起义军叫

作“长毛”，贫民们却将“长毛”视为救星。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说：“长毛坏，长毛坏，百姓不欠半文债。三餐茶饭吃得饱，晚上睡觉有被盖。清兵好，清兵好，弄得百姓吃不饱。卖掉棉衣交捐税，夜里睡觉滚稻草。”

在封建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农民起义的发起者往往利用宗教来聚集群众，统一人心。当时北方知名度较高的是起源于宋代的白莲教，该教在元、明、清三代常被农民起义军作为组织斗争的工具。咸丰年间，白莲教有一个分支在河北丘县至山东莘县一带影响很大，被称为“丘莘教”，利用丘莘教发动起来的五旗军起义因而被称作“丘莘教起义”。

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鲁西~~遭受大灾荒，农民陷入了无法生存的绝境。民谣说：“金秋季节不见金，逃荒路上躺死人。”清政府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以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为由，加倍派征钱粮，苛捐杂税数不胜数，饥寒交迫的农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农历十月，莘县县令缪玉书又派人下乡催交额处加派的“团练费”，这便点燃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莘县城镇北街人张玉怀发动早已联络好的丘莘教人拿起武器，打出黄旗，自称“黄旗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劫富济贫”。与此同时，莘县俎店延家营的延轮秀率丘莘教人打出红旗，号称“红旗军”；堂邑的程顺书打出白旗，号称“白旗军”；馆陶的杨泰打出绿旗，号称“绿旗军”；冠县的宋景诗打出黑旗，号称“黑旗军”。五旗军同时举事，南北呼应。起义军先是赶走了下乡催收钱粮的差役，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地主富户，筹集活动经费，开仓赈济灾民。起义军的做法受到贫民的拥护，加入义军者渐多。义军组织铁匠打制兵器，让会拳脚者组织教练武术，士气高昂，声威大振。这一年，贫民们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鸡年。年后，起义军开始做攻打县城的准备。二月二十九日，张玉怀率黄旗军进攻莘县城，县令缪玉书见事不妙，携家小出城潜逃，守

城团勇不战而降。起义军清查了官府钱粮，放出了狱中囚犯，放火烧了县衙，然后出城到曹家楼、燕店、桑阿镇、花园、张鲁等地驻扎，继续募集人马，扩充兵力，准备下一步行动。几乎是与此同时，黑旗军和绿旗军也攻入冠县城，打开牢狱，开放粮仓，焚毁县衙，杀死县官。黄旗军攻下莘县城后，张玉怀派几百名骑兵南下联合其他义军。这支骑兵分队经阳谷、郛城直达巨野，与当地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掉头北上。三月五日从杨家集渡过黄河，一日之内攻克了濮县和范县，三月九日又连克观城和朝城。观城民团不堪一击，知县苏汝镜只身逃脱去省城乞援。朝城知县董涵亲自带团丁在孟楼一带抵抗，兵败后死于乱军之中。三月十七日，张玉怀派宗义、王加增率一千骑兵奔袭阳谷，中午兵到，下午便将县城拿下。义军的攻势，确如风卷残云一般。至四月初，义军已攻下了丘县以南、濮县以北、聊城以西、馆陶以东的15座县城。清人撰写的《山东通志》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丘莘教匪方扰东昌，连陷丘、莘、馆、堂邑界，曹属观、朝、濮等四五百里烽烟钲鼓不绝，土教诸匪多不可辨。七州县无官无兵，六州县官吏不知存亡。”

黄旗军血战大里王

咸丰帝看到鲁西各县相继失守的奏折后大为震惊，立即升殿议事，决定派钦差大臣胜保、僧格林沁和山东巡抚谭廷襄配合，调重兵前往镇压。义军闻迅后，立即研究对策，决定由张玉怀率黄旗军驻守莘县，宋景诗率黑旗军把守朝城，其他义军也各据一城，分头拒敌，并随时准备联合作战。农历五月初一，胜保率清兵进抵冠县。为拒敌于城外，张玉怀亲率黄旗军进驻莘县城北八里的大里王村。五月初二凌晨，清将士鎰、榕吉、文哲辉、德可登布、伊可精

阿、廷谔、得魁、喜义、文林、景芳、清宇各率兵一部，直向大里王扑来。张玉怀见清兵来势汹汹，便调一万八千人警卫县城，其余人马在大里王周围设伏，以便与清军周旋。战斗大约于早晨六时开始，战场由村北移至村内，又由村内移至村南，双方短兵相接，杀得天昏地暗。清兵伤亡甚众，义军损失亦不小。据史料记载，仅义军用大刀砍下的清兵头颅就推了六木轮车。义军在大里王抵抗至中午，然后便步步南撤，向县城靠拢，清兵穷追不舍。至县城外，城内城外的义军两路夹击，把追赶的清兵包围。正激战时，清军的后续部队赶到，在外层布置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义军内外受敌，被迫收缩进城，占领制高点，继续与清兵对抗。清军见地形不利，且天已近暮，怕义军趁夜色偷袭，便收拾了义军丢弃的二十三门铜炮、六十七块盾牌、七个大印和一些军需物资，向北撤至距莘县城三十里的马桥一带。这次战斗，义军有四五百人阵亡。清军撤走后，张玉怀又派出一支部队到大里王驻守。

三天之后的五月初五夜间，胜保率兵第二次进攻大里王村。胜保这次的部署是：正定兵与河州兵攻西面，山东兵与豫勇兵攻东面，大沽兵与景州兵攻北面，村南留下缺口设伏兵，直隶标兵作后应，试图将义军一网打尽。义军见清兵三面包围而来，怕被“包饺子”，便撤出村子，在东南设阵。清兵三面齐攻，义军怕腹背受敌，开始向西南撤退。清兵乘机分路追杀，义军阵容大乱。有几个清兵趁机跑到义军队伍中，夺过义军旗帜，叫喊着向西奔跑。一支义军误认为是自家的旗子在指挥，便随之而去，结果跑进了清兵的攻击圈，大部被毙伤。其他义军敌不住清军三面夹攻，夺路南走，又遭清军预设的伏兵截击，死伤惨重。几千名步炮兵和两千名骑兵摆脱追兵向县城撤退，与前来接应的绿旗军和黑旗军会合后，撤进县城固守。清兵占领大里王后，纵火焚烧民房，整个村子顿时变成火海，火光映红了夜空。之后，清兵又分三路向县城围攻。清兵快到

城下时，三旗军火炮齐发，清兵死伤无数，仓惶中躲进沟壕隐蔽。义军在炮火掩护下从东、西二门发起进攻，又杀伤一批清兵。清军指挥官恼羞成怒，逼着清兵冒着炮火向城里猛冲。义军寡不敌众，遂放弃北门向南门退去。清兵从北门涌入城中，双方展开巷战。激战中，义军死伤大半，剩下一千多人冲出南门，消失在麦田中。因天黑路不熟，清兵未敢追击。在这次战斗中，绿旗军首领杨泰牺牲。

游击战与敌巧周旋

经过两次阵地战的较量，张玉怀认识到义军不论从人数还是从装备上都不具备与官军正面拼杀的实力，便率部分散活动，补充兵员粮草，休养生息。农历五月初九，黄旗军在莘南朝北一带征收军粮，与正在寻找义军作战的清兵得魁部相遇，黄旗军不敢恋战，被迫退回驻地。二十四日，黄旗军北上临清，与其他各旗义军会师，准备采取联合作战的战略。

经过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张玉怀于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再次率部挺进莘县、朝城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教会，招募兵马，准备继续与清兵较量。正在此时，宋景诗的黑旗军迫于清政府重兵围剿，采取了假降的策略。黄旗军孤立无援，战斗力大减。而清兵却采取分割穿插、各个击破的战术，使各旗义军彼此不能相顾，先后有多支义军被击溃。义军的活动规模与范围越来越小。

大规模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小规模反抗斗争仍然此起彼伏。至这年农历八月，义军余部在杨朋岭、张玉怀、郜志文等率领下仍在莘县一带活动。十月，义军与活动在濮县、范县一带的长枪会联合，到冠县、堂邑一带与清军进行游击战。十二月初，义军被

胜保军击败,被迫撤出堂邑,一部分进入寿张竹如、莲花池一带,一部分进驻莘县延家营。十二月四日,胜保命成禄等率清兵步骑两路进攻延家营,义军伤亡惨重,红旗军首领延轮秀被捕死难,张玉怀向胜保投降,只有邵志文率残部突围出走。

1862年(清同治元年)农历二月,胜保奉命南下增援安徽清军,命其部将带领收降的义军向河南转移。张玉怀乘胜保率部渡过黄河、无暇北顾之机,带领旧部返回莘县,随即北上冠县。六月,红旗军余部五百余人再次在莘县马连寺起义,观、朝、莘各地义军也纷纷二度起事。十二月,义军在朝城打死打伤团练一千余人。

1863年(清同治二年)农历三月,原降清义军数千人再次起义,起初活动于馆陶、莘县、朝城一带,后来直逼观城、寿张、范县。四月,宋景诗再举义旗,在临清、堂邑、馆陶、莘县一带方圆数百里范围内往来活动,九月间经观城、范县、濮县进入直隶开州,义军的活动又出现一次小高潮。十月,宋景诗率黑旗军奔皖北投入捻军,直南、鲁西一带的其他义军失去黑旗军这个有力的屏障,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偃旗息鼓。丘莘教发动的五旗军起义至此宣告结束,历时整整三年。

太子墓纪铭

史载,春秋时期,卫太子伋与异母弟寿手足之情甚笃。寿之生母宣姜与宣公谋杀太子伋,寿舍命救兄,二人皆遇害于莘之野。百姓感其义,就地葬之。田海村前原有寿之墓,后平毁,唯太子伋之墓至今尚存。李楼曹名孝伋洼,张庄定名太子张,皆与墓相关。墓前原有孝伋之墓石碑一通,未审立于何代。为保护文化遗产,弘扬孝悌古风,祖籍周边村庄之有识之士共议并集资勒石述其事,特为此文以记之。

(杨巨源 撰)

黄沙会赶走“鲁西王”

1927年，正当中国各路军阀势力混战不休的时候，原属直系的薛传峰率部驻扎朝城（今属莘县），割据一方。薛传峰为筹军饷，大肆加征钱粮，从而激起民愤。当地贫民打出黄沙会的旗号拉队伍与薛军对抗，经过多次激战，终于把这个号称“鲁西王”的军阀赶出了朝城。

薛传峰统兵割据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除了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军阀外，地方上还出现了一些“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小军阀，一度盘踞朝城的薛传峰便是其中的一个。

薛传峰，朝城县薛庄（今属阳谷县）人，字镇山，排行第二，腿微跛，外号“薛二瘸子”。薛传峰自幼不务正业，成人后亦多行不轨，后来投到属于直系的河南督军寇英杰手下当兵。得知寇英杰是寿张人，为了套近乎，快提升，薛传峰便谎报自己为寿张籍。当时豫西有个范重修，拥兵数万，霸据20多个县，与豫东的寇英杰分庭抗礼。两个军阀为争地盘，经常兵戎相见，争斗数年，谁也吃不掉谁。薛传峰打仗有股子拼命劲头，人又十分狡猾，在争斗中不断为寇英杰献智出力，屡建战功，很快由班、排长升任团长。寇英杰发现他是寿张人后，更是器重有加，不久即任其为旅长，继而委任为豫军

第十师师长。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河南境，寇英杰率部退至范、观、朝一带，并准备继续北上，以避国民革命军锋芒。薛传峰来到老家，却打开了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家乡一带地熟人熟，自己手下又有人有枪，如果在这里扎下根来，一切自己说了算，强似在别人手下卖命出力。况且寇部北上，后果难料，吃苦受罪是必然的。一旦自己站稳脚跟，即使寇部再回来，也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朝城一带还是他薛传峰的天下。盘算已定，他对寇英杰阳奉阴违，待寇部开拔后，他却带领第二十旅留了下来，开始实施割据、称雄、独霸一方的计划。

薛传峰手下一个旅约有两千人，离开寇英杰后便断了军饷来源，一切费用均须自筹。当时农民的国税一年分两次交，夏季交银，秋季交米，银和米都折算成铜钱征收，所以交国税也叫“完银米”。薛传峰为筹军饷，决定每亩地多收3个铜板，且要一次交清。这一做法，大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但贫穷人家交不起，连中小地主也不愿出这个冤枉钱。钱粮收不上来，薛传峰便派兵下乡催逼。催逼无效，薛传峰又玩了个杀鸡给猴看的把戏。薛传峰有个妹妹嫁到了朝城的郭炉，郭炉人仗着这层关系迟迟不交钱粮。薛传峰派兵从郭炉抓了六七个人关押起来，每天严刑折磨，逼其家中拿铜钱赎人。其他村的人见状立即恐慌起来：薛传峰连他妹妹村里的人都不放过，别的村就更没有活路了。人被逼到死角必然要拼死反抗，于是，郭炉、桑庄、张庄、张寨、张楼等村的贫民开始秘密串联，他们打出黄沙会的旗号组织群众，决心要把薛传峰的队伍赶出朝城。

农民军围困朝城

黄沙会又名黄纱会、黄煞会，是大刀会的一个分支，带有一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一组织主要流行于冀鲁交界处，并不断自西向东发展。在当时社会混乱、土匪扰民的情况下，比较大的村子都以黄沙会为基础组织了民团，每10亩地出一个人，每百亩地出一支钢枪，农闲或晚上操练，目的在于武装自卫，防匪防盗。一旦有事，各村便撞钟、敲鼓、吹号联络，互相支援。土陈村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钟，撞击时声闻十余里，它常在黄沙会聚会时发出第一轮信号。

正因为黄沙会在朝城一带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它才敢在民怨沸腾的关键时刻与拥有两千人马的薛传峰扯旗对抗。这次对抗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郭映科、孔庆选、张文德、张文江、张朝生。1927年7月4日（农历六月初六），朝城以西各村的黄沙会员在刘羨大寺院里集中“亮团”，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钢枪、土炮、大刀、红缨枪等武器应有尽有，其中尤以红缨枪最多。红缨枪直立如林，远远看去像正在晒红米的高粱地。经过检阅誓师，队伍分成两路，分头开进前后三里营、周武庄、贾庄、马庄、孟庄、江楼、邵庄等村，对朝城形成包围之势。

黄沙会采用的战术是围而不攻，单等薛传峰的小股部队出城逼税时各个击破。薛军是群乌合之众，战斗力极差。在贾庄、邵庄、孟坡遭遇了几次，薛军都是一触即溃。加之黄沙会中有许多神枪手，几乎是弹无虚发，薛军更是闻风丧胆，吓得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薛传峰口里叫嚷要对黄沙会“烧个鸡窝不剩，杀个人芽不留”，无奈手下的兵丁不争气，只有紧闭城门，坐观事态发展。

相持了一段时间之后，黄沙会经商议决定，火烧城门，炮轰城墙，来个敲山震虎，再显显黄沙会的威风。一天晚上，七八个黄沙会员头顶湿棉被，推着一辆装满干柴并洒上煤油、火药的四轮太平车冲向东城门，几个神枪手在房顶上狙击掩护。大车一进城门洞，干柴便被点燃，霎时烈焰腾空，城门楼被火光吞没。与此同时，西门外黄沙会的土炮弹也一个个地飞向城墙，有的还越过城墙落到城里，守城士兵顿时乱成一片。薛传峰忙下令把各式机枪埋伏在城墙垛口处，准备阻挡黄沙会的进攻。那知黄沙会的战术是攻而不进，火烧炮击了一阵后，便悄然收兵而回。天亮后，薛传峰命士兵用麻袋装土堵住城门。谁知战战兢兢地过了几天，黄沙会却没有动静。

双方相持了一个月，农历七月初七早晨，黄沙会的一部分人突然趁大雾攻进了南关，薛军全部撤进城里，关上城门。黄沙会的人有些麻痹轻敌，纷纷去找酒馆喝酒。不料薛军突然冲出城来，包围了南关。黄沙会员们仓促应战，队伍大乱。薛军登上房顶，乱枪射击，又纵火烧房，共烧毁房屋 100 多间，烧死 60 余人，另有多人受伤。黄沙会虽然吃了亏，但对朝城的包围仍未解除。朝城以南一些村庄乃至西边河南省一些村庄的黄沙会员纷纷前来增援，声势更加浩大。为防黄沙会的人爬城，一到夜间，薛军便在城墙上悬挂灯笼，城上城下相互枪击的情况时有发生。黄沙会派了一些神枪手专打灯笼，搞得薛军夜不能眠。白天，薛军用棍子挑着军帽在城墙上试探，帽子一露头就被打掉，吓得薛军不但不敢出城，连在城墙上露头的勇气也没有了。

黄沙会血战邵庄

农历八月十八日,黄沙会首领张文德得到一个消息:薛传峰被困得没办法了,近日要南逃范县。张文德认为机不可失,决定组织一千多人在城南邵庄设伏。薛传峰发觉了黄沙会的动向,他于二十二日派出一百多人化装成黄沙会员混入邵庄,四处传播薛军要出城的消息。张文德信以为真,立即通知会员做战斗准备。会员们磨刀擦枪,吃符念咒,跃跃欲试。村中老幼知道要在这里打仗,纷纷到邻村去躲避,村中顿时充溢着战斗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

这天上午 10 时左右,薛传峰的一个营偷偷出城,在邵庄东南吹响了冲锋号,目的在于吸引和消耗黄沙会的火力。张文德听到枪声和号声,立即把持钢枪的会员调往村东。约有吸袋烟工夫,村西北也响了号声和枪声,而且是多号齐吹,机步枪响成一片。张文德这才发觉遭遇了薛军偷袭。在东西受敌的情况下,只好从村东调回一部持钢枪的会员到村西迎敌,手持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则留在村中待命,准备在薛军逼近时进行肉搏。

正当东西两面激烈交火的时候,混进村子的百余名薛军士兵突然登上房顶,抽出藏在腰中的短枪,居高临下向聚集在街上的黄沙会员射击,前后夹击、里应外合的形势已经形成。村中的黄沙会员虽奋力拼搏,无奈于手中无枪,对薛军形不成威胁。薛军凭着精良的武器、密集的火力,很快将黄沙会会员分割包围。会员们得不到首领的指挥,彼此间又失去了联系,一些会员只好凭着血气之勇,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下午 4 时左右,东西两头的薛军冲入村内,见黄沙会员就杀,杀了人又纵火烧房,一些隐藏在屋内和柴草垛中的会员也被烧死。这一仗,黄沙会有 200 多名会员死难,邵

庄有 200 多间民房被烧,其状惨不忍睹。

薛军虽然偷袭邵庄成功,但处境却更加被动。仇恨的火焰在周围村庄的黄沙会员中越烧越旺。黄沙会员们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实行了多村联防,密切注视着城内薛军的动向。朝城仍然是一座孤城,处于被严密封锁的状态。黄沙会在各村口要道设岗,盘查行人,严防薛军奸细混入。薛军一有动静,各村便鼓锣齐鸣,互相救应。薛军被困在城中,不但筹不到饷钱,最后连吃饭也发生了困难。八月二十七日,无计可施的薛传峰不得不离开朝城北去天津,重新归到寇英杰手下。

从农历六月初六到八月二十七日,黄沙会与薛传峰部争斗了两个月零二十天,薛传峰一个旅的正规部队终于被自发组织起来的黄沙会员逼走,薛传峰割据一方的美梦也以破灭告终。黄沙会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以实际行动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作恶多端的薛传峰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德州火车站被韩复榘抓获,后处决于济南,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中国的别称

中华、华夏、诸夏、中原、
中土、中州、九州、赤县、
神州、禹甸、支那、唐土、
震旦、禹域、海内、东土。

赵健民古云找党



1981年赵健民（左二）在县委书记闫廷琛（右一）陪同下视察莘县马西林场。

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及全省中共党组织三次遭受重大破坏，失掉了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系。1935年冬，时任中共山东省工委代理书记的赵健民两下古云找党，终于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从而重新组建了中共山东省委，使山东省

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并有了更快的发展。

省委迭遭破坏

山东省的中共党组织有一段十分曲折的发展历程。1920年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济南秘密建立。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山东地方组织，王尽美为负责人。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尹宽任书记。是年11月7日，山东地方执委机关遭破坏；不久

重建山东地方执委,张昆弟任书记。1926年10月,中共山东区委成立,吴芳任书记。1927年5月23日,山东区委机关遭破坏,鲁伯峻等被国民党新军阀张宗昌杀害。是年6月,山东党组织大发展,中共山东省委正式建立,吴芳任省委书记。1928年12月,山东早期党员王复元、王用章叛变,省委机关十余人被捕,武胡景临时主持省委工作。1929年4月,山东省委再遭破坏,武胡景等十余人被捕,中共中央派刘谦初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临时省委再遭破坏后,卢一之任临时省委书记。1930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在青岛建立,任国桢任书记。是年11月,省委遭破坏,书记任国桢被迫离鲁。12月,山东临时省委建立,张含辉任书记。1931年2月,山东省委再次建立,张含辉任书记。是年4月13日,山东省委因叛徒出卖被破坏,省委机关20余人被捕,滕英斋任省委书记。是年8月,滕英斋被捕,胡允恭代理省委书记。1932年春,山东省委移驻济南,武平任省委书记。是年10月,山东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武平和组织部长汤美亭被捕后均自首,中央派任作民任临时省委书记。11月临委改为省委。1933年2月,由于叛徒陈衡舟告密,省委再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团省委书记孙善帅、济南市委负责人刘特夫等29人被捕。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等自动组成临时省委,张北华任书记。是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又遭破坏,书记张北华等被捕。中央于是年11月以青岛市委为基础组成了张德一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工委。一个月后,工委的交通员徐元沛被捕叛变,工委书记张德一被捕。

在1928年以来山东省委遭受的多次破坏中,以1933年这三次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使济南以南、以东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大部陷于瘫痪状态。济南市的党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时无所适从,有的等待观望,有的则四出找党。当时在济南省立第一乡师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赵健民心情最为焦急,找党的积极性也最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和一些在地下活动的党的领导同志一起积极发展党员，恢复组织，于1934年5月在济南北郊五柳闸正式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1935年10月，中共山东省工委在莱芜建立，赵健民任代理工委书记，在济南主持工委日常工作。工委决定，在积极与各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同时，尽一切可能寻找上级党组织，恢复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系。之后，赵健民曾两次去泰安冯玉祥将军处，想通过冯的高级参议范明枢寻找党的上级组织，未能如愿。又派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徐运北去北平联系寻找，但由于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破坏，北平地下党组织受损严重，也联系不上。山东省工委的负责人刘仲莹、鹿省三还先后两次去上海打听，同样失望而归。就这样，赵健民等人一边做着发展党员、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一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捕捉上级党组织的有关线索和消息。就在这时，赵健民从濮县一个同学郭崇豪那里听说濮县有党的活动，便决定到那里去碰碰运气。

黎玉徐庄蹲点

当时，濮县、范县均隶属山东省（今属河南省）。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后，各地党组织有的停止了活动，有的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唯有濮、范两县的党组织在河北省直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934年冬，濮县的徐庄（今属莘县古云镇）建立了中共支部。1935年夏，中共河北省代表兼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在特委巡视员兼濮县县委书记刘晏春陪同下到徐庄蹲点，任务是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

黎玉到徐庄后，经过调查访问，了解到群众的迫切要求是解决温饱问题。上年（1934年）黄河在东明、长垣一带决口，洪水泛滥成

灾，粮食歉收，眼看年关已到群众仍愁眉不展。黎玉建议，立即发动群众对地主开展一次分粮吃大户斗争，以解燃眉之急。支部经过研究，确定了斗争对象。为防过分暴露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牺牲，黎玉提出了几条要求：第一，事前事后均不贴布告，不发传单，以防敌人有准备，使群众斗争受到打击；第二，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无法下手捕人。行动方针定下来后，开始做物质准备。他们首先把群众自己家里的武器集中起来，又通过其他关系搞到了一支步枪、两支手枪，然后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游击小分队，由徐光泗任队长。

小分队的第一个打击对象是距徐庄十几里路小芦庄的一户中小地主，去了三十几个人，每人背回来一口袋粮食，还弄来十几条花被面。就这样，徐庄的贫农靠吃大户过了一个温饱年。小分队的第二个打击对象是木靳庄的大地主赵振刚。赵振刚的儿子是区长，家里买了好几条枪，经常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是全县闻名的大恶霸。游击小分队加上一些积极分子共六七十人在黎玉等人带领下，太阳落山后出发，一夜往返140余华里，在三区地下党的配合下，顺利活捉了赵振刚，缴获步枪、短枪各一支，手榴弹一箱，还有部分子弹和几十块大洋，回来时每人又背了一袋粮食。

吃大户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是一种有些过头的冒险做法，但对濮县的国民党政府和鲁西的广大贫苦农民都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吃大户的成功，使徐庄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受到很大鼓舞，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穷人救国会”也得到了发展。在徐庄的带动和帮助下，附近的温庄、曹庄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徐庄与其他村的积极分子也建立了密切联系，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徐庄党支部用夺来的武器武装了游击小分队，使当时的濮县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健民得到了黎玉在古云、徐庄的消息，

便急不可待地从济南骑自行车苦奔五百里前来找党。

赵健民古云找党

济南乡师有一个党员学生叫郭崇豪。郭崇豪老家是濮县，曾在范朝濮联立乡师上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带着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考入寿张第八乡师，后因发展党员、组织学潮被开除学籍。他又只身跑到济南，考入了赵健民所在的济南乡师，但与濮县党组织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暑假回家，郭崇豪听说濮县党组织仍在活动，因为山东的上级党组织被破坏，他们接受濮阳县党组织领导。回校后，郭崇豪向学校党组织一反映，立即引起了赵健民的注意。他认为，当时濮县隶属山东省，濮阳县隶属河北省，河北的党组织能领导山东党的活动，这说明领导者有跨省活动的权力，很可能有特委一级的领导干部在那一带活动。如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山东省级党组织的重建也许就有希望了。校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郭崇豪写信进一步了解情况。因为当时形势较乱，迟迟未能收到回信。赵健民等不及了，便于这年初冬亲自骑自行车从济南去了濮县。

在濮县古云集（今属莘县）小学，赵健民见到了党员教师王士希，随后见到了中共直鲁豫特委巡视员刘耀先（又名刘晏春）。赵健民详细谈了山东省委遭破坏后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又诉说了多次寻找上级党组织未能如愿的苦衷，要求河北省委转告北方局派人来恢复与山东党的联系，以便尽快建立山东省级党组织。刘耀先答应了赵健民的要求，赵健民满怀希望地回到了济南。

转眼两三个月过去了，赵健民没有得到丝毫回音。正在他望

眼欲穿的时候，黎玉派濮县党组织的人来到济南找到了赵健民，告诉他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在濮县，要他立即去见面。赵健民得此消息，如久旱逢雨的禾苗，顿时来了精神。他顾不得深冬天气严寒，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就顺着黄河大堤向濮县方向飞奔。尽管冬季天短，赵健民仍在当天日落前赶了距济南 360 里的寿张；休息一夜后，第二天又急驰一百多里到达了濮县的古云集。晚上，终于在徐庄与黎玉见了面。赵健民把山东党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黎玉对山东同志的艰苦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并说北方局已决定派人去恢复山东党的关系，同时要求赵健民向北方局写一份报告。第二天，赵健民将写好的报告交给黎玉，然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济南。

1936 年 5 月 1 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重新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是年 6 月，省委派人到各地恢复筹建党的各级组织。从此，山东各级党组织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国都的称谓

京师、京都、京城、京华、
帝京、帝城、帝乡、皇州、
京畿、皇城、王城、皇都、
京、都、帝都、首都。

观城惨案 刻骨铭心

193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侵华日军土肥原师团侵犯观城县城(现为莘县观城镇驻地),除杀戮抗日将士外,还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屠杀无辜群众150多人。日军的暴行,使众多目睹和耳闻的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日寇南侵

抗战初期的1937年,莘县、朝城、观城尚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方武装尚未建立或尚未进入,因而对敌人的抵抗能力极弱。日军在芦沟桥发难并进而在平津地区得手后,迅速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西线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而占领邢台、邯郸、安阳等地;东线于10月3日进占德州,继而占领平原、禹城等地。这时,莘、朝、观一带两面临敌,已是人心惶惶。加之国民党军队的败兵过境南逃,到处烧杀抢掠,人民更是苦不堪言。莘、朝、观各县的国民党官员见大敌将至,便加紧搜刮民财,打点细软,准备弃城南逃。第一个逃跑的是莘县县长王嘉猷,他命令金库主任马宜三打开金库,将公款洗劫一空,带着随从和从莘县搜刮来的钱财星夜跑回了老家曲阜。朝城县长王兰九和观城县长牛功勋见王嘉猷溜了,也收拾家当逃之夭夭。于是尚未见到日军踪影,国民党地方大员就来了个“闻风四十五,枪响一百一”,看谁跑

得快。几天之内,莘、朝、观就成了三座空城。

国民党的县政府没了,各县都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土匪趁机打劫,加上国民党败兵的骚扰,鲁西北地区一时间兵匪遍地,司令如毛,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年7月底又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接着是暴雨成灾,人民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各县城乡都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12月中旬,日军先是空中侦察,继则飞机轰炸,向莘县、朝城、观城投下了大量炸弹。朝城有70多人被炸死,40余间房屋被炸毁。观城城东小吕村有户农民正在打场,一家5口人连同牲口全被炸飞,树枝上挂着几条残臂断腿,血肉模糊。接着,日军土肥原师团经莘县到朝城,未遇任何抵抗,一路如入无人之境。12月12日,日军大摇大摆地列队从朝城向观城进发。晚8时,当行至观城东北3里的小王庄村时,突然受到伏击。原来南撤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保安旅的一个营于白天悄悄地开进了观城,并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日军一到,国民党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狂妄的日军毫无戒备,死伤很多。待日军清醒过来组织反击时,伏击部队早已撤进城内。日军恼羞成怒,兽性大发,迅速扑向观城周围村庄,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观城劫难

日本兵首先开进国民党军设伏的小王庄,满街搜索,找不到打伏击的国民党兵,便拿无辜百姓开刀解恨。未及逃跑的村民王新章藏在草堆里,被日本兵抓了出来,五花大绑,用拳脚打个半死,然后拉到水坑边用刺刀扎死。日军在小王庄没找到伏击部队的踪影,遂怀疑在远庙村抓来的带路农民郭连齐有意带其进入伏击圈,

一群日本兵将郭连齐痛打一顿，又用刺刀挑破胸腹，挖出内脏。

当夜，日军大部队陆续进驻观城周围的吕庙、桥下、三里庄、焦村、郭连庄、岳坊等村庄，村民们闻风纷纷出逃，来不及逃走的大都被以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害。在岳坊村，十几个日本兵抓到了青年农民白六的妻子，拉到一麦秸垛前集体轮奸。白六3岁的儿子被一个日本兵扔在地上用皮靴踩死。白六见妻子受辱，儿子被害，怒火中烧，冲上去与日本兵拼命，被一群日本兵团团围住，乱刀刺死。日军在为其挑水喂马的青年农民吕富亭身边发现了一顶旧军帽，便认定吕富亭是化了装的中国兵，立即捆起来用皮鞭、木棍拷打，打昏后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再打。吕富亭忍无可忍，挣扎着站起来猛地用头向身边的一个日本兵撞去，日本兵举刀将其右臂砍了下来。吕富亭浑身是血，虽剧痛难忍，仍直立不倒。接着，日本兵把他捆在一棵榆树上，用排枪射击，又用刺刀挑开肚子，扒出内脏，再砍掉左臂和头颅，使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变成一堆令人惨不忍睹的肉块。在吕庙村，日军先将60多岁的老人吕金明、吕希冉、吕希田用战刀砍死，然后以死相胁，逼迫65岁的吕金成供出抵抗部队的去向。吕金成一言不发，日本兵先将他的嘴用刀豁至两耳，又割断了他的喉咙。老人疼得满地打滚，不久气绝。

13日上午，日军在血洗了周围的几个村庄后，开始从东、南两路向国民党军驻守的观城发起进攻。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城楼倒塌，土石飞扬。城内未及撤走的群众纷纷外逃，但城门已被守军填塞，只好用绳子缒城逃命。日军用机枪射击，不少群众被击中跌入冰冷的护城河中。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官兵经过一番抵抗，眼看大势已去，于下午4时弃城西撤。日军攻进城内，见人便杀。观城街头，到处是成片的鲜血及横七竖八的群众和中国士兵的尸体。在东城门附近，8名负伤后隐藏起来的中国士兵被搜出。日本兵将他们扒光衣服，棍棒刺刀齐下，全部杀死。在西街一座房子中，一负

伤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洋刀、砖头砍砸成肉泥,血浆、脑浆和碎肉溅了满屋满炕。未跑出去的群众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有的躲在自家的地洞里,有的躲在城墙下的洞穴里,鬼子进城后挨户砸门搜人,稍不顺眼,便刀戳枪击。南街一位老人出来开门晚了点,被鬼子迎面一刀劈死。一位老太太怀抱不满周岁的孙女躲在磨盘下,日本兵发现后,一枪将老人击毙,又把小女孩摔死。一个乞丐藏在秫秸堆里,日本兵搜人时用刺刀往秫秸堆里乱戳,乞丐的屁股上被扎了好几个血口子。地洞里的人被日本兵一个个逼赶出来,妇女惨遭蹂躏,男人被鬼子用地瓜秧子捆起来,拴成一长串,拉到城南郭连庄搞杀人比赛。他们用刺刀捅,用洋刀劈,用短枪打,把郭庄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被捆的人眼看难免一死,便挣断地瓜秧与敌人搏斗,敌人动用机枪扫射,结果大部分人死于乱枪之下,只有个别人侥幸逃生。

血泪控诉

日军在观城的暴行整整持续了三天,直至11月15日,他们尾追国民党败兵南下,外逃的群众才陆续回到家中,但此时的观城已是血流遍地、满目疮痍了。鸡、鸭、鹅、牛、羊、猪、狗全部被吃光;桌、椅、床、大车、门板及其他家具大部被焚烧;衣物粮食被劫掠一空,饭锅有的被砸碎,有的被拉进了屎尿;街上到处是尸体,残存的南城门楼上还悬挂着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东城门里面一大堆灰烬里埋着三四具被烧焦的尸体;西街一个粪坑里扒出了7具死尸。一时间,子寻父,妻寻夫,哭声震天。西街的杨永雨找到父亲的尸体时,却只能从衣服上辨认,头颅早已不知去向。

到了事隔48年后的1985年,当有关部门对观城惨案展开调

查时,仅大家提供出来的有名有姓的遇难人员就达156人之多。他们之中有年逾花甲的老人,也有尚在怀抱中的婴儿;有一生与世无争的农民,也有靠摆摊糊口的商贩和手工业者;有学校里的学生,也有庙观中的道人。仅观城南街就有4户人家被杀绝,其中张显密一家8口全部遇难。观城南街高庄子的幸存者张聿哲回忆说,鬼子进城那天,他一家4口往南门去了两次,都没能出去城,无奈藏在邻居家地窖子里,结果被鬼子用枪逼了出来。鬼子把这20多个人串捆起来拉到郭连庄,架上机枪,还有许多鬼子兵亮出刺刀。不久,鬼子就开始用刺刀捅人,“扑哧扑哧”的刺刀声吓得人头皮发麻。当捅到离张聿哲还有四五个人的时候,他想等着也是一死,不如拼死一跑,也许还能逃个活命。于是,他大喊一声:“鬼子杀人了,快跑哇!”转身从鬼子缝里向外跑去。鬼子从后面开枪,他甩掉身上的破羊皮袄继续飞跑,终于捡了一条命。后来他找回了甩掉的羊皮袄,只见上面有好几个明显的弹洞。观城东街的史广彦回忆说,大屠杀那天他也被鬼子抓住,和其他4人一起被拉到郭连庄,给鬼子们杀鸡做饭。听说外面在杀人,知道处境不好,便趁鬼子兵烧火不注意,连跳三道土墙跑了出来。观城南街的王锡田回忆说,高庄子共有20多户人家,有28口死在日本兵手中。3个十五六岁的店铺小伙计被刺刀捅死在大街上,肠子淌得到处都是。

当这些死里逃生的见证人忆及当年的惨状时,无不怒火中烧,泪流满面,他们为父老乡亲惨遭屠戮倍感伤痛,也对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1937年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日,是观城人民永远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以不同方式对当年的死难者进行祭奠,并教育后代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

莘县事变 世隆遇难



吕世隆烈士遗像

1938年11月17日，在莘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惠迪德、孙光远唆使下，潜藏在县大队中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刘建堂、马金壁、张腾魁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节分子王梦周、马兴堂阴谋策划并实施了莘县事变，莘县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遇害，莘县的抗日形势一度陷入低谷。

世隆赴任 莘县抗日形势大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打响了第一枪。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莘县的国民党县长王嘉猷闻风而逃，莘县陷入极端混乱状态。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年底，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署（聊城）专员范筑先将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领导鲁西北一带的抗日斗争。1938年1月，范筑先委派共产党员吕世隆为莘县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

吕世隆，字宏道，泰安县城西李家庄人，生于1909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1937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平津流亡学生到聊城一度担任六区政训处茌平办事处干事。他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救亡运动，深受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器重。担任莘县县长后，他与以张炳元为书记的中共莘县县委紧密配合，以推动和发展莘县的抗日斗争形势为己任，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献身精神，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组建莘县县大队，举办各种训练班，积极筹建农民互助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法，优先给农民互助会会员发放社会救济粮和贷款，组织反封反霸的“清乡”斗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仅用几个月，就把莘县由于两个月无政府和国民党溃兵冲击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使莘县全县的抗战形势为之一变。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和范筑先将军共同提出的“建立廉洁的抗日政府”的口号被吕世隆在莘县落到了实处，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诋毁共产党只会搞“赤化”、不会搞政权的滥言。在鲁西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上，范筑先将军多次表扬说：“莘县搞得最好，你们要学莘县。”并称赞吕世隆是“模范县长”。

莘县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因此将吕世隆视为眼中钉。在这些人的谣言影响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提出要撤换吕世隆，范筑先将军摆出事实，据理力争，终于化解了这一违反民心的动议。但在县政府内部及其周围，敌视吕世隆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并在暗中加紧活动。吕世隆出任县长后，恢复了县大队，自任大队长。但是，这个县大队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队伍，政治背景与组织成分相当复杂。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刘建堂，外号“大老虎”，是个老兵痞；二中队队长马金壁，曾参加国民党，其哥哥是国民党特务，弟兄二人的政治本

质都很反动；三中队队长张腾魁是莘县国民党党部的常委，一贯敌视共产党。吕世隆了解这些情况，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一时无法进行改组。为了掌握这支队伍，吕世隆曾派共产党员马兴堂和安子玉到二中队去，让马兴堂以指导员身份负责该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马兴堂和马金壁是叔侄关系，安子玉又是个胆小怕事之人，二人实际上都被对方软硬兼施，拉拢利用。后来，吕世隆抓住一些问题，撤掉了一中队队长刘建堂的职务，派共产党员曹斌和宋英分别任队长和指导员，又派共产党员陈瑶朴任三中队指导员。这些措施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并未彻底清除顽固势力的恶劣影响，县大队依然是鱼龙混杂。混在队伍中的顽固分子对吕世隆更加仇恨，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暗中拉帮结派，网罗爪牙，羽翼渐丰。只待时机来到，他们便要对付吕世隆下手。

1938年11月13日，日寇进攻聊城。国民党反动分子王金祥暗中与日寇勾结，出卖了范筑先将军，聊城形势十分危急。在这严重关头，莘县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也加紧了活动。这股反动势力以莘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惠迪德为代表，周围聚集了刘建堂、马金壁、张腾魁和民团头子、土匪孙怀玉等人，不断暗中聚会，阴谋配合日寇攻聊的军事行动，推翻吕世隆领导的莘县抗日政权。

11月14日，日军完成了对聊城的包围，范筑先将军亲自登城指挥抗敌，莘县与聊城的联系中断。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来到莘县通报聊城情况，吕世隆立即派一中队队长曹斌和县大队政治部主任訾修林率部去聊城接应专署机关突围。但部队刚出东门，阴谋分子就暗中串联，煽动哗变。曹斌指挥失灵，吕世隆只得命其原地待命。

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大批机关人员陆续撤到莘县，专署秘书齐燕铭也带着干校的一部分学生转移到莘县来。

11月16日,反动分子开始实施除掉吕世隆的阴谋。晚9时,他们假传警报,说发现日军20辆汽车从聊城向莘县开来。反动分子认为,只要听说日寇进逼莘县,吕世隆一定会像国民党的县长王嘉猷一样闻风而逃,这样就可以弃城逃跑为借口将吕世隆杀掉。不料吕世隆不但毫无弃城打算,反而召集抗日骨干研究如何应变。反动分子一计不成,只得另生二计,一场直接下手杀害吕世隆的暴乱计划启动了。他们派人控制了三个中队,架空了吕世隆这个大队长,然后便肆无忌惮地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事变突发 抗日县长惨遭毒手

11月16日晚10时,吕世隆召集张炳元和王惠卿紧急磋商。他们分析,许多迹象表明,在日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内部隐藏的反动分子乘机闹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防意外,他们决定给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写信,请求派兵支援。为确保无误,信由农会副会长白璞和县委委员分头去送。张司令见信后,立即派骑兵排驰援莘县。哪知就在骑兵排急急赶往莘县的时候,暴乱已经在城内发生了。

事变发生在11月17日。这天上午9时,吕世隆去三中队作队前讲话,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些人。三中队队长张腾魁做贼心虚,立即向国民党县党部作了汇报。党部负责人惠迪德和秘书孙光远原计划午夜12点暴动,现在见吕世隆已有察觉,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提前在下午4时行动。下午4时许,张腾魁按照国民党县党部的安排,将三中队集合起来讲话,大肆造谣说吕世隆克扣了军饷。实际上截留军饷的正是张腾魁自己。应发的军饷,吕世隆已照数拨给了各中队,张腾魁故意将此款扣住,又倒打一耙将责任推

到吕世隆身上。当时队员们正为拿不到军饷而着急，张腾魁乘机高呼：“找他算账去！”一时群情激愤，队伍乱了营。于是，20多个队员在刘建堂、张腾魁、马金壁带领下出了大队部，直奔县政府而去。刘建堂等三人赤着半边臂膀，露着胸口，手提张开机头的盒子枪，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王惠卿在街上看见了，知道要出事，赶紧去向吕世隆报告。

这时，吕世隆正在办公室里和刘建堂的父亲刘玉珂谈话。听王惠卿一说，立即要派人去抓刘建堂。刘玉珂赶忙说：“县长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我去看看。”吕世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你不要走，我对你们刘家爷儿们已经仁至义尽了！”说话间，刘建堂带来的人已上了东面和南面的房顶，并开始有人向办公室开枪。吕世隆一步跨出房门，大声问：“弟兄们要干什么？”房顶回答：“要军饷。”吕世隆说：“昨天不是刚发了吗？”房顶上说：“那点钱不够，国库里有的是大洋，快拿出来分了吧！”吕世隆坚决地说：“国库里的钱是国家的，是抗日的资本，谁也不能乱动！”房顶上又吵吵说：“你是想学王嘉猷带着钱柜子逃跑吧！”吕世隆提高嗓门说：“弟兄们放心，共产党跟王嘉猷不一样，钱留着给大家发饷，我吕世隆不会动用分文！如果今天把钱分掉，以后枪里没子弹，肚里没饭，怎么打日本鬼子！”这一说，房顶上不吭声了。停了片刻，忽听刘建堂在房顶上歇斯底里地大叫：“把子弹都上膛，手榴弹打开盖，哪个后退一步，老子今天就毙了他！”吕世隆退回屋里，房上又开始打枪，还扔下来几个手榴弹和点着火的高粱秸。吕世隆见劝说无效，命令警卫班长王梦周把机枪架到门口对房上射击。谁知王梦周却说：“机枪梭子找不到了。”机枪打不响，刘建堂的人又趁机上了北房顶。刘建堂得意地大叫：“姓吕的共党分子听着，你跑不了啦，快交枪吧！”吕世隆一听，怒火中烧，拔出腰中的“二十响”，大声骂道：“姓刘的，你别跑，今天非打死你个卖国贼不可！”说着就朝房

顶上打了几枪。无奈他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枪法欠佳，不但没打着刘建堂，反被枪机把自己的手挤伤了。

一见吕世隆开枪了，刘建堂像疯狗一样大叫：“都给我跳下去，抓活的！姓吕的从谁手下跑了，老子要谁的命！”一刹时，房上的人像扔砖头一样跳到院子里，堵住了办公室的门。刘建堂正要向屋里冲，这才发现老爹刘玉珂在吕世隆手里。老家伙脸色蜡黄，浑身发抖，吕世隆流血的手紧握“二十响”，正对着刘玉珂的脑袋。刘建堂见事不妙，立即转回头训斥跟来的人：“谁叫你们来的，还他妈开枪放炮的。都给我滚回去！”接着自己也扔掉手枪，两手抱拳，点头哈腰地直嚷：“误会误会，请县长包涵。我刘某请县长处分。”说完便带着一群人退了出去。

吕世隆毕竟有些书生气，见刘建堂带人走了，认为事件已经平息，便把刘玉珂放了。谁知约摸一个小时之后，太阳刚刚落山，张腾魁又来了。他只身一人，两手空空，一见吕世隆就连声问候：“刚才县长受惊！县长受惊！”没等吕世隆回答，他接着说：“这几个小子真混蛋，不顾抗日大局，不讲国共合作，刚发了军饷又要军饷，真是岂有此理！都是自己人，啥事不好商量，还动枪动炮的，我看他们都该枪毙！不过，吕县长，现在他们都后悔了，不好意思见你，求我替他们磕头赔礼来了，求县长给个处分。”说着真的跪了下去。吕世隆弯腰去拉，口里还说着：“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这时，张腾魁将暗藏的德国造手枪顺着袖筒滑到了手里，冷不防朝吕世隆腰部连开两枪。吕世隆只哼了一声便扑通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时年仅29岁。

形势急转 莘县陷入白色恐怖

吕世隆牺牲之后,反动分子气焰嚣张,莘县的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县大队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被杀害,王惠卿、苏群等共产党员和大批抗日积极分子被迫撤出莘县城,抗日组织被取消,抗日设施被破坏。共产党员张炳元、訾修林被扣押,后来慑于他们在群众中的极高威望,敌人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吕世隆呕心沥血、艰苦开创的大好抗日局面遭到严重摧残,莘县再度陷入白色恐怖状态之中。

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并继续保持莘县这个抗日阵地,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派刘致远率机枪营于1938年11月26日进驻莘县,顽固派头子张腾魁却用缓兵之计将刘致远部拒之城外,同时派人向聊城的顽固派头子李树春求援。李树春派王金祥率二支队、二十一支队约三千人于27日赶到莘县,突然对十支队机枪营发动袭击。机枪营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城北撤退。刘致远部退至河店,顽军乘夜色赶来,于28日拂晓将河店包围。机枪营顽强抗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后,于下午3时突围,撤至北馆陶休整。

莘县事变后,朝城、观城的抗日政权也相继遭到顽固分子破坏。在这种形势下,张炳元起草印发了《告鲁西北同胞书》,揭露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罪行,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打退日寇和顽固势力的进攻。一个月后,中共鲁西特委决定重新建立莘县县委,在燕店区李净庄李志勋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宣布王惠卿任县委书记,白璞任副书记,杜澄任组织部长,张英任宣传部长,崔强任交通部长,赵仁山任统战部长。县委重建初期,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活动仍十分困难,常常是白天在冠县的一些村庄住宿,夜间才进入

莘西一带开展工作。这次事变对莘县的抗战形势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莘县事变给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很大损失,制造这次变变的几名首要分子最终也都被人民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时任莘县抗日政府警卫班长的王梦周,本系中共党员,后被顽固分子收买拉拢,充当敌人的帮凶,暗中盗走警卫班的机枪梭子,使吕世隆在与叛乱者的斗争中陷于被动。事变后不久,莘县抗日政府以叛变罪判处王梦周死刑。

时任二中队指导员的马兴堂,也是中共党员,后被顽固分子拉拢,在莘县事变中参与叛乱。吕世隆牺牲后,他又受马金壁指使扣留了中共党员菅修林、王惠卿的枪支。事变后不久,中共鲁西北地委以叛变罪判处马兴堂死刑。

大汉奸、国民党顽固分子刘建堂是莘县事变的指挥者,系这次叛乱的首犯。事变后,他投靠日寇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日本投降后,被莘县民主政府判处死刑,行刑前死在狱中。

国民党顽固分子马金壁也是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莘县事变后,他在城北小安头出任国民党莘县县长,积极反共。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被莘县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处决于县城东关外。

国民党顽固分子、大汉奸张腾魁,是开枪杀死吕世隆的直接凶手,可谓罪大恶极。事变后,他当上了日伪军的中队长,后来在一次“扫荡”中,被我打入其中队内部的内线击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莘县事变的制造者一个个身败名裂,吕世隆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1944年9月,新建于城内西街的抗日小学被命名为“世隆完全小学”。上个世纪末莘亭街兴建的商场被命名为“世隆商场”。吕世隆的事迹至今被陈列在鲁西北烈士陵园中的烈士事迹陈列室中,并载入莘县和聊城市的各种史籍。为人民献身者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

张炳元血洒鲁西北



张炳元烈士遗像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发动和艰苦的防御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经形成，但顽固势力仍十分猖獗，中共党组织仍处于居无定所的地下活动状态。就在这年的7月13日深夜，曾任中共莘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时任中共鲁西区第一地委书记、年仅23岁的我党优秀领导干部张炳元在朝北化庄（今属莘县王奉镇）被国民党顽

军头子王金祥的特务营长马泽远等人暗杀，使我鲁西北党的发展和抗日斗争的开展蒙受了重大损失。

学生领袖

张炳元，河北省文安县胜芳镇人。父亲一生经商，精明能干，性格豪爽，母亲善良贤淑，乐善好施。张炳元生于1916年8月17日，9岁入本镇北大寺学堂念书，14岁考入天津市南开中学，先后在初、高中部学习。在南开中学，张炳元耳闻目睹了进步学生掀起的一次又一次革命风潮，长期经受着革命思想的熏陶，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开始关注，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初步认识。他经常和

一些有共同语言的同学一起泡在图书馆里,阅读进步书刊,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革命理论书籍,从中汲取营养,思想受到进一步启迪。与此同时,他还喜欢阅读中国的史籍,对《韩非子》、《孟子》、《墨子》等先秦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涉猎十分广泛,而且在学习研究上颇有见地。他还擅长写作,其讽刺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多次以“向东”的笔名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

1934年,张炳元和几个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并出版不定期刊物《野烟》。在这个刊物上,他编辑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向往光明、革命倾向十分明显的诗歌、散文、小说。有一次,他把国文老师吴组缃(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以《最好的印象》为题刊登在《野烟》杂志的醒目位置。这篇文章简略介绍了吴组缃回福建苏区探亲的见闻,虽不过几百字,却明白地告诉人们,红军并不像反动派宣传的那样可怕,而是有理想、守纪律、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新型军队。

1935年,张炳元已成为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就在这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北平爱国学生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张炳元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愤慨,于12月12日中午和学生会主席吴祖贻等人召开会议,决定致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12月17日,张炳元参加了天津各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共同组织了12月18日举行的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中,张炳元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走在学生队伍的第一排。12月18日,张炳元与其他

几名进步学生一起组织南开中学 800 余名学生，冒着保安队的水龙喷射，冲出校门，加入到全市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并以卧轨表示抗议，还把传单贴到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内。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不仅震动了华北，也波及到全国。

1936 年，张炳元参加了“秘密读书会”，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阅读马列书籍和我党的抗日救亡刊物，后又参与组织了“新文字促进会”，创办了会刊《活路》，以研究文字改革问题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抗日先锋

1936 年 4 月，经傅鹏翥介绍，张炳元在天津法商学院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 3 人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在一张合影照片背面，张炳元激动地写上了“这是一个新阶段”7 字，以永远记住这个政治生命中的转折点。

1936 年夏，张炳元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入校之始，他就和学校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着就在党组织领导下，串联进步同学，扩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学们无法安心学习，在党组织的引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加入抗日行列。张炳元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北平失陷后，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撤，张炳元怀着一腔愤恨，辍学回到天津，在父亲的商号中住下来。不久，天津失陷，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经海路到济南，进入韩复榘举办的第三集团军军政人员训练班，直接加入抗日队伍。张炳元说服父母，历尽艰难，经青岛到达济南，终于成为政训班的一员。不久，

驻守聊城的山东省第六专署专员范筑先将军决定成立政训处，以加强全民抗战的发动工作。范让政训处主任张维翰从济南的政训班选拔 240 名政训服务员，张炳元被选中，于是以政训服务员的身份来到聊城，时间是 1937 年的秋天，张炳元 21 岁。

1937 年 10 月，范筑先将军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拒不执行韩复榘让他弃城南撤的命令，坚决守土抗战，与聊城共存亡。为了加强各县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范筑先决定让政训处在各县均设立办事处，张炳元和吕世隆共 20 人被派往茌平，吕世隆任办事处干事（负责人），张炳元等人任政训服务员。针对茌平的抗日斗争局面尚未打开的现状，发动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开办训练班培养地方干部，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办事处也建立了党支部，张炳元任支部书记。他们深入到最基层的群众中去，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吸收入党，为茌平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写给三哥的一封信中，张炳元这样说“我们整天在忙，在做活，并且还很愉快”。由此可以看出张炳元高涨的革命斗争热情。

1937 年底，张炳元和也是中共党员的吕世隆一起被调到莘县工作，吕世隆任抗日县长，张炳元任办事处干事。张炳元一到莘县就和莘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吕世隆、冯子华一起组成了莘县党的三人领导小组，又发展了一批政训服务员。不久，张炳元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党员深入集镇和较大村庄，广泛发动群众，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人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在一些较大的村庄建立了农会等抗日组织，对稳定社会秩序和推动抗日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 年 2 月，莘县县委建立，张炳元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吕世隆也参加县委领导。县委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培养基层干部，二是发展党员，三是建立武装。这年四五月间，张炳元主持举办了第一期农会干部短训班，并带病亲自担任主讲。张炳元身为县委书

记,生活却十分俭朴,一套军装穿几年,冬天从来不点炉子,长年睡光板草席,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被子,吃饭从不挑拣,一年中有半年以地瓜为主食。在工作上,张炳元总是保持着十分的热情,从不马虎将就。1938年5月,为了迅速壮大党的队伍,张炳元倡导发起了一个“红五月”大发展活动,一个月中发展党员500余人。到秋天,莘县已有党员800多人,数十个支部。在国民党顽固势力比较强大的黄楼店、礼院、曹楼等村也建立了支部,仅在四区就建立了南无村、马村、河涯、大索庄、罗村庄、中牟町、马固等十几个支部。四个区的党委也相继建立,莘县的党组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张炳元为党的发展而高兴,家里却多次写信让他回去完婚。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干扰,他干脆以地址不固定为由暂时和家里中断了联系。

人民英烈

1938年11月15日,日军攻陷聊城,范筑先将军殉国。16日晚,为防止莘县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乘机闹事,张炳元亲自给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写了两封信,请求派一部分武装来支援。谁知信刚派人送出,17日就发生了“莘县事变”,吕世隆被枪杀,张炳元亦被扣押。由于张炳元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反动分子始终没敢加害于他。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张炳元很快被放出来了。一脱离反动分子的魔爪,张炳元立即起草了《告鲁西北同胞书》,油印后广为张贴散发。他在这份文告中披露了莘县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分子破坏抗战的罪行,号召鲁西北人民行动起来,打退日军和顽固派的进攻,为范将军和吕世隆县长报仇。随后,张炳元经莘县北部的郭家一带辗转来到冠县,和撤到冠县境内的莘县县委其他领导

人一起在冠莘边界一带坚持斗争，志在重新打开莘县对敌斗争的局面。

1939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统一领导鲁西北、鲁西、泰西三个特委，张炳元任鲁西特委书记。三至六月间，上述三个特委撤销，在所领导地区先后建立七个地委，张炳元任第一（也称鲁西北）地委书记。

担任地委书记职务后，张炳元一如既往地投入全部精力，调动全部聪明才智开展抗日工作。他的一切活动都在群众之中，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群众。因此，鲁西北人民尊敬他，爱戴他；而地方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却对他又恨又怕，千方百计要陷害他。明着下手怕招众怒，便在暗中策划阴谋。张炳元常在一些村子的大街上转悠，东家进西家出，找人谈心交朋友，反动分子见有机可乘，便指使一名暗娼打扮得花枝招展，故意在他面前搔首弄姿，动手动脚，直到肉麻地写信“求爱”。张炳元无情地揭露了反动分子的阴谋，并当众将信撕得粉碎，还以此为例子，教育其他同志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1939年7月初，在张炳元的领导下，冠县“动委会”一举消灭了18个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这更增加了他们对张炳元的仇恨。他们狗急跳墙，决定对张炳元暗下毒手。聊城的顽固派头子王金祥的特务营长马泽远一再扬言要报仇。他们像猎犬一样到处打听地委机关的行踪，寻找机会，以求一逞。7月13日晚，地委机关人员进驻朝北化庄。天空乌云渐厚，接着下起了小雨。忙碌了一天的张炳元等地委机关人员在一家老乡的屋里，以门板当床，睡得正香，筑先纵队三营的战士也大都休息了，整个村庄一片寂静。拂晓时，一伙身穿灰色八路军服装的人骗过哨兵混进村内，在夜幕掩蔽下，摸进了地委机关人员睡觉的小院，这正是受王金祥指使前来暗杀张炳元的马泽远一伙人。张炳元听到动静，欠身坐身，来人用手

电一照，见是张炳元，突然开了枪。鲁西北党的主要领导人张炳元，就这样在恢复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刻被敌人暗杀了，年仅 23 岁。

张炳元遇害后，遗体被暂时安葬于化庄村外。1945 年，位于莘县西北部丈八村的鲁西北烈士陵园建成后，烈士遗骨被移入园中，建墓安放。后来，烈士遗骨迁至河北省的烈士陵园，丈八陵园中的大墓遂成空墓。尽管如此，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干部群众和中小學生仍要来此集会悼念，并久久地在烈士墓前伫立，以寄托深深的哀思。

重建张鲁清真寺碑文

张鲁古镇乃移民聚居之地，向为县城肘腋，今名远播。张鲁清真南寺系鲁西北地区最古老清真寺之一，该寺始建于元至正八年（公元一三四八年），历经明永乐三年、嘉靖十二年、清道光十四年三次修葺，渐形成宏伟壮观之宫殿式建筑群。著名阿訇沙梦弼、蔡永清、何其宽等曾在此执教。战争年代，宋任穷、杨得志、赵健民、杨易辰、马本斋、黑伯理、丹彤等曾多次在寺内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文革初期，历经六百余年沧桑之一方名寺惨遭拆毁，致使众多移民聚礼无所。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全体移民深受鼓舞，重建清真寺呼声日高。在上级扶持、李志强阿訇关注和本镇五街、韩庄、沈庄干部鼎力协助下，筹建工作迅速启动。本镇和省内外张鲁籍之回民同胞及汉民教友慷慨解囊，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在原址破土动工，一九九六年，一座集大殿、讲堂、沐浴室为一体的清真寺告竣。寺之重建，乃移民大事，百代伟业，特勒石铭文以记之。

联曰：古寺重光，移民聚礼得所在；

教义永存，八方协力铸春秋。

（杨巨源 撰）

战耿楼史钦琛殉国



史钦琛烈士遗像

1940年6月25日清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政委史钦琛率二营在朝北耿楼(今属莘县王奉镇)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包围,经过一夜激战,二营有127名指战员壮烈殉国,其中包括27岁的团政委史钦琛。

日伪军合击冀鲁豫

1940年濮、范、观、朝、莘一带的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并渐有连成一片之势,敌人对此感到恐慌不安。不久,日伪军大举扫荡,顽军卷土重来,土匪会道门也乘机大肆活动,出现了日、伪、顽、会、匪五种势力同时作乱的局面,当地人称“五鬼闹边区”。“五鬼”中除日伪外,数顽军对我威胁最大,顽军中又数王金祥和石友三部最为猖狂。为排除抗日斗争的障碍,我军主力部队于1940年初在冀鲁豫边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顽作战。2月9日,我冀南、冀鲁豫、鲁西北主力部队在卫河以西对石友三部发起反击,歼灭顽军7000余人。2月22日,宋任穷、程子华指挥17个团的兵力,在冠县、朝城、观城、清丰、南乐、濮阳一带再次发起反顽作战,在观城、金滩镇、六塔集、东

北庄等地重创顽军,石友三、高树勋率领残部窜过陇海路,逃到民权、曹县一带,濮、观、范一带大部被我控制,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

1940年5月,反顽大军在濮阳、清丰、观城一带整军后,宋任穷、程子华率主力部队回到冀南。八路军第二纵队、三四四旅和南进支队等部在黄克诚领导下整编,建立冀鲁豫军区。这次整编中,在鲁西北成长起来的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3个团。整编完成后,二十三、二十四团即开过卫河到达冀南,归冀南军区指挥,二十二团暂留鲁西北坚持对敌斗争。

6月5日,驻开封、新乡、商丘的日军步兵6000余人、骑兵2000余人带着160余辆汽车、16辆坦克向濮阳一带发起攻击;发现我主力后,又调集兖州、泰安、徐州、安阳、邯郸日军2万余人,分成12路向清丰、濮阳合击。我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下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新八旅二十二团三营奉命从观城一带撤到朝北与敌周旋,在强敌面前,三营指战员在团政委史钦琛带领下没日没夜的转战,寻机袭扰打击敌人,斗争十分艰苦。

史钦琛转战鲁西北

史钦琛,原名史序书,河北省成安县亦村人,1913年12月生,家庭是个富裕农户。19岁考入保定民生中学,21岁考入北平某中学高中部,从此改名史钦琛。1935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中,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致力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被捕。敌人施尽酷刑,也没能使史钦琛屈服,先后把他转送到冀察绥靖公署和陆军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史钦琛被释

放。他和大批青年学生一起经海路辗转到济南，考入了韩复榘举办的第三集团军军政人员训练班。

1937年10月，史钦琛等240名政训服务员应范筑先将军要求来到聊城。后来韩复榘命令南撤，史钦琛、张维翰等42人决心与范筑先将军一起留在聊城坚持抗战。齐子修溃兵来到后，他们曾一度转移到东阿境内，最终只有包括史钦琛在内的28人决心再回聊城，后来被人称为“二十八宿”。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抗日宣传，史钦琛和于笑虹、张承先等人一起被派到齐子修的保安第三营做政治工作。1938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鲁西北第一支抗日武装——十支队在冠县成立，司令员张维翰，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史钦琛任二团政治部主任。

1938年底，以李聚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组建，史钦琛调任鲁西区党委组织科长。1939年1月，十支队改编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5月，史钦琛被调到筑先纵队，接替袁仲贤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先后随纵队参加了俎店战斗、富裕集战斗、金郝庄战斗，后来又参加了讨伐石友三战役。1940年5月“筑纵”和“先纵”合编为新八旅后，史钦琛被任命为二十二团政治委员。

担任团政委后，史钦琛带领二营在朝北耿楼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敌人数倍于我，众寡难敌，他就带着部队与十几股敌人周旋，在敌空隙中穿来穿去，相机给敌人以打击。他们白天打敌侧翼，夜晚扰敌宿营地，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日夜不得安宁。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史钦琛不忘本职仍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除掌握敌情、指挥作战外，还挤时间把敌人残害群众的情况归纳在一起，用具体事例教育部队，鼓舞指战员的斗志。

耿楼之战谱壮烈

1940年6月25日拂晓,二营与敌周旋了一夜之后来到耿楼,修筑工事、安排警戒后正准备休息,从聊城、冠县等地出动扫荡的2000多日伪军步、骑、炮兵,在1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突然向耿楼袭来。待哨兵发觉时,敌人已从村东、村西包抄推进,并用火力封锁了村南的通道,在突遭围攻的情况下,史钦琛沉着地指挥部队应战。他命团部、营部直属部队和勤杂人员顺路沟向西北突围转移,六连、八连迎击南面、西面之敌,自己亲自指挥七连朝东打击主攻的敌人。他高声鼓动说:“今天我们要坚决将敌人打退,让敌人进到村里就是我们的耻辱!好战士牺牲在战场上是光荣的!”

在史钦琛带领下,七连指战员不畏强敌,在村东敌人的主攻线上连续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敌人久攻不下,改村东的主攻为佯攻,抽调兵力加强对村南和村西的进攻。经过一阵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六连、八连渐感不支,阵地被敌人攻破,遂退入村内与敌展开巷战、院落战、肉搏战。战斗持续至午后,共打了7个多小时,击毙日伪军100余人。最后,二营指战员退至村子北部,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史钦琛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年仅27岁。同时牺牲的还有其它127名指战员。

耿楼战斗后,二十二团也开过卫河到达冀南。从此,新八旅在一二九师和冀南军区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史钦琛牺牲后,与同时遇难的127名指战员一起,被安葬于耿楼村东。1945年,位于丈八的鲁西北烈士陵园建成后,史钦琛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入园。

1956年，史钦琛烈士遗骨迁往邯郸革命烈士陵园；但丈八陵园中的史钦琛烈士墓仍与肖永智、张炳元二烈士之墓并列矗立，年复一年地受到鲁西北人民的祭扫与瞻仰。

曾广福墓志

曾公讳广福，世居莘县董杜庄村，生于一九一四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一九九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辞世，享寿八十有五。公少时苦难备尝，艰辛历尽；及长更心恤民众，渴盼光明。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事事带头，处处垂范，如旗帜飘鲁西，永不褪色。孺人董氏勤劳贤淑，懿德可钦。相夫教子，迎来送往，家政独荷，了无怨言，与公分主内外，相得益彰。公之事业有成，不乏内助之功。公于一九四九年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登台观礼；一九五零年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喜膺金奖；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数十次进京赴会，荣耀等身。公在省、地、县各级皆曾任职，职名愈高，为人愈恭，心清眼亮，德高志诚，扶困解厄，造福桑梓，鞠躬尽瘁，终生不已，堪称心系千万人，名满冀鲁豫。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赞其为“中国农民的典范”，诚为名实相副，当之无愧。公之伟业丰功，须百世永记；公之高风亮节，将长启后人。呜呼，人有寿夭，天不假年。世间如多些德行如公者，国必增祚，民必增福，中华振兴复何虑哉。碑成之日，敬撰墓志。时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

（杨巨源 撰）

“南支”强攻古云集

1940年12月8日，暂归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的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奉命向据守古云集（时属濮县，今属莘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部孟昭进暂编第一师发起强攻。经过四天激战，歼敌近3000人，拔除了敌人突入我根据地的一个颇具威胁性的据点，为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扫除了障碍。

誓师攻坚

1939年冬，正当我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各地抗日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精神奋起反击，当时称为“讨逆斗争”。

1940年初，我冀中、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地区的部分主力部队在宋任穷、程子华指挥下，连续取得了南宫、大营和卫东战役的胜利，敌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王金祥等部全线溃退，分别撤至豫东和鲁西南一带。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石友三趁日伪军大“扫荡”之机卷土重来，再次占领濮县、濮阳一带，企图以此为依托，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12月1日，顽军

发生内讧，蒋介石密令高树勋处死了石友三及其弟石友信，石友三嫡系文大可窜至朝城投靠日军，濮阳周围的据点被暂时放弃。这样，石友三原部下孟昭进暂编第一师驻守的古云集便成了突入我根据地的一个孤立据点。为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讨顽指挥部决定由南进支队消灭孟昭进的暂编第一师，收复古云集。

古云集是个有寨墙的大村，寨墙虽为土筑，却相当高大坚固。寨外挖有深沟，宽深均达一丈多。沟底栽着密密麻麻尖头朝上的木桩，人称“刀山”；沟外布置宽宽的一圈鹿寨，都用粗大的树头交互盘错组成（为设鹿寨，敌人砍光了附近12个村庄的大树）。树上和鹿寨上挂满手榴弹，每个手榴弹都拉出拉线，接上绳子，牵到寨墙顶上，敌人牵动绳索，可使成百上千的手榴弹同时爆炸。对这种防御工事，敌人叫它“地网”。几个寨门的吊桥处均为两道沟堑和两道鹿寨。村内路口处都修了暗堡，可以向四个方向水平射击。临街的房屋上均有掩体或堡垒，可以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看来敌人对一旦寨破后进行巷战也作好了准备。面对这样一个森严壁垒的大村寨和装备精良的三千多守敌，我主攻部队仅仅一个团约3000人，每个连只有一、二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另有几门缴获不久的迫击炮，战士们刚学会操作，且炮弹也不多，再加上是第一次打攻坚战，不大会用也舍不得用。兵力与装备上相比是敌强我弱，强者凭险固守，弱者在明处强攻，其艰险可想而知。

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南进支队决定，以二十一团在西南面主攻，二十四团在东北方向助攻，冀南军区新四旅则以七七一团在东南角打援。为了便于隐蔽接敌，减少伤亡，我指挥员将进攻时间选在了夜晚。12月8日晚，担任主攻任务的二营从西南角发起攻击。开始是偷袭，被敌人发觉后改为强攻，久攻无效，黎明前撤回冲锋出发地。12月9日晚改由一营主攻，仍然无功而返。12月10日将攻击点改在南面，也仍然打不开缺口。濮县方向的敌援兵虽

已被我阻击，攻寨部队基本上无后顾之忧，但三夜攻击无进展，指战员心里都窝着一股火。攻城部队在轮流主攻的间隙，从上到下都在研究战法，出谋划策。11日，南进支队在总结攻城失利原因和认真组织动员后，向二十一团下达强攻命令。司令部进至古云集南一公里处直接指挥，各级指挥员和机关干部都深入营连加强领导。团长胡乃超和政委曾凡友又共同召开了一次排以上干部和部分班长参加的“诸葛亮会”，从总结经验教训中归纳出三个要点：第一，攻击部队的组织要有利于在实战中形成连续突击的力量，以保证及时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第二，发起冲锋后，要尽量缩短越过沟堑障碍的时间，以减少在寨墙下的体力和弹药消耗；第三，选择破击点要避开敌交叉火力网最强处而择其树障稀少的开阔位置，以利我隐蔽登墙。

方法找到后，立即进行新的战斗部署：二十一团命三营为正面主攻，支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张同钰帮助指挥。三营则以九连为突击队，由营长孟广洪指挥；教导员魏志明率其余两个连在攻击点西侧掩护。一营作二梯队，准备接续三营扩大战果。二营为总预备队，向濮县方向警戒，并准备破寨后参加巷战。部署完毕，以连为单位进行战前动员。担任突击队的九连层层都指定了代理人，以保证战斗指挥的连续性，有的代理人又指定了代理人，人人都抱定了拼死和必胜的决心。共产党员都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零用钱拿出来交了党费；团青年干事张悟然随九连行动，他把最心爱的口琴交给了后面的战友，并豪情满怀地吟了两句诗：“风萧萧兮夜野寒，不破敌阵兮誓不还！”谁知战斗胜利后，他真的没有生还，还有许多同志也没有生还。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冒死破寨

12月10日夜幕降临之后，临战准备开始。战士们把白天准备好的大量秫秸和桌凳运到冲锋出发地，以备填沟之用。担任突击队的九连组成的火力队、梯子队和尖刀队各就各位，跃跃欲试。发起总攻前，先用迫击炮向寨里试射了几发炮弹，一为验证一下迫击炮在攻坚战斗中的作用，二为震慑敌人。不料这几发炮弹不但炸死炸伤了一批敌人，连敌师长孟昭进也被炸伤，这是后来从俘虏口中知道的。大约7点钟，几支冲锋号同时吹响，嘹亮的号声响彻夜空，战士们像猛虎一样一跃而起，不顾寨墙上敌人的扫射和鹿寨上手榴弹的爆炸，填塞寨沟，飞越而过，很快冲到寨墙下。这时，敌人设在鹿寨上的连环手榴弹响作一团，形成了一阵长雷般的轰鸣。尖刀队的战士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巨响中顺梯而上，前面的人中弹摔下来，后面的接着往上爬。有的战士一边爬梯子一边用镐头在寨墙上挖脚蹬窝，另辟攀登通道；有的战士以极快的速度在寨墙上挖出一道竖沟，以作临时掩体，躲避两边的交叉火力。经过一阵前仆后继的冒死攀登，九连通讯员咸印堂第一个跃上寨墙，立足未稳就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跟进的战士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搜集干草点火，这是事先约定的登上寨墙的联络信号。后续部队一见火光，立即冲锋跟进。登上城墙的战士连扔几颗手榴弹，把寨墙炸出了一个狭窄的缺口，从下往上看好像“一线天”。敌人见寨墙被攻破，立即组织火力组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从两边寨墙上居高临下地封锁突破口，企图阻挡我后续部队跟进；冲上来的一营指战员视死如归，冒着枪林弹雨向突破口压去，与九连一起死死地将突破口守住。九连指导员张聚通边冲边喊：“快冲呀！宁可死在寨里也

不能死在寨外！”后来，一块飞弹皮夺去了他的生命。九连连长刘仲民在抗击敌人反扑时负了重伤，营教导员魏志明命令他下去，他坐在寨墙上坚决地说：“我不下去！我一定要亲眼看着消灭这伙敌人！”不幸第二颗子弹又击中了他，他睁着眼睛倒在了寨墙上，真有一种死不瞑目的壮烈。正在破寨之际，濮县的敌人闻讯来援，我担任打援任务的二营立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前来协助攻寨的南进支队七七一团同时出现在敌军东侧，两下合击，敌援军顿时大乱，仓惶逃窜。我阻击部队并不追赶，而是退回村南大堤上待命，随时准备协同二十一团攻寨。

巷战歼敌

九连占领豁口后，迅速派排长姜文彬带一部兵力攻占寨墙内的第一座院落，以巩固豁口阵地并进而展开巷战。敌人见我军攻势猛烈，料难阻挡，便放弃了对突破口的火力封锁，退进村内，试图利用民房掩护阻止我军扩大战果。姜文彬带人占领第一座院落后，敌人立即组织猛烈的反扑，妄想把我冲进来的部队压回豁口处，进而逼出寨外。九连代理连长、党支部书记左春田来到姜文彬所在的院落，帮助指挥战斗。敌人的第一次反扑被打退之后，姜文彬趁战斗间隙把战士召集到残墙下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要求大家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做到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在阻击敌人的又一次反扑时，左春田和几名战士牺牲了。跟上来的三营分支书记苏克之指定姜文彬为代理连长，继续指挥战斗。姜文彬激动地鼓励战士们：“我们多坚持一分钟就能多换来一分胜利。打退敌人进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这时，十连也在向第一座院落靠近，连长李玉昌一边射击一边

高喊口号给战士们鼓劲。敌人见我后续部队来到,不敢恋战,迅速向村中撤去。第一个院落的攻守战,形成了整个战斗的第二个高峰。固守这一院落,对扩大战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敌人被打退后,院落已是墙倒屋塌,残墙外敌尸枕籍,由此可见这一争夺战的激烈与残酷。

就在第一个院落的攻守战正在进行的时候,九连的九班长和青年干事张悟然正在突破口处依托地堡与沿城墙内侧反扑过来的敌人对峙。双方的手榴弹、子弹都打光了,两个敌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迎面扑来。当双方相距四五米时,张悟然拿起一块砖头兜头打去,正好打在敌兵脸上,他乘势夺过大枪。敌兵一看不是对手,抱头鼠窜而去,张悟然也被流弹击中身亡。突破口巩固住了,三营、一营和二营的其他两个连相继冲入寨内,寨墙上的枪声渐渐停止了,敌封锁突破口的火力全部转移到了村内。冲入寨内的二十一团指战员杀声震天,顺着一条条街道胡同追杀敌军。敌军赖以固守的寨墙被攻破,第一座院落又未夺回,在四处被追杀的情况下,知道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顽军师长孟昭进率领残部,从寨北阵地上找了一个缺口,仓惶出逃。此次战斗,我军毙伤敌两千多,俘敌八百余,二十一团指战员伤亡三百余人。

强攻古云集是二十一团建团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在我方缺乏攻坚经验、敌人实力又强于我的情况下,能在第四个夜晚一举破寨,主要靠的是指战员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时隔四十多年后,当时曾亲自指挥三营作战的南进支队领导张同钰于1984年重访古云集,对此仍感慨良深。

苏村一战震敌胆



苏村阻击战烈士墓

1941年1月,侵华日军在鲁西平原进行多兵种联合的冬季大扫荡,我鲁西军区特三营九、十两连在苏村(今属莘县王庄集乡)打了一场漂亮而惨烈的阻击战,130多名指战员硬是靠机步枪、手榴弹和刺刀将拥有大炮、坦克、飞机的一千多

日本兵阻击了整整8个小时,胜利地完成了掩护我军区、行署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这一仗,鬼子丢下了300多具尸体,我123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当得知阻击他们一千多人8个小时立体进攻的只有100多名抗日官兵时,日军指挥官大为震惊。

奉命转移

1940年8至12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等部共105个团20余万人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对日寇的进攻性战役,历时5个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灭日伪军45000人,攻克据点2900余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这一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后，日寇将我敌后抗日武装视为眼中钉，开始了全面大扫荡。为了扩大百团大战战果，配合冀南军区反扫荡，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司令员杨勇率主力部队第七团和特务第三营（军区警卫营），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在潘溪渡和郛城之间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缴获九二式野战炮和其他武器一部，给了进攻鲁西南的日军木村师团当头一棒。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获悉后恼羞成怒，急欲报复。短期内纠集了以木村师团为主的日伪军万余人，配有汽车千余辆、坦克二十余辆、大炮数十门、飞机十多架，从京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沿线三面向我冀鲁豫地区压缩。日寇重兵集结于大名、临清、聊城、济宁、菏泽等地，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向我冀鲁豫中心区濮、范、观、朝等县猛扑过来，妄图一举荡平我冀鲁豫根据地。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踏平鲁西，活捉杨勇！”他们急欲捕捉的目标是我军区指挥机关，同时也想夺回被缴获的九二式野战炮，因为这种炮对敌人的炮楼、碉堡有极大威胁。

敌人的这次扫荡，采用的是包括快速部队在内的多兵种联动战术，动用重型装备之多，是抗战以来罕见的。敌人行动非常隐蔽，完全采用夜间运动的办法，且不经大道，而是以飞机侦察指挥快速部队进行远距离奔袭。一旦发现目标，即以汽车运兵堵截包围，以坦克强攻，可谓其势汹汹，志在必获。

为对付敌人的扫荡，军区于 1 月 16 日上午在范县龙王庄召开营以上干部反扫荡动员会。会议认为，在反扫荡中，要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找到敌人的薄弱之处再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冀南军区已转移到卫河以东，鲁西军区的首

脑机关拟经朝城马集（今属莘县）一带撤向徒骇河西，军区部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军区机关和学校、报社、医院、被服厂、文工团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

晚九点，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离开龙王庄，深夜两点到达马集、呈旺一带。军区首长命令：特三营警卫营营部率九、十两连在呈旺村北3里之苏村宿营，连夜构筑防御工事，并向东北朝城方向警戒。苏村位于朝城西面35华里处，与马集、呈旺成鼎足之势，周围地形开阔平坦，村周围有四尺多高的坍塌寨墙，舍此便无险可守。130多名指战员一放下被包便忙着挖掩体，构筑工事，做好阻击朝城方面来敌的准备。敌人用飞机侦察了军区部队的动向后，从东南方面尾随而来，朝城方向的敌人也有向马集、呈旺合击的迹象，看来敌人的主攻目标是马集和呈旺，目的在于捣毁我指挥机关，而当时我军区机关正准备从马集向西北转移，如与敌人遭遇损失将不可估量。特三营九、十连的指战员见此形势，顿时明白了苏村位置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一场不同寻常的阻击大战在所难免。

顽强阻击

苏村位于徒骇河东岸，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庄，东北距朝城敌人据点17公里。村中有一条丁字街，向东可通朝城，向西可通马集。村中百姓听说要在此打仗，男女老少在村长带领下帮助战士们挖工事。早晨七点，一切准备就绪。

上午9时左右，哨兵来向营长报告，说东南方向尘土飞扬，有6辆满载鬼子的汽车从沙窝向马集方向扑去。话音未落，九、十连的哨兵相继鸣枪报警。营长钟铭新一边安排人员组织群众向西撤退，一边命令号兵吹调兵号，机枪手开枪射击，把敌人吸引到苏村

这边来。敌人听到调兵号声和只有军区警卫部队才配备的苏式转盘机枪声,果然以为目标在苏村,便置马集、呈旺于不顾,调头朝苏村扑来。钟营长命令沉住气,放近了打!当敌人进到距我前沿工事只有100多米时,钟营长一声令下,机步枪一齐开火,枪声压过了汽车的引擎声,汽车嘎然停止,不少鬼子中弹后从汽车上栽下来。其他鬼子立即跳下车,排成战斗队形向我九连阵地冲击。九连战士凭借工事掩护展开火力,又杀伤一批敌人,剩下的鬼子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几分钟后,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数十辆汽车停在400米以外,200多个鬼子跳下汽车,在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小炮的掩护下蜂涌着冲过来,我九、十两连战士同时施展火力将其击退。鬼子锐气受挫后,藏在被打坏的汽车后面久久不敢露头。

第一轮战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十点左右,战场上枪声渐停。估计敌人是在研究对策,调整部署。钟营长趁机用电话向军区领导报告战况。军区领导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苏村,阻住敌人,为领导机关和后方人员转移争取时间!接着,钟营长检查部队伤亡情况,发现部队有近20人伤亡,弹药也已消耗过半。钟营长当即决定:为了集中使用子弹并减少伤亡,两个新兵排撤向马集随司令部行动,将子弹留给老兵;两个连各派出十几名战士进村找木料、大车或石滚,防止敌人坦克冲击。接着,营连干部经过简短研究,作出如下决定:一、坚决完成阻击任务,保证领导机关万无一失;二、死守苏村,誓与苏村共存亡;三、坚决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实在不行就撤进村子展开巷战,用面对面的拼杀赢得时间;四、节省弹药,不放空枪;五、销毁全部文件;六、轻伤员继续参加战斗,重伤员立即转移隐蔽。

六项决定,立即传达到每个战士。这时的形势是:我九、十两连共有不到120人,且弹药严重不足;敌人是一个联队,一千余人,80多辆汽车,8门大炮,还有4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兵力的悬殊显

而易见。但全体指战员毫无畏惧之色,战斗激情有增无减。

我九、十两连的顽强阻击,使敌人更确信我军区首脑机关就在苏村无疑。他们将全部兵力压上,实行南北包抄、中央突破战术,再次猛扑过来。上午十一时,战斗再次打响,敌主攻目标仍是位于东侧的我九连阵地。激战中,九连连长黄学友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鬼子同归于尽。敌人乘机将九连阵地冲出一个缺口,副教导员秦光立即带领战士与敌拼刺刀,经过一阵白刃格斗,终于将敌人逐出村子,夺回了阵地。这时,一架敌飞机凌空飞过,战士们举枪乱射,只见那飞机拖着一溜黑烟,歪歪扭扭地向东北方向逃走了。

这时,敌人又冲破十连阵地攻进了南门,指导员严海元和代连长高云汉立即组织反击。战士们一阵猛冲猛打,将敌人顶了回去。敌人接连发起四次冲锋,皆被我指战员一一击退。敌人遇到了空前猛烈的抵抗,更确信我军区机关和杨勇司令员就在苏村。他们调来了所有预备队,对苏村四面包围,决心要用所谓“肉刀子”战术围歼我首脑机关,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激烈巷战

中午,营部接到军区留守处电话通知:军区机关已安全撤至徒骇河西,阻击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到河西与接应部队会合。正讲话间电话断了。原来敌人已完成了对苏村的四面包围,电话线也被切断了。敌人用重机枪封锁了通往苏村的所有路口,然后集中轻重武器向我阵地发起全面轰击。炮弹声震耳欲聋,100多挺轻重机枪和数百支步枪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一时间苏村四周天昏地暗,硝烟弥漫,令人窒息。火力准备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敌步兵开始

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苏村发起总攻。三营指战员打红了眼，个个视死如归，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寨墙守不住了退守街道，街道守不住了就上房，房顶守不住就逐巷逐院地争夺，直至发展到面对面的白刃格斗。

正当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敌人又调来了5辆坦克直冲九连阵地，大群鬼子兵跟在坦克后面步步推进。九连战士用集束手榴弹对付坦克，打得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难解难分。二排长刘勇身服重伤不能站立，便将几个手榴弹掖在腰间，爬到阵地前沿的通道口上，待敌人第一辆坦克开过来时，他同时拉响几颗手榴弹。刘勇牺牲了，敌人的坦克也瘫痪了。后面的坦克上不来，敌尾随的步兵顿时大乱。我九连战士趁机开火，打得敌人血肉横飞。红军老战士、营长钟铭新腹部被弹片打开，他忍痛烧掉身上的文件，将拖在地上的肠子塞进腹内，用棉衣角堵住伤口，拿起一颗手榴弹滚出掩体，拉出弹弦，与冲上来的几个鬼子同归于尽。十连指导员严海元在房顶上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忽然腿部中弹，连人带枪跌落小巷中，他抱着机枪打完了最后一梭子子弹，至死怀中仍抱着那挺轻机枪。

战斗进行到了下午一点多钟，敌人占据了村中的主要街道，我剩余人员只得人自为战，目的就是多杀鬼子，等待天黑突围。坚持到三点多种，我幸存指战员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互相间失去了联系，最后被压缩到村子的西部，斗志仍很旺盛。他们分散在胡同、院子和房顶上与敌人周旋，三人一群，两人一伙，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利用草垛和烟囱作掩护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砖头和三齿镢砸，宁死不屈。

到下午四点多钟，我方只剩下大约50多人，仍在顽强抵抗。敌人无奈，开始施放毒气。毒气呛得战士们剧烈咳嗽，眼泪鼻涕不停地流，胸前像压了块大石板，十分痛苦。他们找来湿毛巾包着肥皂

沫、大蒜渣捂在嘴上,继续坚持战斗。

到下午五点来钟,只剩下十来个人没被毒气熏倒,他们转移到苏村最西北角的一处小院中的一座破房里。见房后有一群鬼子正在烤火,战士们开枪打死2个鬼子,剩下的鬼子很快爬上房顶,将手榴弹和毒气弹一起往院子里投。毒气涌进屋子,战士们每人找了半碗醋喝仍无济于事。不久,所有人都会被熏倒,终于落入敌手。敌人将被俘的抗日战士扔在院子里,待冻醒后便审问军区机关和杨勇的去向,战士们一言不发。鬼子急了眼,兽性大发,用战刀和刺刀向战士们身上乱砍乱刺,战士们使出最后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最后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接近下午六点钟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怕遭我抗日武装夜袭,用汽车拉上死亡日本兵尸体和伤员向朝城方向撤退。敌人走后,苏村的群众回村来收敛烈士遗体,发现有几个人胸口还有热气,便赶紧包扎抢救,烤火喂水,然后抬到地窖里隐蔽起来,以此得以存活。这次阻击战,我鲁西军区教导三旅特三营以130多人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10倍于己、全副武装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方有123人壮烈牺牲,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却拉回了300多具尸体,还有数百人负伤丧失了战斗力。我鲁西军区直属机关政治处主任邱以发、特三营营长钟铭新、教导员邱良左和九、十两连的连长、指导员等优秀指挥员都在苏村的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今日苏村东头的一片树林中有三个硕大的土坟,那便是当年苏村阻击战中为国捐躯的我抗日指战员的合葬墓。每年清明节都会有各级领导和许多学校师生来此祭奠英灵,寄托哀思。

马本斋转战鲁西北



民族英雄马本斋画像

1942年9月，在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时候，马本斋奉上级命令率回民支队由冀中辗转到达鲁西北，配合当地抗日武装东突西杀，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为扭转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做出了积极贡献。回民支队在鲁西北转战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可谓战功累累。马本斋司令员病逝于鲁西，并被安葬于莘县的回民聚居地——张鲁集。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功绩将永载鲁西革命斗争史册。

进驻张鲁

马本斋，回族，1901年生，河北献县东辛庄人。青年时期在国民党军刘珍年部当兵，从班长、连长一直升至团长，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愤而解甲归田。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军，并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自任队长。1938年6月，回民教导队和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9年

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这支队伍向以能打敢拼著称，在冀中平原的献县、青县、大城、河间、沧县一带屡屡袭扰敌人，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破击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42年，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人，在冀中平原进行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马本斋率回民支队与强敌反复周旋，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支队政委郭陆顺等大批指战员为国捐躯，部队由鼎盛时期的2000余人锐减至700余人。为保存这支少数民族抗日力量，上级决定回民支队实行战略转移。7月初，部队越过运河和津浦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渤海之滨的冀鲁边区。8月下旬经河北的南皮、东光、山东的庆云、乐陵、陵县西来，然后沿马颊河南下，从平原县境内越过津浦路，于9月中旬经高唐、聊城、阳谷到达濮、范、观一带。回民支队刚到鲁西北就遇上了日军对我濮范观中心区的大扫荡，回民支队与教导三旅、南进支队一起，在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军区考虑到鲁西北军分区缺少主力部队，决定让回民支队进驻回民聚居地——张鲁集（今属莘县），马本斋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原司令员赵健民改任副司令员，另派张同钰担任回民支队政委，以加强政治领导。第三军分区在张鲁集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马本斋激动地说：“回民支队来到鲁西北，全靠回汉人民的支持与配合。只要军民紧密团结，一定能战胜眼前的困难，度过难关，夺取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长不了！”

回民支队一到鲁西北，便深深地扎根于回汉族群众之中。抗日军民的融洽相处，使回民支队结束了两年的游击战斗状态，开始有了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回民支部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3个大队改编为5个中队，中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

以利于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为了储备干部，又将机关精简下来的 200 多名营、连干部组成“干部训练队”，以学习训练为主，必要时也担负一些作战任务。回民支队每个连都配备有轻机枪和掷弹筒，司令部直属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迫击炮排。经过整编，回民支队编制满员，士气高昂。当时的莘县、朝北、莘朝边、朝城各县、区党委、政府给了这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以极大的支持，从柴米粮油到服装鞋帽都优先供应。地方党委、政府先后动员大批回汉青年参军，充实回民支队；张鲁集回民抗日救国会还派出最好的阿訇、张鲁清真寺的蔡永清任回民支队的随军教长。党政机关和人民的支持，使回民支队指战员人人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鲁西北抗日军民有了回民支队这个生力军，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大家都感到心里有了主心骨，抗战胜利的信心大大增强。

打出威风

为了回报鲁西北人民的关怀和支持，马本斋和赵健民认真研究了回民支队的作战任务。认为在朝北根据地周围的敌人中，以盘踞于莘县、冠县、堂邑结合部的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力量最强，对我威胁也最大。马本斋果断地决定，打蛇先打头，就拿齐子修开刀！针对敌人在此已盘踞数月、筑有较强防御工事的特点，马本斋和赵健民共同制定了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术方案。军分区领导下的各武装力量不断在齐部驻地活动，但齐子修知道回民支队装备好，是支善打恶仗、硬仗的队伍，龟缩在围子里不敢出来。当回民支队转移作战时，齐部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到根据地边沿抢掠骚扰。为使敌人上钩，马本斋故意传出回民支队到外线作战的消息，然后让回民支队秘密进入齐部周边地区，却命县大队

故意在敌人经常骚扰的村庄活动。敌人果然以为回民支队已远离,放心地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围攻县大队。双方正在激战,回民支队突然出现在敌侧后,内外夹击,敌军大乱而逃。从此齐子修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马本斋一贯主张,部队要敢打恶仗,会打巧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烂仗。在进攻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采用了自己独创的“土坦克”战法。他让战士背驮用湿棉被覆盖的方桌,手提地雷,冒着弹雨运动到敌寨门下,埋好地雷后回来向敌人喊话,结果地雷尚未引爆,守寨之敌就乖乖地投降了。1943年秋的一天,张鲁回民游击队和莘朝边七、八区的区队夜宿滑营时被马厂、十八里铺几个据点的200余伪军包围,马本斋闻讯率回民支队赶到,对敌人实施反包围,并采取围三空一、虚留生路的战术诱敌出逃,然后内外夹攻将敌击溃,又歼灭逃敌一部,大获全胜。

1942年11月的一天,马本斋在摸清敌人活动规律的情况下,派出第三中队潜至敌马厂据点附近,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而后埋伏在敌人查线必经的焦花园村。次日拂晓,敌果然派出两个班伪军查线,被三中队全部俘获。马厂据点的伪军随后追赶,莘县城内伪军亦出城增援,行至西马厂村时,被马本斋预先埋伏的两个中队击溃,30余伪军毙命。接着,马本斋把队伍布置在濒临徒骇河的大小宋庄一带,准备迎击敌人的报复性进攻。没过两天,果有聊城日军200余人在莘县一个伪军中队的配合下顺徒骇河道向西南方向开来,伪军在前面开路,日军随后跟进。行至大宋庄村东时,回民支队的重机枪突然开火。伪军一见是我军主力,立即四散逃命,日本兵顿时暴露在我强大火力面前。日军打掷弹筒进行反扑,一日本兵慌乱中将炮弹倒装,引起炸膛,日军大乱;回民支队乘机发起攻击。敌人溃不成军,狼狈回逃,回民支队直追至莘县城下方收兵而回。

1943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马本斋了解到罗屯的敌人比较麻痹。因为此地距朝城文大可部很近,外围又有其他据点碉堡掩护,守据点的敌人十分懈怠,加之又值过年期间,警惕性更差。马本斋抓住这一时机,来了个黑虎掏心,只用半个小时便将罗屯据点攻克,击毙2人,俘获伪乡长以下30余人。没过多久,朝城守敌文大可派出一个连到申屯修据点,敌人白天修,我游击队夜里拆。为防游击队袭扰,朝城伪军派出巡逻队,天一亮便在申屯附近转悠,妄图截击游击队。马本斋掌握了这一规律,派一个中队夜里到敌巡逻队常路过的李庄埋伏。第二天一早敌巡逻队刚到李庄,严阵以待的回民支队将其截住一阵猛打,敌人一触即溃,30多人被抓获。

由于连年灾荒,粮食奇缺,各据点伪军见到有村庄冒烟,常不顾一切地出来抢饭吃。马本斋掌握了这一规律,选定一个周围都有敌据点的村庄,命部队夜间运动至村外设伏,派一些战士清晨进村点火放烟。结果引得3个据点的敌人都来抢饭,回民支队一阵猛打,俘敌60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500余支。

马本斋采用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术,在鲁西一带连连克敌,打十姓庄据点、拔谢炉碉堡群等战斗,都是出奇制胜,使敌人防不胜防。在战斗的间隙,回民支队还组成工作队帮助贫苦农民开展借粮斗争,又掩护运粮队伍把几百万斤粮食从濮、范、观中心区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运到张鲁、王奉一带,解了群众缺粮的燃眉之急,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回民支队东征西讨,打掉了刘仙洲、文大可、齐子修部的嚣张气焰,遏止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蚕食”进攻,巩固扩大了以朝北为中心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鲁西北,回民支队成了日伪军的克星。莘县伪县长刘仙洲一听到马本斋的名字就害怕,他常说:“那是爷爷,咱惹不得!”群众却说:“马司令一

到,咱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英雄捐躯

1943年夏,回民支队参加朝南战役后奉命调往鲁西南的昆吾、尚和一带,马本斋任新组建的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就在这年11月,回民支队配合军区主力在八公桥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1943年10月,15000名日军带着数万名伪军对我濮、范、观中心区大举进犯,我军迅速跳到外线,以避敌锋芒。国民党降将孙良诚乘机率两万多人控制了我中心区西南侧濮阳与濮县的广大地区,设置大小据点500余处,孙良诚率总部进驻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对我根据地进行步步“蚕食”,切断了我中心区与四、五军分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我冀鲁豫军区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首先吃掉孙良诚部,使日寇失去锋利爪牙,以改变我鲁西南地区面临的严重局面。在作战计划分析会上,马本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意见:采用“牛刀子钻心”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打掉八公桥的敌总指挥部,回头再清扫外围据点。军区领导经过缜密权衡后批准了这一方案。战斗于11月16日打响,我军区主力部队突然出现,敌人无法展开火力,很快被击溃,孙良诚的总部直属队全部被歼。这一战,毙伤敌军数百名,俘获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特务团长以下官兵16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7挺、步枪1600余支、子弹4万余发、电台两部、战马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全部兵工厂机器,唯孙良诚因在开封开会漏网。马本斋在此战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给军区全体指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的黄敬称赞他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正当马本斋的军事才能逐步展露之时，他的后颈部长了一个对口疮并迅速恶化，体温急速升高，疮痍波及脑髓。当时部队医疗条件极差，病情难以控制。随军医生手术无效，又并发肺炎。在军区后方医院驻地一个农家四合院里，马本斋坐在床上仍坚持写战斗札记。儿子哭了，他吃力唱起了《抗日将士出征歌》。坚强的斗志，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医护人员。

就在这时，回民支队接到了开赴延安的命令。在军区领导的再三劝说下，马本斋同意留下来治病，由杨得志率队赴延安。马本斋在半昏迷状态中还一再叮嘱向他辞行的杨得志和回民支队干部：“你们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定要转达我的问候”。弥留之际，马本斋断断续续地对守在身边的人说：“我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叫孩子继承我的遗志做革命工作……告诉三弟领导伊斯兰民族……革命到底。”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濮阳小屯村军区后方医院，时年43岁。

消息传出，冀鲁豫边区军民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之中。军区政委苏振华、区党委副书记张霖之、行署副主任贾心斋率直属机关干部在张青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马本斋的遗体致祭、告别。遵照马本斋遗嘱，其遗体安葬于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莘县张鲁集。2月9日，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张鲁集举行，冀鲁豫区党政军领导黄敬、宋任穷、朱光、王任重亲临吊祭。11日举行公祭，上百名干部群众按照回民的最高葬礼将马本斋的遗体高高地举过头顶，送往墓地。3月15日，鲁西北地区各界群众在张鲁集联合举行追悼马本斋大会，并决定筹办本斋小学、本斋合作社、本斋游击大队，修建本斋烈士祠堂，以永久纪念这位为鲁西北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

马本斋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

会。毛泽东的挽词是：

马本斋同志不死！

朱德的挽联是：

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周恩来的挽联是：

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1954年，马本斋遗骨迁往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为了永远怀念马本斋，莘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在烈士墓遗址处辟建马本斋烈士陵园，马本斋之子马国超亲笔题写了园名。同年，张鲁中学易名为“本斋中学”，以表示对马本斋烈士的怀念和继承烈士遗志的决心。



张鲁马本斋烈士陵园纪念碑

重悬古钟碑记

古城乃春秋古邑，范县旧治。城东北隅原有来钟寺，不审建于何代。寺内铁钟铸于金承安四年，有铭文可凭。钟高近三米，圆周五米有五，唇径一米又七。钟体铭文花饰设计精美，经八百年风雨侵蚀仍条缕可见。其形制之巨，工艺之精，历史之久，保存之完整，在聊城市辖区内堪称无双。文物乃先民之遗赠，文化之瑰宝，历史之见证，社会之财富。保护文物乃万世之功，盛世为政者均极看重。古城镇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多方筹资，精心设计，筑台建亭，重悬古钟，使传世文物喜获护佑，后世子孙得以永瞻，实乃利国利民之善举，千秋万代之功德。亭峻之日，遵嘱述之，以为永记。时公元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联曰：亭披霞光，高处可察社情民意；

泽被八方，洪声再震泰山黄河。

横披：钟鸣盛世

（杨巨源 撰）

两把菜刀夺炮楼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2 年，南乐县东节村（今属莘县张寨乡）民兵靠两把菜刀端掉了日本鬼子的炮楼。后来虽遭到日寇的疯狂报复，却受到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的通令嘉奖。东节村民兵用实际行动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民兵勇夺炮楼

1942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激烈也是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战线拉长，渐感兵力不足。为了躲避抗日军民的袭击，他们实行了“炮楼战术”。他们在一些重点村庄建造炮楼，既便于居高瞭望，观察抗日军民的行动，又可彼此呼应，切断我抗日力量的联系。如遇抗日力量攻击，他们还能龟缩进炮楼，顽抗待援。当时的朝城一带，可谓炮楼林立，使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东节村位于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东距朝城 25 华里。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东节村成了朝城县与河南南乐县抗日武装力量联系的纽带。日军也很重视这个边界村庄。他们发现两县的抗日武装常在东节村聚集，便决心要在这里安个“钉子”。1942 年夏初，两座坚固的炮楼在东节村东头出现了。南边的炮楼由日本兵驻守，北边的炮楼由伪军驻守。登上炮楼，西边的村子和东边的旷野

可一览无余,抗日武装力量一有行动,便立即被发现。南乐方面的抗日武装无法东来,朝城方面的抗日武装无法西去,一时均处于孤立作战的状态。炮楼上的日伪军又不时出动骚扰,使这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抗日武装恨透了这两座炮楼,要端掉它又苦无良策,只能采取游击战术,瞅机会对炮楼进行冷枪冷弹的袭击。

东节村炮楼位于我朝城、南乐两个游击区的结合部,西距千口镇的日军据点20余华里,实际上是个突出孤立之敌,加上游击队的不断袭扰,炮楼上的敌人也感到惶惶不安。为安全起见,是年6月(农历五月)敌人开始加高炮楼。东节村党支部书记姚洪显、村长吴玉奇和民兵队长姚步宾一商量,认为这是端掉炮楼的天赐良机。他们认为,炮楼上的敌人对外面活动的游击队防范很严,游击队来打炮楼目标太大,也易造成伤亡;如果借敌人加高炮楼之机让民兵化装混进去,从内部下手,定能事半功倍。东节村党支部立即向南乐县大队汇报,县长刘镜西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也认为攻其不备、里应外合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是个好办法。县委当即决定:由县大队埋伏在村西,防备千口镇敌人增援;另派几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去东节村配合行动,力争一举拔掉这个妨碍游击队活动的“钉子”。

当时,东节村的郭连增被敌人拉进炮楼当伙夫,这是个绝好的内线。民兵刘六民按照县委指示与郭连增取得了联系,把行动时间约定在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九)。这天一早,民兵姚步宾、刘六民、姚庆保、张勤增、吴玉奇化装成民工到炮楼院子里干活。进去后,趁监工的鬼子不注意,刘六民和张勤增溜进伙房,从郭连增手里拿到了两把早已磨得锋利的菜刀,然后快步闪进炮楼,砍死了楼底下的鬼子哨兵。接着二人登上楼梯,顶开盖板,蹑上二楼,又砍死了一个正在睡大觉的鬼子。两个人一鼓作气登上顶层。在顶

层瞭望的鬼子见状吓愣了，正在顶层干活的吴玉奇趁机将鬼子一把抱住，从楼顶掀了下去。在下面干活的民兵见楼上动了手，便以铁锹、砖头为武器和鬼子兵拼打起来。鬼子兵想跑进炮楼拿武器，炮楼门却早被郭连增关得死死的。鬼子小队长见势不妙，慌忙带着剩下的几个鬼子兵拼命夺路向北面的伪军炮楼跑去。伪军炮楼的一小队伪军外出未回，只有几个伪军看门。他们哪里敢出来接应，只朝天放了几枪，算作对主子的一点表示。

这次战斗，共杀死日本兵 7 人，缴获长短枪 9 支、机枪 1 挺、指挥刀 1 把、子弹一部。民兵们撤退时，将炮楼付之一炬。

敌人疯狂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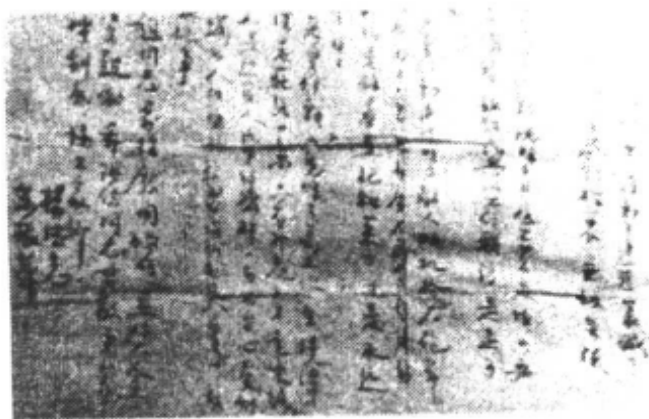
日军炮楼被烧，为防敌人报复，东节村群众在民兵组织下纷纷离开村子，四处躲避。当天下午，两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从千口方向开来，直扑东节村。见村中杳无人影，日军宪兵队长尚江、小队长新井和汉奸翻译官张凤舞指挥日伪军四处放火，烧毁民房 200 余间。接着，又到村外四处追杀群众，邻近东节村的丘寺、肖屯、杨寨等村庄一时陷于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日伪军抓了 40 多名群众，押至东节村北炮楼，逼问是谁烧的炮楼？谁是抗属？逼问无效，日军小队长和汉奸张凤舞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该杀。群众不抽签，他们就放狼狗咬，用棍子打。结果有 6 人抽到了该杀的签，其中有年轻妇女，也有年逾花甲的老人。最后，这 6 个人连同 2 个孩子被敌人用刺刀捅伤后活埋。

敌人仍觉不解恨，又逼着群众在炮楼院内挖了一个能容百余人的大坑，上面用门板、树枝掩盖，然后四处抓所谓嫌疑分子，抓到后就推入坑中。人越抓越多，坑中男女混杂，人挨人挤在一起。敌

人用大坑折磨群众的暴行整整延续了一个月,其间有的人被渴死,有的人试图逃跑被敌人用刺刀捅死,有十几名青年妇女惨遭蹂躏后又被逼与伪军成亲,有的人身上长满了疮,烂得惨不忍睹。后来,敌人折磨够了,放出了 100 多人,剩下 40 多个奄奄一息者仍关在大土坑内,强迫家属用粮赎买,两布袋粮食换一个人。最后剩下 6 个无人赎买的,被鬼子拉到村北活埋。

敌人的这次报复活动,共烧毁房子 300 多间,有 70 余人死难。东节村群众被迫外逃者 150 余人,1400 余亩土地荒芜。到 1944 年春天,外逃者才陆续返回家园。但这个原有近 400 人的村子,只剩下 250 多人了。

军区通令嘉奖



杨得志、苏振华给东节村民兵的嘉奖信

东节村发生的事很快被反映到冀鲁豫军区,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军区领导认为,东节村杀死 7 名日本兵、烧掉一座炮楼而招致敌人疯狂报复,村民 70 余人死难,300 余间房屋被烧,100 多人出逃,看

起来是得小失大,实际上影响颇为深远。第一,东节村民兵的做法说明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已忍无可忍,反抗侵略已成为人民的自觉行动。第二,群众在侵略者以死相逼的高压之下仍不供出烧炮楼的人,说明人民在抗击日寇侵略上是齐心的,是坚决

的，这就是抗日必胜的希望所在。第三，几个赤手空拳的民兵靠临时拿到的两把菜刀就可杀死日本兵，端掉日本兵的炮楼，这说明日本兵并不可怕。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再被打破，东节村民兵再一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第四，日寇的疯狂报复不说明他们强大，只能证明他们心虚恐慌，色厉内荏。日本兵的炮楼被烧掉后没敢再建起来，汉奸兵的炮楼也很快被丢弃，千口镇据点日军东伸的爪子被迫缩了回去，我朝城、南乐两个游击区终于连成一片。出现这个结果，可以说东节村的民兵功不可没。

基于以上分析，军区领导认为，对东节村民兵的壮举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公开嘉奖，同时通报全军区，号召各地军民都来学习这种精神，树立必胜信心，积极行动起来，让日本侵略者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联名给东节村民兵写了嘉奖慰问信。信件全文如下：

刘六民同志并转东节村杀敌的诸战友：

你们英勇杀敌的壮举，轰动了边区，震撼了华北，对此我们万分感动于衷，并致无限的敬意。以你们的英勇行动，说明了日寇并不可怕，只要大家亲密团结，组织民兵实行联防，是足可以抵御敌人(的)。

以你们的英勇行动，更说明敌人的机枪大炮并非不可克服的力量；只有广大武装起来的抗日人民，哪怕是拿着粪耙和菜刀，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以你们的行动又说明了苟且偷生、侥幸图存的心理是死路一条，只有打鬼子才是生路。因此，你们是边区人民的榜样。不甘心受敌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必将学习你们的英勇，一致奋起与敌抗争。

此派孙超同志前往慰问你们，并奖金五千元，以资鼓

励。希诸位同志贯彻东节村杀敌精神到底,保卫家乡。

敬礼

杨得志

苏振华

军区领导的嘉奖和慰问,极大地鼓舞了莘、朝、观、南一带的抗日军民,也在整个冀鲁豫军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军区的报纸报道了此事,南乐县委组织开展了向东节村民兵学习的活动。此后,莘县、朝城、观城一带不断出现袭击日伪炮楼乃至据点的军事行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冀鲁豫交界处的抗日武装出现了一个向日伪进击的小高潮,这为后来反扫荡的胜利和濮、范、观“边区小延安”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重修莘县文庙纪铭

文庙系奉祀孔子之所在。莘县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成化、弘治、崇禎及清乾隆年间曾数次重修,规模日宏。其后战乱频仍,文庙屡遭损毁。一九四六年,文庙辟为烈士祠,大成殿改作为革命烈士灵堂。历经六百余年沧桑之后,文庙之配套建筑不复存在,大成殿亦岌岌可危。为保护县城内仅存之古建筑,县政府广纳众议,将重修文庙列入二零零二年十大民心工程,决定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使古老文庙再现昔日风采。在县政府主持、有关部门支持和社会各界鼎力资助下,经山东省文物工程公司精心施工,落架重修大成殿、重塑圣像、完善配套建筑工作顺利完工。历史文化遗产乃公有之社会财富,文庙系莘县第二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理应广受呵护,世代传承。重修工程告竣之日,特为文述之,以为永记。

(杨巨源 撰)

朝南痛击文大可

1943年7月，我冀鲁豫军区二、三、四分区各一部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在朝城县南部对汉奸文大可的暂编第三十一师伪军发动了一次闪电式的全面进攻，斩断了敌人伸向我濮范观中心区的触角，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朝南战役”。

战役背景

当时盘踞朝城的是汉奸文大可的伪暂编第三十一师。文大可原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部之教导师副师长，师长是石友三的胞弟石友信。石友三于1938年12月率部到达冀南，成为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冀南、冀鲁豫地区同我抗日武装搞磨擦、破坏抗战的主要军事力量。我华北讨逆野战军在司令员宋任穷、政委肖华、程子华指挥下，于1940年先后发动了四次讨伐石友三战役，均获全胜，致使石友三部发生内讧，其部属高树勋、孙良诚在濮县将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处死，高树勋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石友三兄弟被处死后，文大可即率部投降日寇，从此盘踞在朝城一带。为了讨好日寇，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积极执行日寇的“蚕食”政策，不断将控制区域向我濮范观中心区方向扩展。文大可的伪暂编第三十一师下辖两个旅，共约3000人，大部部署在

朝城以南。第六十一旅部署在朝城东南的谢集一带，第六十二旅驻守朝城西南的兹营，两股主力像螃蟹的两只前螯一样同时伸往濮范观中心区方向。为了牢牢占据这块地盘，防备我抗日武装进攻，文大可从其日本主子那里学了一手碉堡战术，在其控制区内先后设据点 21 个，修碉堡 64 个，分兵设防。1942 年 9 月，文大可又乘日寇大扫荡之机，将其魔爪继续南伸，在距我中心区更近的的张大庙、柿子园等村安上据点，修了炮楼。在这种情况下，文大可部已明显地成了对我中心区威胁最大的一股敌人，必须给予痛击，让其把伸向我中心区的爪子缩回去。

在军区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指挥员们在讲明打击文大可的必要性之后，又进一步分析了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可能性：第一，文大可部虽然人多枪多，但内部派系矛盾严重，官兵之间不团结，士兵普遍有怕八路军、怕死的心理，战斗力不强，易于击溃；第二，敌人设了许多据点，又有碉堡围护，自以为固若金汤，其实是分散了兵力，而且一个据点最多只有一个营驻守，工事也不很坚固；第三，我战斗部队中有许多当地人，地形熟悉，也便于利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第四，此时正是青纱帐浓密的季节，利于我军迂回运动，隐蔽接敌。

这次会议定下来的战役部署是：由二分区八团及观城、范县、濮县、寿张等县的基干大队、军区第三支队等部组成右翼兵团，由三分区三十二团、四分区十六团一营组成左翼兵团，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统一指挥。战术要求是：分割包围，先打要害，力求歼敌主力一部以瓦解其军心，而后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更多的伪军投降。

对我军的进攻意图，敌人也有所察觉。战役实施前夕，谢集据点的敌人曾得到一份情报，说“张大脚”带领的三支队近日在李台、金斗营（今属阳谷县，当时是寿张县辖区）一带杀猪聚餐，有向朝城进犯的兆头。敌人的这一情报倒也准确。“张大脚”，本名张心泽，

字润普，朝城舍利寺（今属莘县）人。因脚板长得特别大，故人称“张大脚”，其本名倒渐被人淡忘了。他出身贫寒，两个弟弟皆被地方豪绅勾结国民党官府杀害，因此对官绅怀有深仇大恨。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南逃，留下一片权力真空，“张大脚”趁机拉“杆子”聚众，占了范县县城，做了一些拉牛绑票、杀富济贫的事。1938年1月，聊城抗日专员范筑先将这支队伍收编为抗日二十二支队，张心泽当了一团团长。范筑先殉国后，张心泽将部队并入尚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齐子修部，并发誓：“拼死也不当汉奸！”齐子修投靠日军后，张心泽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在我团结抗战政策感召下，他于1941年8月28日率300余人在朝城郭王庄起义，其队伍被改编为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他本人被委任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朝南战役前夕，张心泽正率部在李台、金斗营一带休整待命。接到军区的战斗命令后，战士们磨拳擦掌，求战情绪很高。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平时不管饭菜好坏，以吃饱肚子为目的；只有到大战之前，才杀猪吃肉改善生活。敌人从这一情报中知道了我军将有大的行动，但主力在哪里，将从哪里发起进攻，他们却一直蒙在鼓里。

战 役 过 程

7月5日黄昏后，我参战部队以夜色和青纱帐为掩护，从敌六十一旅和六十二旅结合部穿插进去，成功地实施了分割包围，使两股敌人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接近半夜时，右翼兵团在二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下对驻守谢集的敌六十一旅旅部突然发起进攻。敌人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双方激烈交火。我军欲对据点实施强攻突破，但由于突破口选择不当，强攻未能奏效。曾思玉随即

调整部署,留一部兵力监视谢集之敌,主要兵力转而向仁义村周围的碉堡发起攻击,一天一夜之中将环围在村周的碉堡全部摧毁。扫清外围之后,于7月7日上午开始对仁义村据点发起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九二步兵炮发挥了威力。此炮是1941年我军在潘溪渡(今属郓城)战斗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这种炮既可仰射支援步兵作战,又可平射摧毁据点碉堡。缴获此炮后,军区组织军工人员反复试验,造出了炮弹,使拥有这门大炮的二分区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当时冀鲁豫军区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曾司令,两件宝,分区七团加大炮”。是说曾思玉靠着七团的英勇顽强作风和九二步兵炮的威力,攻城破寨,所向披靡,使日伪军闻风丧胆。在攻击仁义村据点时,曾思玉又将此炮派上了用场。只听“咣”、“咣”几炮,仁义村据点围墙被轰开一个大豁口,我指战员随之发起突击,守敌失魂落魄,一个营被全部歼灭。接着,曾思玉让战士带着被俘的伪营长到其他据点炮楼喊话,守据点的伪军见长官成了阶下囚,一个个举枪投降。驻守谢集的伪六十一旅旅部见势不妙,于当日下午突围逃回朝城。其余据点的守敌见旅部已溜之大吉,也纷纷放弃据点逃跑。我部队乘胜拦截阻击,将其大部歼灭。

在右翼兵团连克据点的同时,左翼兵团的进攻也十分顺利。战士们靠机步枪、手榴弹和强大的声势震慑守敌,一举攻进兹营,摧毁伪六十二旅旅部,俘获旅参谋长郑文一等官兵。我左右翼兵团互相配合,两面开花,打得敌人风声鹤唳,全线崩溃。

正当朝南战役激烈进行时,寿张的日伪军突然出动200多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和我主力部队出战朝南之机,企图偷袭我设在金斗营的的绷带所。我昆张支队三中队(原七团二连)及时赶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敌人出乎意料地遇上我主力部队,加之我战士勇猛无敌,这些偷袭者一下子乱了营。我三中队指战员愈战愈勇,终于以少胜多,将敌击退。敌人偷鸡不成蚀把米,伤亡数

十人,只得拖着尸体,抬着伤兵,狼狈窜回寿张城。

朝南战役历时 7 天,我军共攻克敌据点碉堡 77 处,毙伤敌 200 余人,俘获敌官兵 520 余人,缴获长短枪 400 余支、轻重机枪 8 挺、掷弹筒 6 个、子弹万余发。此后不久,又攻克了敌人自以为十分牢固的郎集据点,歼灭朝城伪警备队一个中队,毙伤俘敌百余人。从此之后,朝城以南成了我抗日武装的天下,文大可的伪军整天龟缩在朝城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出头了。

朝南战役后,文大可部一蹶不振。不久,文大可被调往济南,驻聊的日军委任刘金陵为朝城县长兼剿共司令,并派治安军一个团帮助刘金陵守城。1943 年秋,我二十二团在妹冢西常庄与出城扫荡的朝城治安军一个营发生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刘金陵见朝城四面受敌,料无好下场,便于 1944 年 2 月 28 日率残部逃往阳谷,朝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莘朝根据地与濮范观中心区连成一片,抗战形势越来越好。

齐魏马陵战址碑文

战国中期,诸国争雄。公元前三四二年,魏惠王派庞涓率大兵十万攻韩,韩国危急,求救于齐国。次年,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臏为军师,率兵十万直捣魏都大梁(今开封),以围魏救韩。庞涓回师迎敌。孙臏用述日减灶之计诱庞涓轻骑追击。孙臏设伏兵于马陵峡谷,并在一棵大树上书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当庞涓夜追至此,照见树上书文,大惊。顿时峡谷两旁万箭齐发,魏军大乱,纷纷死伤。庞涓无奈自杀,随军征战的魏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日衰,齐国日盛。孙臏名威天下,盛传至今。

(刘文学 撰)

曾广福创办互助组

1943年,鲁西一带大旱,曾广福响应抗日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办起了鲁西第一个互助组。互助组增强了农民的抗灾能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曾广福也在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先后成为县、省和全国劳动模范。

组织起来度难关

曾广福是南峰县董杜庄村(后属朝城县,今属莘县)人,生于1914年,因家庭贫困,17岁便开始给人家扛长活,打短工。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到这里,建立了抗日政权,曾广福也回家参加了农会,并当上了农会会长。董杜庄一带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我党较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较少受到敌人袭扰,农会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斗争。

1943年,鲁西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一春无雨,小麦颗粒不收;秋季仍是大旱,收成寥寥无几。穷人无法度日,纷纷外出逃荒。



曾广福(1982年)

为帮助农民度过难关，抗日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团结自救，战胜灾荒”。区干部知道曾广福人品端正，吃苦耐劳，又最听上级话，便找他谈话，让他带头。曾广福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他找到二弟曾广明和生活困难又缺劳力的韩连成、韩连臣，对他们说：“上级叫咱团结自救度灾荒，我看这是个好办法。逃荒逃荒，越逃越荒。如果咱四家合在一起种地，人多了，牲口也多了，困难就少了。把地种好，多打粮食，比到外边要饭吃强百倍。”四人一说即合，当下决定合起来干活，名字就叫“互助组”。

这4户共有13口人，14亩地，大小牛各1头。种麦季节到了，他们把一大一小两头牛合成一犋，再拴上两根绳，配上两个人拉边套，只用了6天，就把12亩地犁耙好种上了小麦。村里其他贫困户见这法子挺好，也三户合伙、四户搭帮地种起小麦来。这样，贫困户虽然缺犁少耙，牲口不多，但一经联合，许多困难就大化小，小化了，结果种麦子都没落在富户后边。种麦期间，曾广福除在本组干活外，一有空就去帮最穷、最缺人手的户搭帮手。在种麦的那些天里，他早起晚睡，走东串西，直到所有贫困户都种完，他才算歇了歇脚。

种完麦子，贫困户的吃饭仍是问题，不少人纷纷外出谋生路，一个个互助组自然解散。曾广福为此苦思苦想了几天，有一天他忽然把本组的户主召集在一起，说出了个办法：“农活没了，我看咱就干木工活。我当过木匠，咱四家凑钱买几件工具，弄点木料，开个木工铺，我掌尺，你们跟着学，赚了钱咱四家平分，赔了都算我的！”其他三人也觉得兵荒马乱的外出逃荒不容易，倒不如在家挣点钱省心。加之曾广福忠厚实在，大家都信得过，便一致表示同意，只是更改了一条：赚了钱四家分，赔了钱四家摊。为了免生争议，曾广福又立了三条规矩：一是四户各出一名壮劳力，按出工天数记工；二是赚了钱按工分配；三是刨花及不成材的杂木四户均

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有点难。四个人都目不识丁,这工怎么记?曾广福有办法,他在墙上清理出一块地方,分成四块,每人占一块,干一天划一个长杠,干半天划一个短杠,算账时俩短杠算一个长杠,按杠多少分利。好在四个人都老实可靠,谁也不会捣鬼,木工铺就这样开张了。开始时做一些民用的门窗、家具,后来给鲁西北军分区的一个地下兵工厂做手榴弹箱。这活既能挣钱又能为抗日出力,大家干得很认真,每次接到任务都是立即赶做,用最好的木料,精心加工,保证按时送到指定地点。民用产品要拉到集上去卖,曾广福怕耽误干活,想了个新招,将做好的家具按低于市场价的水平估个价,另找人去卖,卖不出去的原件拉回,卖出去的只交估价,多卖的钱归己。这样,做和卖分工,既不影响干活,又帮助好几个贫困户解决了生活困难。

这样干了一冬天,到年底一算账,净赚 3400 元(解放区流通的边币)。由于所做的手榴弹箱质量好,交货及时,军分区又奖励了 600 元。他们把这些钱留下 1500 元作周转金,其余的按工分配。四户人家谁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大人孩子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曾广福是技工,又是师傅,出力最大,本该多分,可他总是想办法让自己少分。分到手之后,看村里哪些人家最困难,这家三十,那家二十,又散发出去不少。刨花和下脚木料也是分成四堆,一家一堆,这下又解决了烧柴问题。曾广福应得的碎木很少往家运,大都送给了村里缺柴烧的贫困人家。

木工铺挣了钱,这四家连带着其他一些贫困户都顺利地度过了灾荒。家里用不了的钱,他们又买成豆饼、大粪干上到麦地里。第二年,互助组的麦子平均亩产 80 斤,比一般户高出 30 斤。麦秸都给了有牛的户。县里和区里都表扬了他们,边区的报上还报道了他们办互助组的经验。

没有灾荒也互助

灾荒度过了，还要不要继续互助？曾广福与其他三家一合计，态度很一致：合起伙来能取长补短，互相帮衬，能多打粮，多挣钱。有灾荒要互助，没有灾荒也要互助，互助组要一直办下去。这年麦后，曾广林和曾广兴要求加入曾广福的互助组。曾广福很欢迎，其他三户却有些犹豫，因为这两户一无牲口二无大农具，怕把互助组拖垮。曾广福对他们说：“都是穷爷们儿，咱互助办好了，得拉他们一把。看着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咱也不忍心。困难搁在一家一户身上能压垮，大家都来承担就能抗过去。不然，对不起关心咱的党和政府。”就这样，曾广福的互助组发展到了6户，共有27口人，30亩地，牛却还是原来的那一老一小。

互助组扩大了，还得立新规矩。曾广福经过与各户商议，又定了四条：一是全组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干木工，常年搞合作互助；二是全组统一安排农活，互相帮忙，按天记工，一个工一斤粮，夏麦秋豆，均在收打后算清；三是干木工还是每户出一名男劳力，按出工天数分利，下脚料6户平分；四是牛归户主养，干活时各户按地亩数对草料，临时没有的可欠着。有牛的户可以用牛顶工，大牛干一天顶一个半工，小牛一天一个工。规矩定下了，大家都照着办，没出过任何争执。这年秋后一算，互助组的秋粮平均亩产90斤，比一般户高出30斤。年底木工铺结算，每户又分得纯利180多元，还有一大堆碎木刨花。

1945年麦后，村里最穷的韩富贵要求加入互助组，曾广福又答应了。这样，互助组就有了7户，32口人。组里又添了一头牛，一盘耙，一张犁，条件越来越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木工铺

干活可以划杠记工，干农活一年有三季在地里，人多时间长，村东村西来回跑，划杠的办法不适用了。曾广福人实在脑子倒不笨，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缝7个小布袋，一户一个，做上记号。再准备一些麦秸杆，每干一晌活就往布袋里放一截麦秸杆，按晌掐，天天装，月月结，麦收和秋收后按麦秸杆的数量结账，按每两根麦秸杆3斤粮食，各户找齐。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一致公推曾广福掌管这7个小布袋。于是，曾广福成了互助组里不识字的义务记工员。他常年把7个小布袋挂在腰间，时间久了，布袋越装越鼓，曾广福的腰也越来越粗。有人开玩笑：“你腰里别着7个手榴弹，想学八路去打日本呀！”曾广福哈哈一笑说：“别看布袋不大，7家的钱和粮食都在里面装着哩！”

1945年年底一算账，互助组两季粮食平均亩产180斤，比一般户高出60斤，木工铺盈利每户分得150元，这7户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其他户看到互助组能多收入，再加上曾广福的宣传发动，董杜庄又成立了3个互助组。4个互助组在曾广福的带领下开展生产竞赛，看哪个组干活细，庄稼好，产量高。你上一车粪我上两车，你锄两遍我锄三遍，暗暗较劲，谁也不肯落后。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董杜庄从邻村分得300亩地。就在这一年，32岁的曾广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村里又成立了两个互助组。全村6个互助组，互帮互学，互相赶超。管理方法都差不多：一是劳动力按晌记工；二是互相帮工，一个劳力干一天按2斤粮食计算，麦秋两季分别找齐；三是所种作物尽量统一，便于统一管理。这一年，各组粮食都喜获丰收，仍然数曾广福这个组平均亩产量最高。

生产要有带头人

1946年又遭遇严重春旱。那时种地，完全是靠天等雨。雨季不到，河里常年没水。村里有几眼吃水砖井，地里根本没井，农民也没有浇地的习惯，只有种菜园的在村边上打眼井，也是吃水浇园两用；遇上天旱水少，则只供饮水不浇园。在大旱的情况下，县、区政府号召农民浇水保苗。但水从哪里来？董杜庄全村共有4眼吃水砖井，井不深，出水量也不大，当年曾广福给村里的富户扛活时曾在一个早晨挑干过3眼，靠这几眼井浇地门儿也没有。上级介绍了外地打土井抗旱的经验，要求各村学习。但当地有一种迷信说法：地里不能打井，打井戳了龙王眼，要遭报应的。一时各村各户都在犹豫观望，眼看着麦苗一天天发黄。

曾广福是个不信邪的人，他想：村里的井能打出水，地里挖井也一定可以出水。与其看着麦苗旱死，不如拼一下搞个打井试验。别人的地不能打，他在自家地里选址开挖。村里人一见曾广福真要干，一时说啥的都有。有的说广福吃了豹子胆，不怕惹麻烦；有的说自古都是靠天吃饭，打井还不如在家看蚂蚁上树哩；有的说饿不死人家也饿不死咱，冒这个尖干啥？曾广福的说法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就不信挖个土井子比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还难！龙王不下雨，我戳他的眼让他淌泪！”不管别人怎么说，曾广福认准一条路决不回头。他在自家地当中先挖了一个七八尺深的长方形土坑，然后从坑的一头向下挖圆井，将圆井的土存在长坑的另一头，满了再一锹一锹地往外倒。挖到一丈多深的时候，井里出水了，曾广福也成了泥人。他高兴地跑回家把二弟广明叫来帮忙。兄弟两个用粗布做了个泥兜，井口上横放一块木板，广福在

井下挖，广明站在木板上提泥。井里的水越来越多，流沙也涌了出来，曾广福两条腿陷在流沙里，每动一下都得费很大力气。无奈，只得爬上来吸袋烟想办法。一袋烟没吸完办法却有了。兄弟俩回到家，拿出一个没底的破囤圈，又找来些条子接茬往上编。第二天一早，他们把囤圈下到井里，外面用草苫子围住，流沙被挡在了外面，从囤圈里面往外掏泥，进度一下子加快了许多。又挖了几尺深，终于穿过流沙层，见到了胶泥底，并先后出现了几个小泉眼，土井挖成功了。

有了土井，曾广福立即安上轱辘，提水浇地，一天能浇半亩多。水浇过的麦苗很快返青，没浇过的大都干黄一片，差不多一个火星就能点着。群众一见土井浇地这么好，纷纷动手效仿。互助组打井，人多力量大，加上又有了曾广福的经验，进展很快。曾广福每天从这个井跑到那个井，不但指导，还亲自下井帮着挖。大家越挖越有劲，仅曾广福互助组一个春天就挖了 14 眼土井。有了土井，抗旱就有了办法，收成自然会大大提高。当时农业产量很低，农民有句俗话说：“麦收五十秋盼七，好年景难过一百一。”意思是说小麦亩产 50 斤，秋粮亩产 70 斤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就算遇上好年景，两季加起来亩产也超不过 110 斤。但这一年曾广福互助组麦秋两季的粮食平均亩产却达到了 208 斤，几乎比



曾广福墓碑(2002 年立)

过去的好年景高出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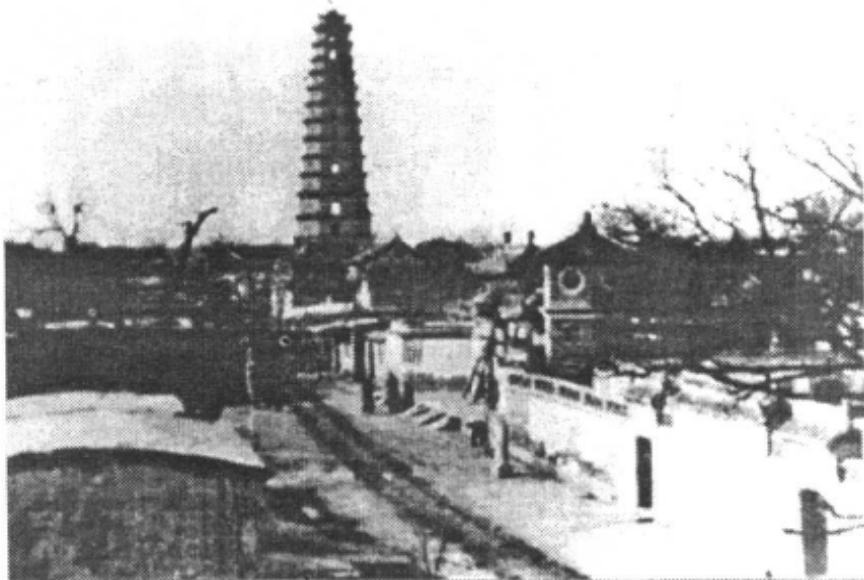
曾广福互助组打井抗旱夺丰收的事很快传遍了冀鲁豫交界处的县、乡、村，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949年，曾广福继当上县劳动模范后又被选为平原省劳动模范，省委奖给他一块写有“社会榜样”四个大字的木匾。10月，曾广福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观礼台。1950年，董杜庄的互助组发展到14个，共87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0%以上。这年秋天，曾广福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51年，曾广福互助组粮食亩产达到227斤，被评为全县模范互助组。是年冬，曾广福的互助组转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重立王旦墓碑碑文

王公讳旦，字子明，宋大名莘人。生于后周显德二年，二十四岁中进士，四十五岁任参知政事，五十岁践相位，六十一岁自请免职，同年九月卒，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公。殁后五年，仁宗诏配享真宗庙庭，御书全德元老之碑，欧阳修奉旨撰碑文，苏轼撰三槐堂铭。公佐真宗在朝二十七年，柄用十七年，真宗倚重，言听计从。公忠君爱国，忠奸分明，谨言慎行，知人善任，一生廉洁，勤俭自持，维系朝纲，多所建树，当代赞颂，后世称贤。公父诒佑，曾手植三槐于庭，王氏后裔遂以“三槐”称代。公弟旭，子素，任质，孙玘、靖，曾孙古、震，玄孙伦暨伦之孙楠，皆列朝堂，名入青史。公之村因名群贤堡。村北原有王公之墓及三槐祠堂。后祠堂移到城内，于四十年前拆除。三槐王氏后裔，今散居莘、聊等地，岁月流失，王公遗风犹存。王氏后人，过从甚密，年节之际，相约祭祖，岁岁不辍。值此王公新碑落成之日，特撰此文以记之。

（杨巨源 撰）

里应外合克莘城



加拿大传教士威廉·史密斯于1934年拍摄的莘县塔照片

1944年7月31日深夜至8月1日上午，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指挥二十二团，在基干团、马颊河支队、莘县县大队配合下，采用里应外合战术，以伤亡10人的微小代价，仅用10个小时就攻克了号

称“固若金汤”的莘县城，从被窝里活捉了汉奸县长、鲁西北剿共总司令刘仙洲，留下了一段出奇兵制胜的传世佳话。

克复莘城 箭在弦上

莘县事变后，国民党顽固分子魏履坤被委任为莘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马金壁任副大队长。他们一不保境，二不安民，而是丧心病狂地制造白色恐怖，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气

焰十分嚣张。

1939年2月18日(农历腊月三十),攻陷朝城不久的日伪军向莘县大举进攻。1000多名日军分乘50多辆汽车和铁甲车从马桥突入莘县境内,以刘仙洲为司令的汉奸队紧随其后。我刚刚组建的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奋起阻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驻守莘县城的保安大队闻知日军逼进,一枪未发,望风南逃,将县城拱手相让。日伪占领县城后又向西出击至赵官目、李楼等村。陈赓率七七一团进入肖郭庄构筑工事,日军不知虚实,转而向东南进犯,留下日军一个大队和刘仙洲的汉奸队守县城,建立了日军司令部和伪县政府,刘仙洲任伪县长。从此,莘县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日伪统治。

刘仙洲,原名刘英伟,泰安西关人,从小就是个泼皮无赖,在泰安城里称霸一方。长大后在徂徕山聚众为匪,后被招安,在济南当了警长;不久被解职,又到宁阳、汶上一带重操土匪旧业。“七·七”事变后,刘仙洲先将土匪队伍改称抗日救国军,自任团长;后来干脆率部投敌,变成了伪军。这次当上伪县长,有日本人撑腰,他顿觉胆大气粗,决心要占稳这块地盘。靠着驻莘日军的支持,他先是建立了6个伪区部,接着又抓兵拉夫,加强扩充汉奸队伍,并不断尾随日军进剿我抗日武装。到1942年,刘仙洲的伪军总数已达1000多人。为防我抗日武装袭击,他多次加固城墙城门,在城墙上筑造炮楼。城外开挖两道深达5米的城壕,壕中蓄水,并栽上尖木桩。城壕内外置有数道铁丝网和鹿寨,城内燕塔上常驻一个班伪军,以瞭望敌情,控制制高点。下属各区均设据点,建碉堡。县城和各区之间、据点和据点之间均架设电话线,并有可行汽车的公路相通。民间则实行保甲制度,建有保甲自卫团和谍报组织。还建立了专门负责奴化教育和反共宣传的“新民会”,刘仙洲自任会长。伪军内部又建立剿共班,专司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战家属之职。仓

库里贮存了几百万斤小麦和大批军用物资。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刘仙洲自认为已把莘县建成了风雨不透的“金城汤池”，周围县的伪县长将他奉为“楷模”，驻聊日军指挥官夸奖他是“模范县长”。

但是，刘仙洲的反动统治终究阻挡不住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我抗日军民在莘县外围不断出击，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1942年，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转战鲁西北，莘、朝、观一带的抗日斗争更是如虎添翼。出城袭扰的日伪军常遭痛击，一些据点和炮楼也相继被拔掉，莘县城渐呈孤立之势。到了1944年，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开始了战略反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挽救败局，日军从华北抽调大量兵力向南增援。驻守莘县的日军由一个大队减为一个中队，又由一个中队减为一个小队，最后连这个小队也撤走了。在失去依靠的情况下，刘仙洲仍自恃人多城固，壮着胆子向驻聊日军司令官和伪道尹夸口，说他能靠自己的力量守住莘县城。

1944年7月下旬，我地下工作者不断从莘县城内传出情报，赵健民又派人侦察核实，经过慎重分析，终于下定了攻打莘县城的决心，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7月31日，各攻城部队分头出发。赵健民率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十二团从大王寨驻地出发，迂回着向莘县城接近。行进中，突然接到宋任穷、杨勇、苏振华联名发来的急电：“军区考虑你们一个军分区打莘县没把握，应停止执行原计划，待将来军区统一组织解放莘县。”赵健民司令员和政委许梦侠研究认为：军区首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作战命令已经下达，各部队都在行进途中，城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也已做好了准备，如改变计划，势必造成混乱，城内地下工作人员也有暴露的危险。攻打莘县城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攻城方案比较完备，里应外合的战术十分理想，拿下莘县城完全有把握。于是，赵健民果断命令：各部继续前进，照原计划执行！

分化敌军 内线建功

在解放莘县城的过程中，我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战斗打响之前，敌人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我掌握之中了。

早在刘仙洲部占领莘县城之初，鲁西北地委和莘县县委就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日后克复莘县城预设了伏笔。地委、县委分别建立了敌工委员会，军分区设立了敌工科，并针对莘县的日伪军设了南、北两个敌工站。1941年，刘仙洲部扩兵。敌工站趁机派精明强干的年轻共产党员范永堂打入敌人内部。范永堂出身贫苦，十几岁参加革命队伍，是个颇有心计的年轻老兵。临行前，县委书记孙良才给他交代的任务是：第一步，多拉关系，广交朋友，站稳脚跟；第二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第三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发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情者；第四步，不惜一切代价，买个官职，争取掌握一定兵权，准备日后从内线配合外线作战。

范永堂进城后，经过训练，被分在伪军一中队当了个一等兵，并巧遇同学赵缙绅和相殿生，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通过赵、相的关系，范永堂结识了新民会一个姓相的队长。后来，又设法接近刘仙洲的侄子刘西祥，和他结成了“把兄弟”。通过刘西祥的介绍，范永堂又与中队长付万长、张魁元密切接触，并当上了一中队的随从副官，从此可以在县城内外自由出入。不久，他又开始利用刘西祥“把兄弟”和一中队随从副官的特殊身份，多次出入刘仙洲家，为其送东西，办事情，博得了刘仙洲的好感。一次，刘仙洲带老婆到泰安、济南去，点名要范永堂随从，范永堂发挥聪明伶俐、办事周到的

特长，一路上将其安排照顾得妥妥贴贴。刘仙洲由此对范永堂更加信任，直至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看待。

站稳脚跟后，范永堂暗中对伪军的情况进行摸底排队，分出左、中、右，并编造花名册，逐级上报敌工部门，根据上级指示确定了培养发展、团结争取、分化瓦解和打击对象。经过耐心的工作与培养考验，又确定了发展、培养关系和外围关系，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组织串联。后来，又在团结的骨干中选择中坚，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范永堂任支部书记，赵缙绅、相殿生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范永堂还利用敌人之中的矛盾，在分区敌工科的配合下把一中队队长付万长和副队长李汝海拉了过来，赵缙绅也以班长身份影响得本班 13 个人都愿意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来作抗日部队攻城的内应。到 1944 年夏，地下党支部已基本掌握了伪一中队，在伪五、八中队、剿共班也建立了秘密联系，伪军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力量已发展到 200 余人。

1944 年 6 月，范永堂秘密出城汇报工作，向赵健民提出了尽快解放莘县城的建议。赵健民考虑到城壕中水很深，以我军现有条件，要迅速越壕登城有很大困难，决定暂不攻城。一个月后，范永堂游说刘仙洲，把被地下党掌握的伪一中队调进城内，负责西门城防。赵缙绅班进驻燕塔，因为城门的钥匙都放在刘仙洲的司令部，范永堂等人特地研究并试验成功了用枪探条捅开城门锁的方法。一切准备就绪，范永堂再次出城向赵健民汇报工作并提出解放莘县城的建议。赵健民仍不放心，遂派刘墨卿随范永堂进城侦察核实。7 月 29 日，鲁西北军分区在程营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刘墨卿汇报，分析了莘城守敌的兵力部署，最后形成了攻城决定，通过了里应外合的攻城方案。具体的兵力部署是：二十二团从西门主攻；基干团攻北门，同时派出一个连在距县城 10 公里的莘聊公路上断路据守，以阻击聊城援敌；马颊河支队攻东门，并派一个班向

阳谷方向警戒；县大队攻南门。军分区指挥所设在西关外的安庄。各部队要秘密运动到位，待西门打响再行攻击。

内线人员的三年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莘县城在经受 5 年的日伪统治后，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神兵天降 敌酋就擒

7 月 31 日夜，各攻城部队冒雨到达出击位置，赵健民把指挥所设在安庄东头一座小庙里。因道路泥泞，部队到位的时间比计划晚了半个小时。

8 月 1 日零点 30 分，西门的攻城部队以打火为号与城楼上的内线取得了联系。赵绪绅立即顺着早已准备好的绷带缒出城外，打开栅栏门，范永堂熟练地用枪探条捅开大锁，几个人一齐动手，将巨大的城门打开，攻城部队一涌而入。按照事前的战斗分工，范永堂、赵绪绅等内线人员带领尖兵连奔向伪保安司令部，直扑伪军突击队、剿共班、警察所和各科室的宿舍，伪军们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就乖乖地做了俘虏。然后，尖兵连一个排直捣刘仙洲卧室，肥头大耳的“模范县长”被脚步声惊醒，还没来得及喊勤务兵，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同时挑开了蚊帐。这个盘踞莘县 5 年的大汉奸头子只穿一条裤头就成了阶下囚，被押到城西小庙里受审去了。

刘仙洲被俘后，城内才响起了枪声和冲锋号声，但时断时续，并不激烈，可见守城之敌根本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城西攻城指挥所里，灯火通明，桌上铺着敌人的布防图，墙上挂着五万分之一的聊城以西各县地图。3 时许，接到报告，基干团已攻占北门，马颊河支队已占领东门，县大队正在二十二团配合下强攻南门。天色微明时，二十二团报告，已歼灭西街六中队和警察所之敌，西城

区完全在我控制之下,团指挥所已移至县政府,西门由第四连负责警卫。不久又接到报告,基干团已将东北部的敌人压缩到“红部”(原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文庙,我军已登上文庙屋脊,占领了制高点。全团除留一个连守北门并向聊城方向警戒外,其余队伍全部投入了攻打“红部”的战斗,马颊河支队的大部也已从东街逼近“红部”。赵健民当即决定,将分区指挥部移至燕搭下,以便就近指挥。

8时许,二十二团报告,第一、三、五连已攻占南门和魁星楼,歼灭了伪军第六中队新兵队。赵健民随即命令二十二团抽调4挺机枪去文庙支援。10时许,我军对“红部”发起攻击,仅十几分钟,据守“红部”的200余伪军就缴械投降了。

至此,城内战斗全部结束。从占领西门到占领全城,总共只用了10个小时。

下午,赵健民与刘仙洲谈话。刘仙洲惊魂未定地说:“我知道当汉奸可能没有好下场,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共产党,我开始有些看不起,但越打越厉害。去年下半年听说你赵司令原先带过的机枪营、赵三营来了,我便格外小心。至于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更是无孔不入,这是人所共知的。我这个日本人的模范汉奸县长苦心经营了5年,被你赵司令的神兵一下子玩儿完了,现在只求司令饶我一命。”赵健民说:“如果你能劝下面的伪军中队和据点投降,可以将功折罪,宽大处理。”刘仙洲见有了活路,立即按照敌工科的安排给王化、张屯、十八里铺、马厂、窦村、赵庄据点写了劝降信。黄昏后,军分区指挥所派队伍带刘仙洲去燕店,据点守敌见自己的司令官被押到,立即开门投降。8月2日清晨,又带刘仙洲去西吴家,收降了石义功、胡荣德的两个中队。王化、张屯、马厂、十八里铺、窦村的守敌见到刘仙洲的信,分别向我二十二团和县大队缴械,只有城东赵庄的敌人趁机逃向了沙镇。

8月3日,敌机飞临莘县城上空,反复轰炸。

克复莘县后，我攻城部队一边打开粮仓，将大量粮食运往根据地；一边组织军民破毁城墙，防止敌人重新盘踞。果然不出预料，驻聊日伪军经过几天组织，宣布委任李海泉为莘县县长。李海泉，泰安人，原为伪县政府的建设科长，刘仙洲的老乡兼亲信，莘城解放时逃脱。8月8日，李海泉率聊城保安队一个团和莘城解放时逃脱的伪军共1000余人，在日军的支持下，重新占据了莘县城。立足未稳，他就忙着在白马庙、高庙、杨庄、十里井、赵庄重设据点，并不断派出伪军出城抢掠扫荡，抓捕抗日人员家属，残害抗日群众，杀害与我内线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又强征民夫修复并加固城墙，使城内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周围村庄也再次遭受劫难。

当时，军分区主力部队已开赴冠县执行开辟冠北根据地的任务，莘朝和南峰两个县大队独自担负起打击莘县守敌的任务。经过周密准备，两个县大队在一夜之间打掉了县城周围的据点，并进一步压缩包围圈，对城内守敌实施严密封锁，同时发动宣传攻势。李海泉一伙困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整天提心吊胆。11月8日夜，这个在莘县维持了仅仅3个月的伪县长终于挺不住了。在聊城日军的接应下，放弃莘县城，逃向堂邑。至此，莘县城永远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莘县之役，俘获伪官兵20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军械。刘仙洲经军区批准释放，他先去济南，后到济宁经商，再也没敢与人民为敌，上个世纪50年代病死于宝鸡。

莘县解放，清除了我鲁西北中心区的一个宿敌，使聊城、阳谷



当年《鲁西北日报》关于克复莘县城的报道。

之敌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人们兴奋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山坡羊

(明)朱载堉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无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想与神仙下象棋。
玉皇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好，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到了天上还嫌低。

事件的背景

范县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带。抗日战争后期,濮(县)、范(县)、观(城县)被誉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小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范县划归冀鲁豫区二地委。1946年7月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1月10日国民党新五军攻占范县,次日即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弃城西逃,范县从此成为解放区。2月,范县县委在玉皇庙召开会议,部署土改工作。3月,举办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训练班,土改工作随之在全县展开。由于当时刚刚完成“黄河归故”,堤防工作繁重,加之配合刘邓大军渡黄河等支前工作十分紧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各级党组织领导土改工作的精力,致使派下去的土改工作队在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而导致了“吕堤事件”的发生。

吕堤是一个较大的村庄,土改时已有近千人口。吕堤原本是一个村,民国初期,村中的富户为安全起见,纷纷移居东部,构筑围墙,取名“同心寨”。1927年和1937年的两次匪乱,该寨均未被攻破。抗战八年间,寨中的富户据寨固守,我抗日军民一直未能进入。寨中有钢枪50支、土炮6门。大寨主吕维谦有地150亩,为人极为吝啬刁蛮。1927年在大街上试骡子将贫民吕宗德的三弟踏死,仅以一口袋高粱、一升白面赔偿了事。二寨主吕宗耀集地主、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于一身,抗战胜利后又拉拢民主政府干部制造分裂,并暗中向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献粮献枪。村长吕宗来虽系贫民出身,但一切皆唯吕宗耀之命是从。国民党军队进犯范县时,吕宗来出卖我民兵干部吕宗汤,带领国军将我9大车公粮拉走,还指引国军将我民兵埋藏的枪支起出。此三人皆为同心寨反动势力的

首领人物。其余如吕宗可、吕传曾、吕林武、吕传经、吕宗文、吕宗夷、吕朋化、吕宗权、吕传纪等皆为恶势力骨干。土改运动开始后，他们采用以攻为守、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千方百计把水搅混，拉拢、蒙蔽一部分工作队员，打着革命的旗号向真正的农会骨干开刀，终于酿成了震惊一时的“吕堤事件”。

事件的经过

说“吕堤事件”必须先说吕宗德的家世。

吕宗德生于1909年，成年后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是个又穷又硬的汉子。无奈家中很穷，仅有半亩坟地，一家人挤在一个看坟的小屋里。宗德的父亲在庄稼地里被暴雨激成重病而死，弟兄4个和1个妹妹靠母亲给地主家做饭、收获季节下地拾点庄稼维持生活。为了生计，宗德的母亲一度委身他人，宗德曾为此与母亲争吵。1927年，宗德的三弟被地主吕维谦的骡子踏死。为寻钱养家，18岁的宗德曾在土匪头子王占功手下当过小喽啰，后又去张宗昌混成旅的“卞团”当兵。张宗昌失败“卞团”北上临清时，吕宗德逃回家，不久即闯关东做苦力。1942年秋，宗德回到家乡。在1944年的农民减租减息斗争中，他参加了吕堤村农会，带头斗争吕维谦、吕宗耀等恶霸地主。宗德的老婆也是苦出身，长得人高马大，干农活有力气，还会宰牛。她在同心寨秘密组织妇会小组，自任小组长，配合农会开展斗争。同心寨的地主们遭受一些经济损失之后，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在村里收买拉拢一些佃户也组成了农会、民兵自卫队等组织，与吕堤农会对抗。我区干部吴安义领着吕堤农会的人到同心寨斗争地主，被同心寨农会的人用扎枪刺伤。此事长了同心寨地主的志气，灭了吕堤农会的威风，农会斗争的气势渐趋低落。在地

方势力的排挤下,吕宗德只得移居同心寨村北的丁庄,夫妻二人以开牛肉锅为生。后来生意赔本,宗德夫妇于1945年跑到黄河南鄆城县潘溪渡一个朋友那里做小买卖谋生,同心寨的地主们这才觉得安心了些。

1947年初,土改开始,心里憋着一股气的吕宗德很快回到了家乡。地主势力把持的同心寨农会不接受他,他便跑到西头加入了吕堤农会。地主们担心宗德参加吕堤农会于己不利,很快改变主意,主动请宗德回同心寨参加农会。同心寨农会的多数会员拥护吕宗德当会长,但在地主们的幕后操纵下,宗德最后只被选为组织委员,其妻被选为妇会主任。出乎地主们意料的是,吕宗德虽没当上农会主任,却以自己坚定不移的斗争态度左右着村中形势。此前同心寨曾两次清查地主浮财,都是白天查出晚上送回,地主们很满意。吕宗德来了之后搞第三次清查,清出东西很多,却再也没有回到地主手里。不久,同心寨与吕堤合为一个行政村,地主们更害怕了,他们开始在背后说吕宗德的坏话,试图以此破坏工作组对吕宗德的信任。他们抓住不放的一条就是吕宗德当过土匪。工作组听说此事,立即将吕宗德隔离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吕宗德为生活所迫跟土匪跑过几天,但无罪恶,自己表示痛改前非,工作也很积极,且立场坚定,决定不予追究。地主们的这一手不但没有对吕宗德造成伤害,反而更加激起了宗德和农会群众的斗争热情,清查地主浮财工作开展得更有力,诉地主压迫剥削之苦的活动不断扩大,逃跑在外地的地主兼特务吕宗文、吕宗耀被抓回来,地主恶霸吕宗来、吕传纪、吕宗亮被斗争。同心寨的地主们感到自己的统治宝座摇摇欲坠,吕宗德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何除掉吕宗德,这个问题使地主们大伤脑筋。直接下手杀害吧,有工作组在村,他们怕自取杀身之祸,不敢。最好的办法是借刀杀人,也就是借工作组之手除掉吕宗德,这样既能达到目的,自己

手上又不沾血。几经权衡,他们将后来补充进工作组的专署女干部赵志杰选为突破口。此人虚荣心极强,爱听奉承话,又好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是个容易被利用的角色。于是,地主们安排一些能说会道的妇女到处请赵志杰讲话,讲完之后又轮番进行肉麻的吹捧、奉承,很快便弄得赵志杰飘飘然起来。接着,他们又安排一些人给赵志杰打小报告,说吕宗德如何看不起她,如何在背后骂她,并说:“吕宗德在吕堤是一霸,俺一庄上的人都不敢吭声,现在把工作组也不放到眼里啦!”赵志杰一听勃然大怒,明确表态:“你们可以搜集他的材料,想办法治他!”

赵志杰一发话,地主们如获圣命,立即组织人马罗织吕宗德一家人的“罪状”。地主家的亲戚近门、被拉拢的贫苦农民、平时与吕宗德一家有隔阂的人都被动员起来,进行明确分工,确定了每个人编造罪状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生活作风无所不包,极尽扑风捉影、无中生有之能事。这些人还磕头盟誓,不将吕宗德全家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然后是召开农会大会诉吕宗德的苦,一些人按照事前的排演在会上慷慨发言,甚至痛哭流涕。正开会时,院子里忽然落下一块砖,有人便大叫:“了不得啦,吕宗德的弟兄们要行凶啦!”混乱中,宗德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都被捆了起来,一伙妇女大声呼吁将吕宗德全家立即处死,斩草除根。在同心寨地主导演的这场闹剧中,工作组的彭伯诚、刘鲁平、赵志杰、杜平、罗凤英等竟然对吕宗德的所谓“罪恶”深信不疑,认为吕宗德一家罪大恶极,要杀从速!第二天一早,工作组6人联名给范县县长陈华峰、县委书记宋望平写信,要求其亲往吕堤讨论处决吕宗德之事。4月14日上午,县长特派的司法科副科长端木亚庭来到吕堤。在工作组全体会上,彭伯诚将地主们捏造的吕宗德的“罪状”一字不漏地作了汇报,最后声称:“吕宗德危及各阶层利益,为各阶层所痛恨,必先为各阶层除害……否则夜长梦多,群众情绪会低落的。”彭伯诚、刘

鲁平、杜平、赵志杰主张将吕宗德全家处以死刑,理由是“不斩草除根,群众怕报复”。后来,在石奇、端木亚庭、高维、王金山的据理力争下,才决定只杀吕宗德、吕宗宝和宗德妻三人。这天下午,在同心寨西头路南广场召开五区西小区农会、妇会大会,会上又故伎重演地诉了一阵苦,然后不容吕宗德分辩,便将3人拉出去枪杀了。散会后吕宗来等又纠集20多人一齐下跪要求杀死宗德的另一个弟弟及其母亲,端木亚庭坚持不允。端木临走时,一再嘱咐工作组成员曹龙骧马上将宗德的母亲和弟弟宗高转移,以免发生意外。

持续的较量

在严酷的斗争中,鲜血是能够擦亮人们的眼睛的。吕宗德一家三口的惨死,在吕堤及周围村的群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吕堤的群众中传开了这样的议论:“谁领导斗争不得罪几个人?不分黑白地把好人杀了,以后谁还敢积极!”“嘴上喊给穷人撑腰,实际上给地主撑腰。别撑啦,再撑就把穷人都撑死啦!”“抓地主抓了半年,抓了放,放了抓,一个没杀。抓了穷人吕宗德,一天就杀啦。翻身翻成这样,以后再也别提翻身了!”处死吕宗德这天,吕堤全村没有一户人家烧火做晚饭。积极分子都像得了神经病一样,好几天吃不下饭去。周围村的人则议论:“同心寨从来没人打开过,吕宗德领着打了一炮就掉了脑袋,以后咱村也得小心着。”“吕宗德最穷,最积极,结果把命搭上了,真是好人没好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同心寨的地主们却是兴高采烈:“干得真好,二十万也买不了这一手!”

至此,工作组的几名骨干成员仍不觉悟,他们固执己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5日,彭伯诚、刘鲁平联名给县委写信,要求处死吕宗德的母亲和弟弟,县委不同意,并责成工作组将此二人

送到县里释放。彭、刘又跑到地委找吴肃，吴肃严正指出：“对基本群众杀全家，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彭、刘二人仍不死心，继续向县、区领导要求斩草除根，赵志杰又纠集一些人写状呈请，并亲自在状纸结尾添上“请政府为民除害”一行字，但最终仍未得逞。

吕宗德于4月14日被杀，4月16日县委听了端木亚庭的汇报后，便对此事提出质疑。4月18日，县委又听了吕堤村干部的详细汇报，便肯定这是一桩错案，并迅速作出了三项决定：（一）吕宗德是被陷害致死的，此事一定要严肃处理；（二）马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复查；（三）立即逮捕制造这一冤案的有关人犯，尽快弄清真相。工作组的多数干部拥护这一决定，随即在吕堤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5月2日，工作组开始对制造冤案的有关人犯进行审讯，彭伯诚、刘鲁平、王勇达、赵志杰、杜平却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动员二科、财校、休养所、银行的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为地主势力撑腰，并提出两条意见：（一）吕宗德罪大恶极，全家该杀；（二）“积极分子”被扣，应立即释放。彭伯诚公开要求释放人犯未遂，继而煽动群众“抢差”，又未得逞。王勇达公然向同心寨所谓“群众”宣称：“大家不要垂头丧气，真理战胜一切，我们继续撑腰到底！”5月3日，彭伯诚等找到县委，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县委明确答复：（一）此事须在村里解决，上面空谈无益；（二）处理问题不能违背党的政策；（三）人犯不能释放。彭伯诚等对县委决定不满，回村后继续整理吕宗德的所谓“罪状”，并于5月7日晚到地委汇报，遭地委负责人宫振民批驳。但是，由于当时正搞参军运动和护堤防汛，县、区主要干部十分忙乱，吕堤事件的处理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给地主分子和少数工作组成员继续煽动群众、混淆视听留下了可乘之机。

事件的处理

6月10日,范县县委始腾出手来组织工作组派赴吕堤。工作组骨干是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的陶东岱、杨钦、曹龙骧、徐丙行,成员还有县委社会部长石奇、司法科副科长端木亚庭、五区公安助理员黄守章等。工作组进村时,地主们的气焰仍很嚣张,基本群众情绪消沉,村干部有的被孤立,有的被拉拢蒙蔽。在幕前活动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富农村长吕传章,一个是惯于欺软怕硬、与地主一个鼻孔出气的农会会长吕传兴。此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因而被人民政府开除的单德仁、当过汉奸自卫队长的吕宗和、当过汉奸兵的吕宗全、当过交易员以狡猾闻名的吕宗岱乘机表现自己。我们的工作组真假不辩,以为出现了真正的积极分子,立即予以扶持。单德仁等人对原来的村干部吕建功、吕宗平进行攻讦打击,使形势更加复杂化。工作组对同心寨的群众不分皂白,把同心寨看成铁板一块,漆黑一团,不注意广泛发动群众,而是对同心寨人一律仇视,造成同心寨与吕堤两村的对立,复查与斗争都是少数人动,多数人看。在调查审讯中,工作组不分主谋与胁从,一律实行高压政策,弄得同心寨家家恐慌,人人自危,反动集团与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工作十分被动。

范县县委经过分析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几个实践经验不足又负着主要责任的党校干部身上,便果断地将党校干部撤回,改由石奇、黄守章、端木亚庭和分委干事陈永举负责。调整后工作组根据党的一贯政策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教育双方干部要站稳立场,明辩大是大非,要为人民立功,不要被坏人利用;(二)用调查结果证明吕宗德的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有的是移花接木的诬蔑,有的是夸大其辞的陷害,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

(三)通过大会和个别谈话消除吕堤群众的敌对情绪和同心寨群众的恐惧心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争取真正的翻身解放,并放手吸收同心寨的农民加入农会。在此基础上进行贫农登记,划分贫农小组,选举贫农代表,对地主进行再次清查,清查出的浮财价值达到200万元;(四)在澄清事实、分清主次的基础上确定涉案人名单。

7月14日,范县五区召开全区贫农代表大会,吕堤村代表在会上作了关于“吕堤事件”真相的报告。与会代表听后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处决制造“吕堤事件”的一干人犯。17日,吕维谦、吕维勤、吕维修、吕传喜、吕维让、吕宗权、吕宗亮、吕传清、吕宗来、吕传纪以及吕宗耀、吕宗亮之妻共13名罪犯(吕宗耀在逃)被押解到三里堂贫代会场,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将罪犯全部打死。

对原工作组的某些成员,地委指示放手交群众处理。县委有些犹豫不决,但与会贫农代表特别是吕堤群众再三要求处死负有主要责任的赵志杰,县委最后决定将赵志杰交给群众,这个一手酿成“吕堤事件”的女干部顷刻间被暴怒的群众乱棍打死。

同心寨其他参与陷害吕宗德的人员分别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理。原工作队其他成员被集中到地委进行检查反省,并视情节轻重、责任大小给予了相应的处分,县委也为此做出了深刻检讨,并从中总结出三条沉痛教训。历时3个多月的“吕堤事件”终于归于平息,晋冀鲁豫地区的机关报纸曾为此发过报道和评论,“吕堤事件”一时震惊全区。

“吕堤事件”的发生、发展及最后的处理方式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政策水平和法律条文去要求当时的领导机关和工作干部,但从已过去50多年的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却是完全应该的。至于汲取什么,如何汲取,则只好由后来人见仁见智了。

建国后莘县大事备忘录

1949 年

10月20日 设立平原省，省会新乡市。莘县隶属平原省聊城地区，朝城、观城二县隶属平原省濮阳地区。朝城县毕屯以北部分划归莘县。

11月 莘县师范并入安乐镇师范。

1950 年

9月 曾广福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政务院命名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0月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持续至1953年基本结束。

是年 开始抓扫除文盲工作，县成立“文化扫盲办公室”，各村成立民校。

是年 胜利折实公债发行，年息5%，5年内分期清还本息。

1951 年

2月 莘县、朝城、观城、范县初级中学相继建立并招生。

8月 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由王从吾带队到达

莘县,先后在莘县、范县作报告。

12月 平原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莘县董杜庄成立,曾广福任社长。

是年 莘、观、朝各县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时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2年

2月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至本年10月结束。

3月 曾广福代表15个互助组与山西全国劳模李顺达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4月 开始引进解放式马拉水车、七吋步犁、双轮双铧犁、马拉播种机、打气桶式喷雾器、手摇喷粉器等新式农具。

6月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供给包干制改为薪金制,并开始实行公费医疗。

8月 莘县、朝城建立汽车站,有木炭车往返附近各县。

9月 曾广福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年底回国。

是月 平原省建制撤销,原属濮阳地区的范县、观城县、朝城县、濮县划归聊城地区,与莘县一起隶属山东省。

是年 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

1953年

2月 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7月 第一次人口普查。

8月 卫河右堤决口,马颊河西被淹。

是月 朝城、观城两县合并为观朝县。

1954年

3月 掀起农业、供销、信用“三大合作”高潮。

10月 成立县兵役局,撤销区人武部。

是年 朝城气象站建立。

1955年

3月 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相当于旧币1万元。

9月 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2月 曾广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

1956年

1月 县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

2月 全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开始往黑龙江、青海移民。

3月 观朝县撤销,朝城、妹冢两区划归莘县,其余划归范县。

4月 中共莘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

8月 全县暴雨成灾,淹地42.9万亩。

10月 《莘县报》创刊,1958年12月并入《范县报》。

1957 年

1 月 组建县电影中队。

6 月 开展整风反右,至 1958 年 6 月结束。

10 月 范县县城迁至樱桃园,原县城改称“古城”。

12 月 人民银行首次发行金属分币,并发放建设公债。

1958 年

1 月 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进行反“右倾”补课。

2 月 撤销 8 个区,设 15 个乡镇。

7 月 县委公布一批“右派”名单。

7 月 18 日 刘少奇在舒同、朱永顺陪同下到寿张县视察后路过莘县,在剧院与参加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三级干部大会的全体人员见面。

9 月 全县 3 天实现人民公社化。

10 月 1 日 县广播站开始播音。

11 月 全县掀起大炼钢铁高潮。

12 月 15 日 撤销莘县建制,燕店、王奉两公社划归冠县,其余划归范县。

是年 县内建成第一个小型发电厂。

1959 年

3 月 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推行“定额管理、包工包产到队”的农业生产办法。

5 月 全县普发水肿病,总人口较上年减少 6000 人。

冬 实行打破队、社界限的大兵团作战。全县生产大队由 1127 个合并为 948 个。

1960 年

7 月 盲聋哑学校建立。

8 月 蝗灾大发生,首次使用“安二型”飞机灭蝗。

10 月 为 21 名改造好的“右派”摘帽。次年又给 27 名“右派”摘帽。

1961 年

1 月 长达 3 年的“大跃进”结束。

7 月 1 日 恢复莘县建制,全县仍辖 8 个人民公社。

夏秋 多雨。73 天降雨 816 毫米,51 万亩土地受灾。

11 月 全县 1.4 万人赴鄆城等地“就食”,次年春返回。

1962 年

6 月 压缩非农业人口 3427 人,精减国家干部职工 1489 人。

是月 蝗情严重,最集中地块每平方米 1000 头左右。

7 至 8 月 降雨 556 毫米,50 万亩农作物受灾。

12 月 8 处人民公社改为 8 个区,下设 90 个人民公社(时称小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归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1963 年

3 月 全县开展学雷锋运动。

8 月 马颊河右堤决口,400 余村庄严重受灾。

11 月 开展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4 年

春 “小四清”在全县展开。

4 月 金堤以北的观城、王庄集、樱桃园、古云、古城 5 个区由范县划归莘县,莘县共辖 13 个区。

7 月 1 日 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 521289 人。

是年 在机关“五反”和农村“四清”中,县委副书记马玉昌、王东山和县长庞振江被视为“宗派反党集团”,受到批判斗争。1981 年 5 月,此案得到纠正。

1965 年

1 月 贯彻中央关于农村社教的“二十三条”。

6 月 全县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开展阶级斗争、生产

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9月 发行民用布票。

1966年

2月 开展学习焦裕禄活动。

3月 邢台发生6.8级和7.2级两次强地震,波及莘县境内。

6月 县委、人委和县武装部部分领导人组成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7月 县、区、社全部通电话。

是月 县委、人委向文教单位和中学派工作组,不久撤出。

8月 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县、区及学校主要领导人被批斗。“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10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

11月 设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7年

2月 解放军“三支两军”领导小组主持全县工作。

3月13日 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陶云峰任主任。

4月 群众组织分化成“炮轰”和“捍卫”两大派,县革委会名存实亡。

8月 县革委被“造反派”冲垮。

9月 解放军6205部队对莘县实行“军管”。

10月 全县中、小学逐步恢复课堂教学,实行“复课闹革命”。

1968年

2月 县公、检、法军事管理小组成立。

3月 莘县塔被拆除。

是月 中、小学恢复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5月 解放军 9237 部队 700 人驻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1972 年撤回。

6月 县革委改组,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

7月 学大寨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生产大队以上单位相继建立革委会。

9月 “工宣队”进驻学校,农村学校由“贫管会”管理。

10月 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农村小学改由大队办,公办教师下放原籍,实行工资、工分加补贴的薪酬制。

11月 “反复旧”开始,各级革委会改组。

12月 莘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69年

1月 县武装部 200 多支枪被群众组织哄抢。

2月 10日 莘县 270 人参加冠县武斗。

7月 纠正“反复旧”错误。

12月 县、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1970 年

1 月 “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在全县展开。

8 月 公社卫生人员下放到大队,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村村都有“赤脚医生”。

是年 全县开展整党建党活动。

1971 年

3 月 撤销 13 个区,设立 21 处公社,原“小公社”改称“战区”。

5 月 撤销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恢复县委,召开第四次县党代会。县委日常工作仍由县革委政治部和办公室承担。

6 月 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批判唯心论、经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和和平过渡论等。

10 月 大中专恢复招生,实行推荐制,首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大中专学校。

年末 各公社党委相继建立。

1972 年

春 全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秋 9 省 1 市制糖业现场会在莘县召开。

1973 年

10 月 县民兵师组建。

是年 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活动。

1974 年

春 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各公社派性分子纷纷建立组织，策划“二次夺权”。中小学师生学习黄帅日记和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经验，批判“师道尊严”和“智育第一”观点。8 月 工宣队、贫管会组成领导小组进驻学校。

是年 莘县师范正式招生。

1975 年

4 月 县“五·七”大学建立。

9 月 农村学习天津小靳庄和本县张大庙经验，大办政治夜校。

10 月 县火化厂建成。

是年 全县中、小学学习“朝农”经验，实行厂校挂钩、校队挂钩，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成风。

1976 年

5 月 县国棉厂、拖拉机站、运输公司从农村招收 2450 名亦工

亦农轮换工。

7月 河北大名涝水串入马颊河,引起跨省排水纠纷。

8月28日 唐山大地震,莘县11人参加医疗队赴唐山救灾。

9月18日 县直和各公社分别召开毛泽东主席追悼会,收听收看北京追悼大会实况。

12月 全县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

是年 古城西街麦、秋两季粮食亩产达到1021公斤,成为鲁西第一个亩产吨粮的生产大队。

1977年

3月 中原油田在莘县境内打出第一口探井。

10月 大中专招生,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秋 工宣队、贫管会撤离学校。莘县一中、张鲁中学被确定为地区重点中学。

1978年

4月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帽工作开始。

10月 中医处方用药开始以克为计量单位。

秋 山东省农业电影制片厂在古城贾庄拍摄农业科教片《贾庄与紫穗槐》。

1979年

3月 中原油田打出第一批油井。油田至临清输油管道开铺。

5月2日 国棉厂发生重大火灾。

9月 马西林场在王奉林场的基础上开工建设。

10月 全县“右派分子”甄别工作结束。

1980年

2月 部分村队开始实行联产计酬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

冬 全县农村开始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是年 莘县一中撤销初中部，被列为省、地、县三级重点中学。

1981年

年初 县委确定“以棉促粮，粮食吃饱饭，棉花多贡献，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指导思想。

4月 孔繁森任莘县县委副书记，1985年4月调任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

7月 全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8月 全县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

12月 县革命委员会改称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协正式恢复工作。

1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宣传张海迪事迹的人物通讯。

1982 年

7 月 1 日 第三次人口普查。

11 月 5 日 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建的“2606”沙荒造林项目实施计划在京签字,项目正式启动。

11 月 26 日 董杜庄花炮厂发生爆炸。

1983 年

1 月 25 日 首次召开全县劳动致富代表会议。

8 月 全县青少年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

12 月 废除民用布票,棉布敞开供应。

12 月 4 日 魏庄棉厂发生保险柜被盜案。

是年 莘县成为全国 47 个工农业总产值或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县之一。

1984 年

3 月 县直机关进行机构改革。

6 月 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全县设 28 个乡镇,4 个办事处。设镇的有:城关、朝城、观城、古城、张鲁(回族镇)。办事处是:城关、朝城、马西、樱桃园。

是年 全县播种棉花 79.76 万亩,亩产皮棉 145 斤,收购皮棉 107 万担,棉农人均交售皮棉 56.5 斤,均创历年之最。

1985 年

3 月 李凤桃拦河闸、张屯扬水站等东水西调关键工程动工。

8 月 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县委、县政府给全县 1000 余名 3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

11 月 1 日 马本斋烈士陵园重建工程竣工,张鲁中学改称“本斋中学”。

1986 年

5 月 县委、县政府号召向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一等功臣张振霞学习。

是月 莘县被确定为全省第一批粮食生产基地县。

是月 县人武部改为地方建制。

1987 年

5 月 25 日 发电厂锅炉发生爆炸。

8 月 26 日 刘庄乡 7 个村遭龙卷风袭击。

9 月 莘县被批准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

是月 古云、大张家撤乡设镇。

1988 年

5 月 县委就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作出安排。

秋 莘县与邻县建立治安联防协作关系。

是年 县城中心市场开建。

1989 年

3 月 26 日 张鲁棉厂发生重大火灾。

6 月 全县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斗争。

7 月 19 日 城关、俎店、张鲁等 8 个乡镇遭暴雨、冰雹和龙卷风袭击。

11 月 20 日 全县无线电传真通讯网启用。

下半年 开始为期一年的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1990 年

7 月 1 日 第四次人口普查。

11 月 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下半年 全县党员开展“学党章、正党风”活动。

1991 年

5 月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百日会战开始。

12 月 4 日 魏庄棉厂保险柜被盗案告破。

1992 年

1 月 《莘县实现小康目标发展规划》出台。

是月 杨庄住宅小区开工建设。

2月 县城中心市场改建工程启动。

夏 旱情加重,地下水位严重下降,部分村庄人畜吃水发生困难。

9月5日 首届鲁西黄牛节在俎店乡举办。

9月14日 县吸引资金人才的优惠政策出台。

9月底 全县28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农民合作基金会。

11月 粮油价格全部放开。

是年 莘县酒厂利税突破2000万元。

是年 全县乡镇以上工业实现利税4711万元,居全区8县市之首。

1993年

1月 县城有线电视开通,1997年10月与省、市联网。

3月2日 县城东、南、北外环路建设破土动工。

3月18日 举行公安干警授衔仪式。

4月 县委确定了“定上五条线(粮棉、畜牧、蔬菜、林果、乡企)、扩充三支大军(多种经营、劳务输出、个体经营)、开发一大片(马西)、抓好一批点”的农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

5月 县城夜市开始形成。

是月 莘县“八五”绿化工程通过省级验收。

6月 莘县城内启用交通岗亭和红绿灯。

7月 莘县酒厂跻身1993年度中国500家最佳效益工业企业。

是月 莘县菜农进京赴疆。

9月 临莘路路面硬化竣工通车。

9月25日 王奉至大名县金滩镇公路通车。

11月 蔬菜、果树遭受严重冻害。

1994年

1月 莘县被确定为全省改革开放试点县。

3月9日 省交通厅首批挂职干部到莘。

3月 开始实行“隔周双休”制。

是月 县直机构由82个精简为43个。

是月 “三纵、十横、一环”公路建设规划出台。

4月20日 丈樱公路修筑工程启动。

5月17日 程控电话启用。

8月20日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设。

11月29日 孔繁森因公殉职。

是年 县属工业企业相继技改和改制。

是年 莘县小城镇建设试点和“十大市场”确定。

1995年

4月6日 “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启用。

5月1日 实行每周双休制。

6月 东环路蔡庄大桥通车。

8月31日 全县实现村村通电话。

10月 莘张公路展宽工程竣工。

是月 王楼大桥通车,县城外环路全线贯通。

10月31日 省交通厅第二批挂职干部到莘。

12月17日 零时起,莘县电话加入聊城本地网,电话号码由6位升至7位。

12月26日 彭楼引黄入鲁工程破土动工。

1996年

2月 省政府授予莘县“城镇建设先进县”和“村镇建设先进县”称号。

是月 十八里铺撤乡设镇。

4月1日 县人武部重新收归军队建制。

4月18日 燕店乡举办“中国第一届香瓜节”。

5月25日 县城首座高杆灯在莘聊路口落成。

7月25日 私立公助的明天中学开始招生。

8月 县检察院经济检察科改设为反贪污贿赂局。

9月 县医院晋升为二级甲等医院。

9月9日 莘县获“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先进县”称号。

9月25日 莘县首批5乡镇消雹增雨高炮到位。

10月 莘县被评为全省“初中教育先进县”。

是月 蒙馆路拓宽改造工程竣工通车。

11月 伊园新村开工建设。

是年 莘县被命名为“中国双孢菇之乡”和“中国香瓜之乡”。

是年 莘县获全省“普九”工作先进县称号。

1997 年

3 月 振兴街拓宽改造工程启动。街长 3540 米,红线控制宽度 40 米。

4 月 光华鸽场和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启动建设。

8 月 28 日 中央电视台“欢聚一堂”节目组在王铺乡卜姓庄拍摄农村欢庆“十五大”专题节目《欢聚在田野》。

是年 社区宾馆和体校动工兴建。

1998 年

6 月 22 日 曾广福逝世。

9 月 邮政局与电信局分设。

是年 莘北综合批发市场动工兴建,次年投入使用。

是年 全县双孢菇面积达到 420 万平方米,总产量 3.15 万吨。

是年 实验高中正式招生。

1999 年

1 月 莘县东兴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古云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10 月 单庙乡改设莘亭镇。

是月 聊莘路拓宽改造工程竣工。

12 月 莘县信息港开通。

是月 张寨乡建成全省第一个“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绿

安”牌韭菜被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

是年 全县冬暖式大棚突破 10 万个。

2000 年

2 月 朝城、古云、张鲁被省政府定为中心镇。

3 月 8 日至 5 月 23 日 县级干部开展“三讲”活动。

7 月 燕店、董杜庄撤乡设镇。

9 月 莘县工业园区管委会成立。

10 月 农村税费改革启动。

10 月 16 日 莘县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全国食用菌行业十佳商品基地县”称号。

12 月 彭楼引黄入鲁工程通水。

是年 大张家镇率先采用双孢菇层架式栽培、二次发酵技术和土锅炉增温法。

2001 年

3 月 全县乡镇由 28 个合并为 22 个,城关镇改设为莘城镇。

4 月 振兴街拆迁改貌工程启动。

5 月 中心市场改造一期工程启动。

是月 农村电力网改造一期工程结束。

7 月 莘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启动。

10 月 王奉、樱桃园撤乡设镇。

是月 念楼大桥通车,莘范路拓宽改造工程竣工。

11 月 通运路延伸改造工程竣工。

是月 县政府办公微机实现“联网”。

是年 莘县光风草业有限公司成立。

2002 年

2 月 位于北、东外环路交界处的新汽车站动工兴建。

3 月 北外环路拓宽改造工程启动。

4 月 文庙修复工程启动。

4 月 5 日 曾广福墓碑落成,并被定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5 月 全县广播电视光缆网建设竣工。

7 月 县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城区自控音响设备投入使用。

7 月 8 日 化肥厂发生液氨泄漏事故。

是月 新华路北段与北外环路东段排水工程竣工。

是月 县一中新校院墙开建。

是月 河店、妹冢撤乡设镇。

10 月 220 千伏变电站投入使用。

是月 临观、观葛公路拓宽改造竣工。

12 月 古城金代铁钟钟亭落成。

2003 年

1 月 全县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召开。在从上到下的换届工作中,领导班子组成人员有较大调整。

2 月 古云工业园区升格为聊城市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

3 月 农网改造二期工程完工。

3 月 13 日 十八里铺镇太子冢标志碑落成。

是月 农村党建百日会战启动。

4月 全县打响防治“非典”战役。

是月 中心市场二期工程和政府街拆迁改造工程启动。

6月 文庙修复工程竣工。

是月 莘县高考本科上线 1637 人，连续四年居全市 8 县市第一名。

孔 姓 行 辈

清乾隆九年皇上赐给孔府三十个字的行辈，从第五十六代排起：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民国九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貽又续排二十字：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莘县、朝城、观城建置沿革一览表

	莘	县	朝	城	观	城
	称谓	隶属	称谓	隶属	称谓	隶属
三代	莘地	兖州		兖州	观国	兖州
春秋	莘邑	卫国		卫国	观邑	卫国
战国	莘邑	魏国		魏国	观邑	魏国
秦	阳平	东郡	东武阳	东郡	观邑	东郡
汉	阳平	东郡	东武阳	东郡	观邑 卫国	东郡
魏晋	阳平	阳平郡	东武阳	阳平郡	卫国	顿丘郡
南北朝	乐平亭 莘亭	阳平郡 阳平郡	武阳	阳平郡	卫国	顿丘郡
隋	阳平 阳平 清邑 莘县	魏州 武阳郡 莘州 魏州	武阳	武阳郡	观城	武阳郡
唐	莘亭 莘县 莘县	博州 莘州 魏州	武阳 武阳 武圣 朝城	魏州 莘州 魏州 魏州	观城	魏州
宋	莘县	大名府	朝城	开州府	观城	开州府
金	莘县	大名府	朝城	大名府	观城	开州府
元	莘县	东昌路	朝城 朝城	东平府 濮州	观城	濮州
明	莘县	东昌府	朝城	东昌府	观城	东昌府
清	莘县	东昌府	朝城	曹州	观城 观城	曹州 濮州

	莘 县		朝 城		观 城	
	称谓	隶属	称谓	隶属	称谓	隶属
民国	莘县 莘县	东临道 聊城专署	朝城	东临道 聊城专署	观城 观城	东临道 聊城专署
1949	莘县	平原省 聊城地区	朝城	平原省 濮阳地区	观城	平原省 濮阳地区
1952	莘县	山东省 聊城地区	朝城	山东省 聊城地区	观城	山东省 聊城地区
1953	莘县	山东省 聊城地区	观朝	山东省 聊城地区		
1956	莘县	山东省 聊城地区				
1998	莘县	山东省 聊城市				

建国后莘县人口耕地一览表

年份	总人口(人)	总耕地(万亩)	人均耕地(亩)
1949	455829	176.10	3.86
1950	465479	175.75	3.78
1951	477524	175.50	3.67
1952	488705	175.24	3.59
1953	489677	172.83	3.53
1954	505192	172.89	3.42
1955	519315	172.33	3.32
1956	524334	171.17	3.26
1957	535541	168.14	3.14
1958	524042	150.39	2.87
1959	518118	143.97	2.78
1960	494884	142.79	2.86
1961	518466	135.21	2.61
1962	526729	143.12	2.72
1963	528260	145.80	2.76
1964	527281	146.28	2.77
1965	537861	146.90	2.73
1966	551813	140.80	2.55
1967	557524	139.60	2.50
1968	551267	139.60	2.53
1969	593169	136.30	2.30
1970	608022	137.30	2.26

年份	总人口(人)	总耕地(万亩)	人均耕地(亩)
1971	619686	137.30	2.22
1972	630008	136.50	2.17
1973	644993	136.40	2.11
1974	658923	135.90	2.06
1975	670732	135.00	2.01
1976	681834	134.30	1.97
1977	692766	133.90	1.93
1978	702170	133.60	1.90
1979	712726	132.97	1.87
1980	723963	132.50	1.83
1981	736531	132.40	1.80
1982	749575	132.40	1.77
1983	757768	132.42	1.75
1984	769671	132.37	1.72
1985	777585	130.04	1.67
1986	785822	130.04	1.65
1987	796034	129.61	1.63
1988	810251	129.40	1.60
1989	821386	129.38	1.58
1990	887745	129.33	1.46

年份	总人口(人)	总耕地(万亩)	人均耕地(亩)
1991	905045	129.26	1.43
1992	915799	129.17	1.41
1993	929513	129.19	1.39
1994	932846	129.08	1.38
1995	937292	128.95	1.38
1996	940072	128.95	1.37
1997	943870	128.89	1.37
1998	947079	128.61	1.36
1999	949768	128.52	1.35
2000	952862	127.92	1.34
2001	957161	127.91	1.34
2002	959239	123.48	1.29

说明:2002年的总耕地数为常用耕地,不包括临时耕地。

莘 县 概 况

(2003 年初)

位置 莘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聊城市西南部,北纬 $35^{\circ}48'$ — $36^{\circ}25'$,东经 $115^{\circ}20'$ — $115^{\circ}43'$ 。

版图 今日莘县版图最终形成于 1964 年,包括原莘县、朝城、观城三县的全部和范县、濮县的一部分。版图南北狭长,自东北至西南最长处的直线距离为 150 华里,东西方向最狭处的直线距离仅有 35 华里。

四邻 莘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西邻河北省大名县和河南省南乐县、清丰县,南邻河南省濮阳县、范县,东邻阳谷县和东昌府区,北邻冠县。国务院 1990 年勘立的冀鲁豫三省交界标志桩位于董杜庄镇毕屯村西北角。

面积 莘县版图面积 1387.74 平方公里,合 208.16 万亩。常用耕地和临时耕地总数为 129.16 万亩。

政区 莘县下辖 4 个办事处,22 个乡镇(15 镇 7 乡)。15 镇是:莘城、莘亭、河店、燕店、王奉、张鲁(回族)、董杜庄、十八里铺、妹冢、朝城、古城、樱桃园、观城、大张家、古云。

城关办事处(驻莘城)辖 6 乡镇:莘城、莘亭、河店、燕店、俎店、董杜庄。

马西办事处(驻大王寨)辖 4 乡镇:大王寨、王奉、魏庄、张鲁。

朝城办事处(驻朝城)辖 5 乡镇:朝城、十八里铺、妹冢、张寨、

徐庄。

樱桃园办事处(驻樱桃园)辖7乡镇:樱桃园、古城、柿子园、王庄集、观城、大张家、古云。

村庄 全县共有自然村1040个,行政村1154个。

人口 全县总户数25.81万户,总人口95.92万人。其中:乡村户数22.33万户,乡村人口85.93万人。

民族 全县汉族人口947579人,约占总人口的99%,回族人口11240人,约占总人口的1%。其他按人口由多到少依次为:壮族、朝鲜族、满族、侗族、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回族主要分布在张鲁、朝城、王奉、徐庄、俎店等乡镇。

河渠 莘县境内的自然河流有徒骇河、马颊河、金线河、金堤河。人工渠道主要有:东池干渠、道口干渠、仲子庙干渠、范莘干沟、俎店干沟、鸿雁渠、辛庄排水沟等。全县机井保有量1.8万眼,节水灌溉面积80万亩。

交通 县内硬化路面总里程为765公里,22个乡镇和大部分村庄都有沥青面公路相通。省道有永莘、临商、临观、蒙馆、齐南5条,国防路有朝葛,县乡公路有莘张、马南、王古、朝古、张岩、邹燕、燕五、节远、将古、王毕、毛程、宁沙、郝马、张杨等,县城有全长13.8公里的外环路,实现了“三纵、十横、一环”公路建设总体规划。县境四面有10个重要的公路出口。县城北到济馆高速公路的垂直距离为30公里,东到京九铁路的垂直距离为15公里。经过莘县的聊(城)濮(阳)高速公路规划设计工作已经启动。莘县虽暂无铁路过境,但公路交通的普及程度是比较高的。

农业 200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9.42亿元,粮经作物比例为5.2:4.8。粮食总产9.57亿斤。瓜、菜、菌总面积54万亩,其中冬暖式大棚17万亩,大、中、小弓棚12万亩,露地菜20万亩,瓜菜菌总产量175.9万吨。经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认证的无公害、绿色农产品

18个,总面积25万亩,列全省第三位。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289家,年加工能力15万吨。农副产品交易市场30处,年交易额20多亿元。

民营企业 全县三次产业比例为42:31:27。民营企业2325家,其中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30家,1000万元以上的7家,总投资7.19亿元,乡镇工业税收完成7413万元。县城和古云两个县、市级工业园区初具规模。

就业与引资 200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3.5%,全县在外务工人员10.3万人。引进较大投产和在建项目28个,实际到位资金4.6亿元,利用外资829万美元,出口创汇348万美元。

教育 至2002年底,全县共有中学43处,其中纯初中36处,纯高中4处,共有在校学生6.89万人。共有小学467处,在校学生8.94万人。共有幼儿园408处,入园儿童9923人。另外还有党校、师范、职业中专、劳动技校、卫校、特殊教育学校、农业广播学校等。

医院 莘县较大的医疗机构有县医院、朝城医院(二院)、观城医院(三院)、城关医院(四院)、中医院、眼科医院(樱桃园)、健民医院(民办)、妇幼保健院等。

陵园 莘县境内的陵园有:鲁西北烈士陵园(大王寨乡丈八村)、马本斋烈士陵园(张鲁)、苏村阻击战烈士墓(张寨乡苏村)。

文物古迹 莘县境内的文物古迹主要有:战国齐魏马陵之战遗址(大张家镇马陵村)、莘亭伊尹耕处(莘亭镇大里王村)、王旦墓(莘城镇套庙王村)、文庙(县城)、雁塔遗址(县城)、金代铁钟钟亭(古城镇)、韩国昌父子墓(董杜庄镇梁丕营村)、朝城天主教堂(朝城)、朝城耶稣教堂(朝城)、蒋店天主教堂(王庄集乡蒋店村)、朝城清真寺(朝城)、太子冢(十八里铺镇太子张庄)、野猪林遗址(观城镇焦村)、孟洼遗址(朝城镇孟庄)、发干故城(河店镇马桥)等。

荣誉称号 2002年保有和新获得的荣誉称号有：中国双孢菇之乡，中国香瓜之乡，全国食用菌行业十佳商品基地县，中国特产之乡开发建设先进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市农业结构调整先进县，全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全国“双基”工作先进县，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全省“双基”工作先进县，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县，全省成人教育先进县，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全省“双拥”模范县，全省科普示范县，全市少数民族脱贫工作先进集体，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省村镇建设先进县，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等。

“为人民服务”由来

1944年10月，中央军委在延安召开英模会，与会者都是神枪手、战斗英雄、学习模范。大会准备给与会人员每人发一块毛巾作纪念品。为了加重这份礼物的分量，会议组织者决定请毛主席写几个字印在上面。当时毛主席刚刚写完纪念张思德的文章《为人民服务》，便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重新写了一遍，让大会秘书处制版印在了毛巾上。从此，“为人民服务”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

通 讯 联 络

中共莘县县委办公室

地 址:莘县政府街 52 号 邮编:252400

联系电话:0635-7322051 传真:0635-7321306

莘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 址:莘县政府街 75 号 邮编:252400

联系电话:0635-7321703

莘县人民政府

地 址:莘县政府街 50 号 邮编:252400

办公室联系电话:0635-7321439(白) 7321292(夜)

传 真:0635-7321658 网址://www.sdsx.gov.cn

招商局联系电话:0635-7322652 传真:0635-7322652

政协莘县委员会

地 址:莘县政府街 75 号 邮编:252400

办 公 室 联 系 电 话:0635-7321789

文史宣传科联系电话:0635-7329520

聊城市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莘县古云镇 邮编:252429

联系电话:0635-7881399 传真:0635-7883064

网 址://www.sdguyun.net

莘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地 址:莘县工业园区 邮编:252400

联系电话:13963557326 13963547400

传 真:0635-7321658 网址:xinxue@sohu.com